



目 录

| | |
|--------------------------------|---------|
| 关于封存日记 50 年的神话(代序)..... | (1) |
| 莫斯科日记(1935 年 6—7 月)..... | (3) |
| 莫斯科归来..... | (163) |
| 莫斯科日记补记(1938 年 10—12 月)..... | (201) |
| [附]斯大林同志和罗曼·罗兰谈话记录..... | (223) |
| 译后记..... | 23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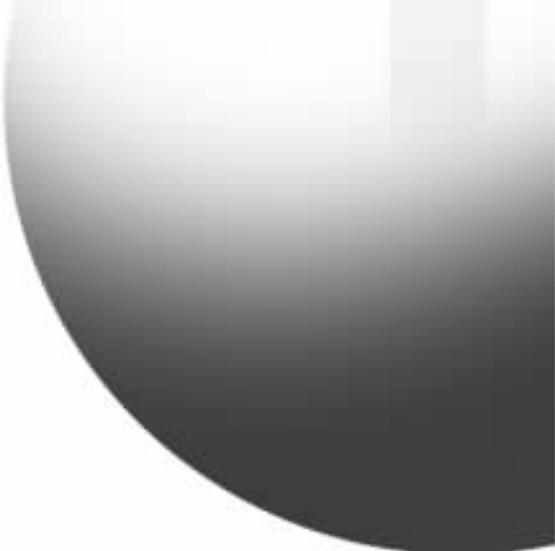


莫斯科归来



莫斯科日记

(1935年6-7月)



莫斯科日记补记

(1938年10-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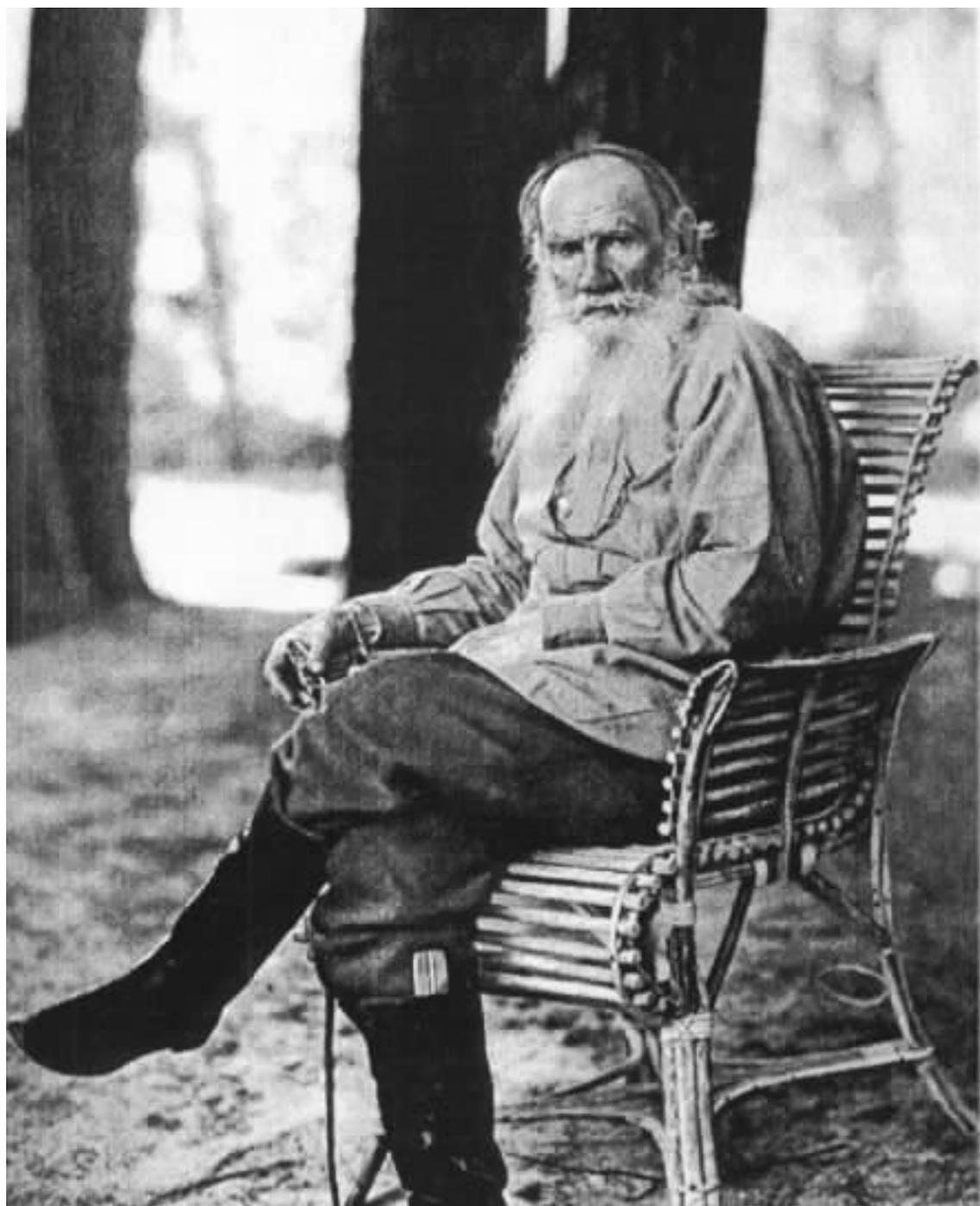
M
MOJIKERUJI



罗曼·罗兰夫妇



莫斯科大剧院



托尔斯泰在农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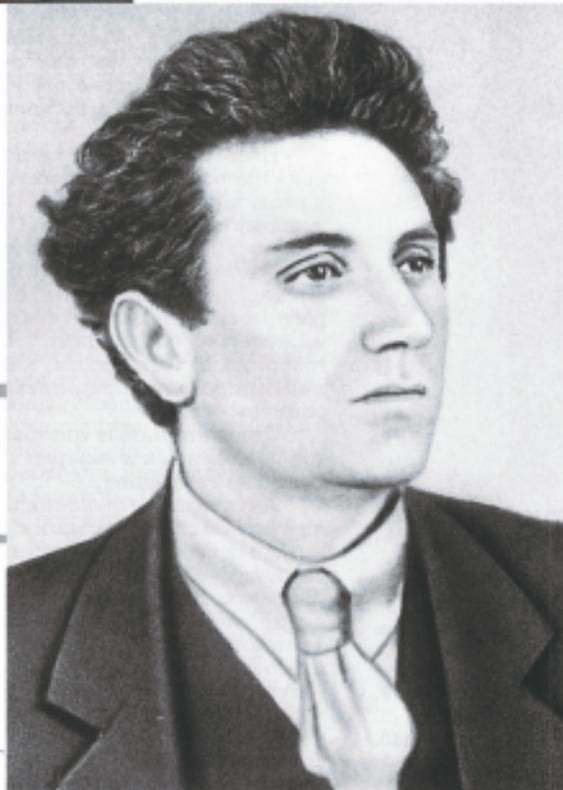
MOSKOVSKI



高尔基

高尔基当年在莫斯科的别墅，
罗曼·罗兰夫妇曾住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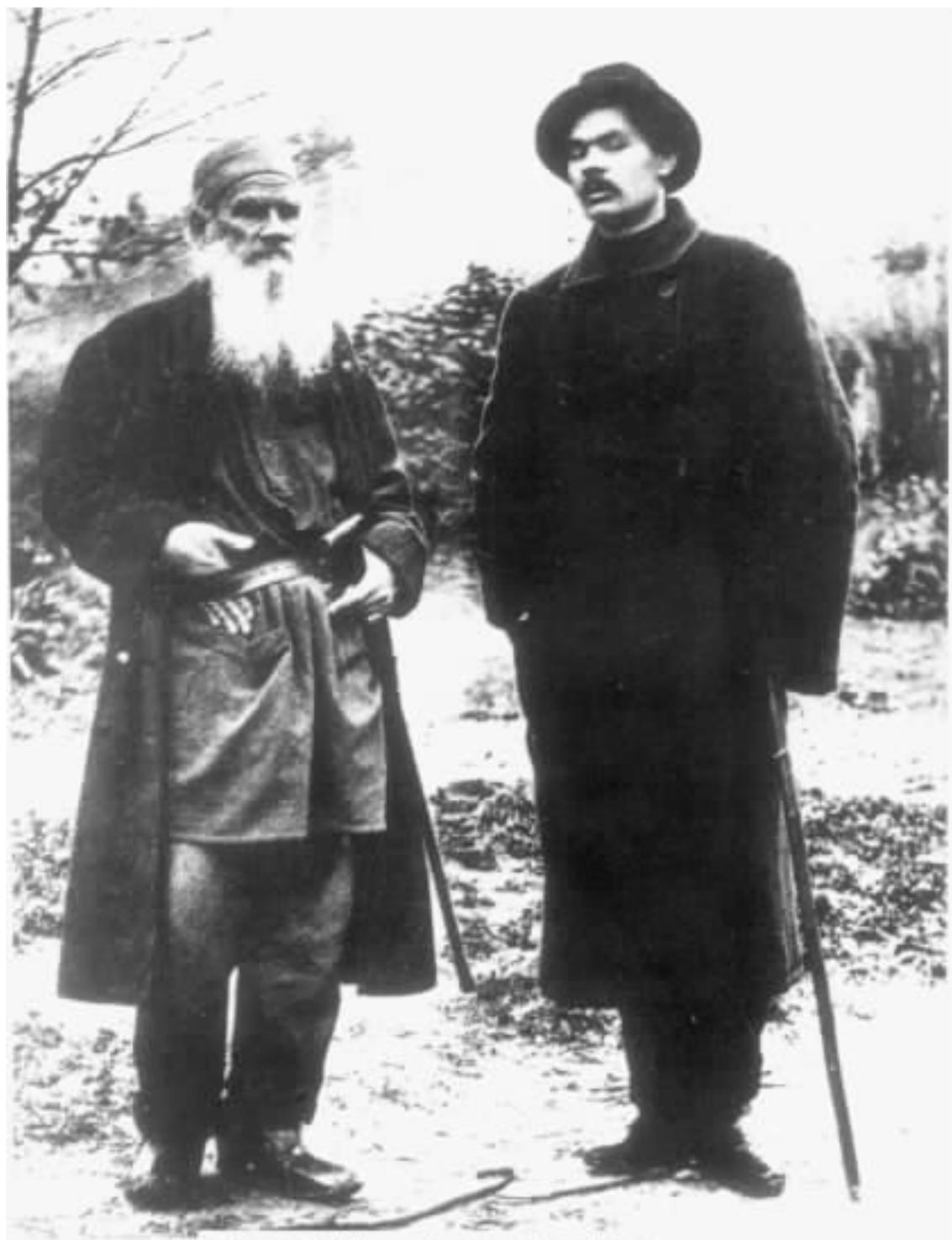


高尔基一家

斯大林和夫人阿利卢耶娃



斯大林和妻子阿利卢耶娃郊游野餐



列夫·托尔斯泰与高尔基 1901年 摄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高尔基曾说：“只要这个人活在世上，我便不是孤儿。”而“这个人”——列夫·托尔斯泰早在1910年就已离开人世了。



编者前言

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中叶 ,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日渐凸现 ,法西斯主义开始抬头。在这样的忧患年月里 ,东西方各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 社会主义实验场 ”——苏联。

可是 ,当他们亲自踏上那块真实的土地时 ,反应又是多么的不同啊 !

五四青年瞿秋白希望用“ 俄式革命 ”救治多灾多难的祖国 ,而同是东方作家 ,泰戈尔却断言 : “布尔什维克可能只是一种治疗方法 ,但是这种疗法是不能持久的。”

法国的两位大作家、社会主义事业的支持者纪德与罗曼·罗兰几乎在同一时期访问了苏联。结果 ,前者是痛苦的失望 ,后者则留下了忧郁的“ 封存的日记 ”。

七八十年之后的今天 ,在苏联这座大厦的旧址上 ,只剩下一片寂寞的废墟了。在那些残垣断壁上 ,也许我们还能找寻到一些有益于我们的可资利用的“ 破砖与碎石 ”。

有比较 ,才有鉴别 ;有了鉴别 ,就会有发现。这是我们这套小丛书的基本主旨。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5 月



关于封存日记 50 年的神话^①(代序)

闻 一

也许 ,围绕罗曼·罗兰自己封存《莫斯科日记》^②(约定俗成 ,姑且这么叫吧 ,因为罗曼·罗兰本人并没有给他的这一日记起这个名字)一事就有许多的神话 ,而这神话流传了几十年 ,并且愈传愈神。

许多文章都说 ,罗曼·罗兰所以封存自己的这份日记是由于他在这些日记中谴责了斯大林和苏联的政策 ,从而使这些文字成为他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转变的思想路标 ,所以 he 不想在斯大林在世时向世人公布这本日记。还有人说 ,是因为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好朋友高尔基的个性弱点 ,怕得罪了人 ,所以不愿公布这份日记 ,等等 ,等等。因此 ,一个流传甚广的结论是 :罗曼·罗兰是自觉自愿地 ,有高度预见性地封存自己的日记的。正因为如此 ,伟大的作家罗曼·罗兰也就成了能预知斯大林和苏联的未来命运的先知先觉的贤哲之士。

我这个人对法国文学一窍不通 ,对于罗曼·罗兰 ,也只是读过他的几本书而已。若不是我在研究苏联历史和斯大林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份档案和一些信件 ,我是不敢在自己的文章里妄谈这位动一发而牵当今世界的伟人的。这份档案就是罗曼·罗兰

① 原文最早发表在《读书》1999 年的第 4 期上。经作者同意 ,编入本书时 ,内容略有删节。又 ,本文的引文由俄文译出。

② 本书由法文译出 ,此前曾有俄文版本的译作。

和斯大林在1935年6月28日的谈话记录^①。根据这份记录和他本人在莫斯科记下的日记,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完全不像世人所说,相反,罗曼·罗兰当年却是极力要发表这份日记的,他对它的封存是万不得已、无可奈何的事。

我想首先要说一下罗曼·罗兰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

从谈话记录和日记来看,罗曼·罗兰到莫斯科去并不是什么“勇敢的政治行动”,并不是想去见见和了解一个真正的和真实的苏联。他去的目的很简单:为情势所迫。当时有两件事使法国人,尤其是法国青年对苏联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和动摇。一是苏联国内因基洛夫的被杀而开始大规模镇压“凶手”和“反对派”,二是苏联和资产阶级法国政府签定了相互援助条约。随着苏联反对者诽谤和污蔑的广为流传,法国人对苏联的误解和不信任程度在逐日增加。而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不仅罗曼·罗兰自己这样说,法国人也是这样看的)的罗曼·罗兰就每天接到大量的信件,要他就这些事作出解释,但他却无法做到。因为他自己也不明白苏联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的作为“苏联老朋友和维护者”的处境一时就变得艰难起来。正如他在谈话中对斯大林所抱怨的:“当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我们就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没有给我们提供使事情变得合理和作出解释所必需的材料。”

所以,罗曼·罗兰到莫斯科去,就是为了向斯大林通报这方面的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对策。这时的罗曼·罗兰是绝

^① 见本书末尾的附录。

对的亲苏的和亲斯大林的。他绝对相信苏联政策的正确,相信斯大林的一切做法都有自己的道理;“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理由,公正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对苏联和斯大林的惟一指责是:“在我看来,苏联的政策不甚关心向自己的外国朋友指出自己某些行动的理由。”

斯大林满足了他的要求了吗?应该说,基本上满足了。他在一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对罗曼·罗兰表现出了很大的敬意、耐心 and 希望,因而回答了罗曼·罗兰提出的所有问题,谈得最多的是有关苏联和法国签约以及有关基洛夫被杀事件的问题。这时,斯大林很少花这么长的时间接见外国客人,也很少这样开诚布公地谈基洛夫被杀事件。他的谈话中所提及的事实都是外界已知的,从国家机密这个角度来说,没有什么不能公之于世的。特别是,罗曼·罗兰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斯大林就这些事件作出解释,以便他和他这样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能到法国人和西欧各国人民中间去做“解释工作”。所以,精明透顶的斯大林是不会向罗曼·罗兰泄露什么特别的国家机密的。他只不过是在解释方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开诚布公”罢了。比如,有关基洛夫被杀后的大规模镇压,斯大林就说:“也许,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是被我们身上勃发的对犯罪的恐怖分子的仇恨情绪所控制了。”他承认:“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为什么要将这些无罪之人枪毙呢?斯大林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解释:“我们已经得悉,犯罪的恐怖分子在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之后,还打算对其他的领导人实行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行,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仅仅为了预防万一,就可以将无罪的人处以极刑,这就是

斯大林的解释,就是斯大林的逻辑!

斯大林还不开诚布公吗?够开诚布公的了!这是他此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毫无顾忌地谈及基洛夫事件之后的镇压问题。斯大林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因为他此时也需要罗曼·罗兰,需要他和他这样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能去为苏联和斯大林做“解释工作”,以摆脱因基洛夫事件和镇压活动而面临的几乎是来自全世界的压力。如果罗曼·罗兰和像他这样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为自己讲话和讲好话,斯大林就会轻松得多,就会减轻面临的巨大压力。所以,斯大林在这次长达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谈话后,随即建议罗曼·罗兰接受苏联政府提供的、随时供他使用的别墅,并又在7月3日跑到高尔基在哥尔克的别墅来会见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对斯大林的接待和回答满意吗?他得到了满足了吗?应该说,基本上满足了。他对斯大林的接待和谈话的反应是:“我老实告诉您,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他在此期间对斯大林表示出了一种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的态度。当然,这不是小人的、阿谀奉承的、曲躬逢迎的、仰人鼻息的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联老朋友和维护者”的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是一种出于绝对相信苏联的政策和斯大林本人的信仰上和道德上的诚惶诚恐和惟命是听,是大人物对大人物,文学和社会活动大人物对国务活动大人物的礼敬、尊重和崇拜。罗曼·罗兰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和描述了斯大林对他的回答,接受了他的种种“解释”。

尽管罗曼·罗兰在自己的近一个月的有关苏联之行的日记

中,有对苏联的问题和缺点的记载,有对苏联领导人的非典型的共产党式的描写,但他的所有文字依然表明他的亲苏联、亲斯大林的立场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正如他自己在日记的后记中所说的:“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应当补充一点,这后记是罗曼·罗兰离开苏联后写的,是在不受任何环境条件的影响和他人牵制的情况下自主写成的。

罗曼·罗兰曾经在日记中预言过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必然发生,说到对斯大林的颂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可他也同时在说:“斯大林对我是个谜,暂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然而,罗曼·罗兰还是伟大的,他这时毕竟预言过斯大林的未来:“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的千百万追随者就会考虑,他是怎样的人。”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罗曼·罗兰尽管对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和他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轻蔑和怀疑,把他说成是“出于对您的爱,他们在火堆上烤您”式的、“用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棉絮包裹自己的言辞和行为”的人,但他却没有能看清和预言到不久将在苏联全面发生的清洗和镇压。为什么?也许,他相信了斯大林对基洛夫事件的“解释”,相信了这种清洗和镇压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所以他说:“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

而谴责它) ,因为危险仍存在。”他甚至极其形象地说:“所以;铁甲军’一分钟都不能削弱警惕性,卸下战斗的盔甲。”

所有这一切,无论是日记本身,无论是他和斯大林的谈话记录,还是他回归瑞士后所作的后记,都没有泄露苏联的国家机密,都没有抨击苏联和斯大林。比起后来纪德的《访苏归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可以说,他的日记实际上是当时保卫苏联和斯大林的最好的辩护词。由此可以说,罗曼·罗兰封存自己的日记不是出于对文字内容的考虑。

我在前面说过,罗曼·罗兰原本是要发表这份日记的。什么理由?

其理由之一是,罗曼·罗兰常常把这份东西称为“笔记”,表明他只不过是用心日记的形式记录下了他的访苏观感。他的访苏的使命就是要获得斯大林对一些问题的“解释”,而他得到了这种“解释”,自然要向对苏联产生误解和困惑的法国人和西欧国家的人民转述这种“解释”。罗曼·罗兰在日记的后记中说过,他是为了人们的阅读而写作这本日记的。

其理由之二是,罗曼·罗兰在回国后,就丢掉了其他的事务,专心加工整理这份笔记,准备它的出版,并在日记中附上他们的谈话记录。这是1935年8月。就在此时,罗曼·罗兰本人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斯大林同意在自己的日记中发表他们谈话的内容。斯大林没有回信。罗曼·罗兰的夫人玛丽亚·库达舍娃也几乎同时写信给高尔基,她在信中说:“罗兰想弄清斯大林是否准予他,或者在某种程度上准予他谈及这次谈话,并摘引其中的片段。”高尔基将这情况通报给斯大林,并转呈了库达舍娃的信。斯大林依然没有答复。这里的文字最清楚不过地表明,罗曼·罗兰

一开始只是想发表这一笔记,而无其他的考虑。

在至10月的将近两个月中,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都几次向斯大林询问过这件事。无论是对高尔基,还是对罗曼·罗兰,斯大林都没有任何答复。在现存的罗曼·罗兰的这份笔记的标题页上提到了这个10月。这些文字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未经我的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满之前,不能发表这个笔记——无论是全文,还是片段。我本人不发表这个笔记,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问题是,这段文字是什么时候写的?不清楚。是在1935年10月1日这一天,还是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如果从选定10月1日这个日期来说,它该是罗曼·罗兰于这一天写下的,否则这个日子在我看来就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罗曼·罗兰在写了这些文字后是否真的就绝了出版这份笔记的念头了呢?我的判断是没有。罗曼·罗兰还一直在努力为出版这份笔记而奔走。有两个证明,一是高尔基在1935年12月8日给斯大林写过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话:“我接到罗兰的几封信,他询问他能否利用和您的谈话。”这说明罗曼·罗兰在10月到这段时间仍然在期望出版自己的笔记。

另一个证明是,罗曼·罗兰本人在1935年12月27日通过翻译,即当时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阿罗塞夫给斯大林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谈发表我和您的谈话的事。您没有就此给我答复,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材料,您不认为这种发表是适时的。——我不再坚持。”这表明,罗曼·罗兰一直在坚持发表附有他们谈话记录的笔记,但条件是他必须得到斯大林的同意。然而斯大林没有表示同意,所以他就不再坚持。这里的“根据我掌握的材料”这个用语是很富含意义的。这个“材料”是怎样的材

料,又是谁转给罗曼·罗兰的?是通过阿罗塞夫,还是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因为我没有看到有关这种“材料”的材料或档案,我就只能猜测。我的猜测是,虽然斯大林没有正式给罗曼·罗兰答复,但他肯定是通过某种途径向罗曼·罗兰暗示不能发表他们的谈话记录和与此有关的日记。我想我的猜测是有很大的合理性的,在那个时代斯大林本人的许多意见都是通过这种“某种途径”传给当事人的。

如果罗曼·罗兰确实是在10月1日写下了那几行文字,那他在此后的两个月中就仍然在为出版自己的笔记而努力;当然,这并不排除他是在12月27日向斯大林表示了“不再坚持”的意见后,才写下这些文字的。如果是这样,他为什么偏偏注了个“10月1日”的日期,我暂时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不管怎样说,罗曼·罗兰所以封存自己的笔记,并不是自己的意志,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他所以封存笔记全是因为斯大林不同意他发表他们谈话记录的缘故。

那么,斯大林又为什么不同意罗曼·罗兰发表这一谈话记录呢?

事实上,一开始,斯大林看来还是想发表这一谈话记录的。他曾经让人在原始记录的基础上整理出一份正式的记录。这份整理后的记录基本上忠实于原始记录。它被送给罗曼·罗兰审阅,罗曼·罗兰看了,作了某些修改,并同意作为双方认可的正式记录,这就是我看到的这份档案材料。在退回整理好的记录时,罗曼·罗兰附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全文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6月28日的谈话记录文本我看过了。因为我事先准备

好了我要向您讲些什么,并且在谈话后立即记下了它们,所以我得以几乎完全恢复我自己的话。阿罗塞夫同志把它们归纳得相当的准确,但是,当然他不可能像我这样记得这么的完全。所以,我认为最好是不用他的文本,用我的法文本。显而易见,您的话应该按谈话的顺序来写。我去掉了有关我妻子的话(在第13页):它复述得不确切;此外,我的妻子并没有直接参加谈话。亲爱的同志,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罗曼·罗兰

后来再加工时,就把罗曼·罗兰的法文本的内容加了进去,但斯大林的话仍然是放在一起写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份“最终文本”。如此反复加工谈话记录,若不是为了发表又是为了什么呢?伏罗希洛夫看过这个记录后,建议公开发表。但到了最后,斯大林却在这“最终文本”上注上了“秘密,不供发表”。

现在还没有任何文件或档案可以表明斯大林为什么最后会作出这样的决策。但从分析来看,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进行更大规模清洗的运动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斯大林显然不希望他曾对罗曼·罗兰说过的话扩散出去。那种“为了防患于未然,就可以枪杀数以百计的人”的做法,明显对斯大林不利。他不想因为这篇谈话,而使国内的局势发生不利于自己的转变。二是斯大林的性格和做事方法所决定的,他只愿意自己的讲话由自己,由苏联方面,而不是由任何另一方公布出去,他历来把对自己的言行的解释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也许,有一天发黄的纸片会说真话。

斯大林的权威和斯大林的决策决定了即使像罗曼·罗兰这样的伟大西方作家,这样在当时极为忠诚的“苏联的老朋友和维

护者”也不能随便讲话。罗曼·罗兰是深深懂得斯大林沉默的真实含义的,如果他对这种不祥的沉默不予理睬,硬要去发表自己的日记和这份谈话记录的话,其后果是可以想见的。即使是伟人,他也有凡人的家室生命之虞。如果我们不说罗曼·罗兰这样做是心甘情愿的尊命的话,至少也会是考虑到了自己生存和生活的处境。世上一部春秋,一个权字,一个怕字,写就了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罗曼·罗兰焉能例外?这是时代的悲剧,但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首先是罗曼·罗兰的个人悲剧,是他盲目崇信斯大林正确和苏联的道路正确的悲剧。所以,他在自己的那几行宣告封存50年的字里行间,不免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深沉的悲哀和凄凉。事实上,罗曼·罗兰虽然宣告了50年的封存时间,但他实际上还是每时每刻(至少在1935年6-12月)都在期望斯大林能“开禁”,让他能发表这份笔记和谈话记录的,可惜他除了悲哀和凄凉外并没有能等到斯大林的“恩准”。不过,后来他却从这种悲哀和凄凉中得到了另一种东西——继续生存和发展的宝贵教益。

而我们的研究者却由于过分相信名人的神话而束缚了自己,未能从罗曼·罗兰已经显露出来的悲哀和凄凉中看出个真正的子卯寅丑。当然,这也是一种悲哀。



6月17日 星期一

下午2点45分我们动身前往苏黎世^①。天气舒适宜人,虽有些阴沉,但却不是很热。在这个二等硬座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到了苏黎世,我们下榻“御衣”饭店,它既舒适且又惹人喜欢,它就坐落在火车站的对面,尽管镇守着广场的一角,但却向后缩进了许多,自然也就少了些喧闹声。房间布置得很精美,床也很舒服。总侍生面露喜悦的神情,嘴上滔滔不绝地说着,讲他到南美的旅行经历,描述着战前他在蒙特勒^②的生活。在蒙特勒,谢塞克斯夫妇算是当地的富翁了(他们是泰里特和科城的创建者),然而,他们堪称是守财奴的楷模:他们宁可一步一步地沿着山坡一直爬到科城,也不愿买搭乘缆索铁道的车票,而这条铁道还是他们自己掏钱建的呢。在外面闯荡几年又返回故里的人,觉得瑞士人的思想实在太狭隘,缺少勇气,缺乏大度。但他们的品质却让人信得过,而且无可挑剔。

① 苏黎世 瑞士北部城市。

② 蒙特勒 瑞士西部小城,位于日内瓦湖畔。



6月18日 星期二

下午4点20分启程赴维也纳,途经布克及蒂罗尔,这次我们乘的是卧铺。外面下着霏霏细雨,天空灰蒙蒙的。忧郁而又浩瀚的瓦琅西湖宛如一曲尼伯龙根的史诗。刚一越过奥地利的边界,我即刻感觉似置身于崇拜者和朋友们的包围之中。费尔德基克关口的一位海关官员向我索要签字留念,同时,还把从托马斯·曼^①那里索要的签名拿给我看。卧铺车的检票员是奥地利蒂罗尔人,现在入了意大利籍,又返回奥地利来工作。他对我们既亲热又真挚。雨下了整整一夜。天亮后,直到距维也纳不远时,天空依然十分阴沉,但当我们到达维也纳时,天空却放晴了(大约在9点钟)。

^①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生于大商人家庭。著有《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约瑟和他的兄弟们》。1933年因反对法西斯而流亡国外。



6月19日 星期三

在维也纳休息。这座古老的大城市有许多庄重的名胜古迹，还有众多漂亮的商店；商店虽装饰得典雅精美，但顾客却寥寥无几。街上行人的穿着十分俭朴。他们清瘦的脸庞上流露出忧心忡忡的神色。忧郁笼罩着维也纳。玛莎^①觉得，看到今日维也纳的民众不禁让她想起五六年前莫斯科的居民，那时莫斯科仍未摆脱危机的困扰。但维也纳的民众似乎已经失去了希望（当我们返回法国，再次路过维也纳时，这种印象有所减弱）。“大都会”饭店坐落在与多瑙河相通的运河边，附近有一条通往黑里根区的有轨电车。迎接我们的却是形形色色的采访请求。一位小个子的记者几乎要哭起来。还有一位演唱歌剧的“男歌手”也来请求采访。对大家投过来的好奇心，我们只能报以缄默。当有人问我们要到哪里去时，我们只回答：“去华沙。”一整天我都守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迈出房门寸步。为我们服务的侍应生既威严又伤感，看上去颇像遭遇破产的小业主。

^① 玛莎·即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罗兰，罗曼·罗兰的俄罗斯妻子。再嫁给罗曼·罗兰前在俄罗斯叫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库达舍娃(М. П. Кудашева)。



6月20日 星期四

我们动身去华沙,途经伯乎明、卡托维兹等地。在这个头等小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跨越多瑙河之后,就是广袤的中欧平原,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起伏的地势倒给这广阔的平原平添了丝丝生气,但越往北走,就越显得凄惨、贫穷。在海关处(转眼之间又要出关了),无论是入境还是出境,官方对旅客所携带的钱款查得很严。越过奥地利的边境之后,就没有什么人能听得懂法语了。无论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在波兰,年轻人的自尊心极强,他们只肯讲本民族的语言,而排斥外族的语言。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的衣着、特征都似小资产者,虽不典雅,但也不寒酸。街上到处都是卖水果和饮料的摊点,摆着各种各样的水果,倒也显得颇为丰盛。但在整个旅途中,我们已能感受到工人们在失业,而且越往波兰走,失业似乎越严重;卡托维兹工业区过去极为富饶,处处工厂林立,而如今那些工厂的烟囱连一丝烟也不冒了。土地已变得十分贫瘠,或沦为沼泽地,或变成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上面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一整天,我们没看见一辆汽车,只看见一两辆马车蹒跚地走过去。条条小路刚刚露出路的样子,却又消失在几近荒芜的田野之中。树林里的树木稀稀落落的,许多树都被伐倒了,只剩下了树桩。每隔不远,便有一座奇怪的小土丘,顶部装饰着一块精雕的白石,就像白蚁巢或坟头。在

列车上,几乎所有的旅客都戴着黑孝,以悼念毕苏茨基元帅^①。列车抵达华沙时,已经是深夜11点了。外面下着雨,到处都是烂泥和嘈杂的人群:车站正在改建。阿罗塞夫^②和苏联驻波兰大使达符捷扬^③在站台上迎候我们。我们下榻的波罗尼亚饭店就位于火车站的对面,饭店波兰籍经理马上便流露出对苏联人(“国际旅行社”)的敌意。但仆人及普通老百姓倒乐于讲俄语。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波罗尼亚饭店是法西斯分子的活动中心。但返回途中再次路过波兰时,我们下榻到另一家大饭店“欧罗巴”饭店,人们却又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反间谍机构的驻地。那么到底应该选哪家饭店呢?大概还是应该选第二家,因为在这儿,接待人员显得更有礼貌。

① 毕苏茨基(1867—1935):一战后成为波兰国家元首,1920年自封为元帅。

② 阿罗塞夫(1890—1938):作家,1933年前任苏联驻布拉格使团首脑,1934年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任,罗曼·罗兰赴苏访问的接待者,1937年被逮捕。

③ 达符捷扬(1888—1938):苏联外交家,1925—1927年任苏联驻法公使,1934—1937年任驻波兰大使。



6月21日 星期五

整整一天都在华沙休息。上午阿罗塞夫来访。下午达符捷扬来看我们,他只喝茶。他长着一副东方人的面孔,显得很帅,但却毫无表情。他谈起波兰的经济衰落,国家的所有资财都用在扩军备战上。他将自己的轿车指派给我们使用,带我们到市区观光游览。宽敞的街道绿阴蔽日,十分美丽;纪念性的雕塑(为肖邦、密茨凯维支等人所设)庄重典雅;贵族式的饭店古香古色;一座座横跨在宽阔的维斯瓦河上的大铁桥宏伟壮观。“旧集市”广场四周的房屋都漆着颜色,就像法兰克福及纽伦堡的房屋那样,但这里的色调更柔和、更丰富多彩。然而,我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古老的犹太人聚居区,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穿梭于此。几位蓄着络腮胡、留着长鬓角的小老头,身穿长礼服,在一起争论不休。这里的人都缩着头,弓着背(甚至连年轻人也如此);一双双大眼睛瞪得溜圆,但目光却显得呆滞无神。人们流露出一种兼有傲慢与谦卑的复杂表情。一位倔强的犹太姑娘恶狠狠地盯着那辆险些刮着她的汽车,但她决不会退让一步,以躲开这辆汽车。回到饭

店后,我收到一封电报,是由纪德①、马尔罗②、布洛克③等人联名签发的,他们要我为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发一封贺电,我马上就照办了。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9点乘卧铺车启程赴莫斯科,阿罗塞夫陪我们一同前往。马塞尔·卡申④和他的夫人与我们乘同一列车,他们夫妇俩来找我们聊天。阿罗塞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恳求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不要去住早先安排的“萨沃依”饭店,最好能住在他家里,他最终说服了玛莎。我本来想住在饭店里,可阿罗塞夫却把这事捣鼓成一件私事(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事)。他在想方设法做我的监护人,他想拿我当金字招牌,往他的脸上贴金,以便从苏联政府及公众舆论那儿捞到好处。但我们也是在几天之后才识破他的意

① 纪德(Andre Gide, 1869—1951)法国作家,代表作有《蔑视道德的人》、《梵蒂冈的地窖》、《伪币犯》等。曾获诺贝尔奖(1947年)。

② 马尔罗(Andre Malraux, 1901—1976)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代表作有《征服者》、《王家大道》、《人类的命运》等。1859—1969年曾任法国文化部长。

③ 布洛克(Jean-Richard Block, 1884—1947)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某公司》、《巫女》等。1921年加入法共。

④ 马塞尔·卡申(1869—1958)法国政治家,前往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5年7—8月举行)。



图的。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的官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已岌岌可危,因为此前他干了一系列蠢事。这次他想把我们拢在他手里去造声势,以挽救他的官位,这无疑又是一件大蠢事。他要到维也纳,甚至要来瑞士接我们,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阻止他,不让他来,但却无济于事。他还竭尽全力向我们大献殷勤,热心地辩解住到他家里如何如何好,我们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尽管高尔基也邀请我们到他在莫斯科的寓所里入住。当得知我们同意后,阿罗塞夫奇怪地说道:“谢天谢地,你们没有羞辱我!”接着,他便赶紧去打电话,要家人收拾房间。

大约在晚上5点,我们抵达苏联边境。阿罗塞夫回忆起国内战争中的场场硬仗,回忆起布琼尼^①,回忆起在距华沙15公里处打的那场败仗^②,一位托派分子指挥官贸然命令部队迂回突入德军阵地,结果全体将士被俘(被包围?),吃了败仗。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这些战役及人物,结果我们过了那座著名的木制拱形国门,却未见其身,因为那上面书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但在两国的交界处,我们清楚地看到分别镌刻着波兰与苏联国徽的界碑,看到了耸立在高高平台上的瞭望哨所,长长的梯子直通到平台上。

在边境车站上,一节专用车厢在等着我们,克里姆林宫医院的主任医师列文博士及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契科夫已在车厢里等

① 布琼尼(С. М. Буденный, 1883—1973):苏联著名将领。1935年获苏联元帅衔。

② 指1920年8月15日苏俄红军与波兰军队在华沙近郊拉杰敏的决战,红军遭到惨重失败。

我们^① ,高尔基的秘书给我们带来他的主人及朋友的消息。高尔基刚刚得了重病 ,支气管严重发炎。列文博士说 ,他的肺与肠胃状况与我的状况很相似。我刚刚踏上苏联的土地 ,就得到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关怀与接待。列文博士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 ,马上为我作了体检 ,然后仔细看过我的瑞士医生海梅尔里博士写的医嘱 ,并将其抄写下来。从一家大型疗养院调来的一名护士为我们作日常服务。我们在车厢客厅里一起用了晚餐 ,然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在午夜时分 ,阿罗塞夫代我接待了一个白俄罗斯代表团 ,他们到明斯克车站来向我致意。



1936 年的莫斯科白俄罗斯火车站(罗曼·罗兰即在此下车)

^① 列文医生告诉我 ,他和帕斯捷尔纳克一起从莫斯科来 ,帕斯捷尔纳克要去参加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 ,因未能在涅格尔莱勒(边境车站)多停靠几小时好与我会面而深感遗憾。代表大会已接近尾声了 ,他不能再拖延了 !我们分别乘坐的列车曾擦肩而过。—原注



6月23日 星期日

在首都近郊,一片片的白桦林,一座座斜屋顶的茅草屋点缀其间。一栋栋小“达恰”(郊外别墅)坐落在开阔的土地上。在列车就要驶入莫斯科车站时,我们见到一位赤身裸体、蓄着灰白胡子的老者,他大概是位裸体主义者吧。



1935年6月23日上午11点,罗曼·罗兰夫妇到达莫斯科白俄罗斯车站

上午 11 点(瑞士时间 9 点) , 我们抵达莫斯科车站。几位苏联作家的代表登上我们的车厢 , 向我们表示敬意 , 他们是 : 特列吉亚科夫(《怒吼吧 , 中国 ! 》的作者) , 这是一位个子很高、头已谢顶的小伙子 , 他用深情的目光盯着我 ; 还有列昂诺夫^①、季纳莫夫^②等人 , 随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玛莎的儿子。从我们迈出车厢第一步直到我们登上汽车 , 照相机便对着我们一个劲儿地猛拍(后来照相机就一直不停地拍照 , 直到我们离开莫斯科)。尽管我们想方设法不透露抵达莫斯科的时间 , 以避开人群 , 但车站出口处还是聚集了許多人 , 他们排列成行在迎候我们 , 并向我们欢呼。我们乘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轿车几乎穿越整个城市 , 最终来到“政府大厦” , 大厦位于莫斯科河的另一岸 , 几乎与克里姆林宫相对 ; 在大厦的第 10 层楼上 , 阿罗塞夫的寓所正在迎候我们。三大间居室的通风很好 , 但屋顶下显得很热 ; 这套居室的厨房和浴室都太小了 , 而且装饰得也不美观 , 相互有些妨碍 , 这间居室虽然已经足够大了 , 但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苏联官员一家人而言 , 倒显得不够宽敞。他待我们十分热情 , 但热情之中却带着几分放荡不羁的老学究的态势 , 忘记了为客人提供基本的舒适条件。相反 , 他却找来服务人员来困扰我们 : 有护士、厨师 , 全都来自克里姆林宫 , 还有其他服务人员。与其说他们是来为我们服务 , 倒不如说是在妨碍我们 , 因为厨房小得容不下这么多人 , 他们便挤在走廊里。

① 列昂诺夫(Л. М. Леонов , 1899—1994) : 苏联作家 , 代表作有《贼》、《索契河》、《侵略》、《俄罗斯森林》等。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72 年)。

② 季纳莫夫(С. Динамов , 1901—1939) : 苏联文艺学家 , 曾任《国际文学》杂志编辑。

下午,在他家里休息,《真理报》和《消息报》的记者前来作简短采访,打断了我的休息。接着又结识了玛莎的女友莉吉娅·巴甫洛夫娜,她是莫斯科小剧院的经理阿马格罗贝里^①的夫人,她愿意为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承担秘书工作。夜里,我们已经上床就寝,灯也熄灭了,但却发生了几件意想不到的恼人小事,迫使我们赶紧从阿罗塞夫家溜走。那时已经过了午夜,我们最终还是住进了“萨沃依”饭店,饭店一直为我们保留着一层的一间大套房:共有6个大房间,因为最初我妹妹也打算同我们一起来,玛莎大概也想让她儿子住在她身边。我们只留下三间最能遮挡阳光的房间。这里的舒适条件应有尽有。我们采取了各种谨慎的措施:母婴医院的护士照料我的起居饮食,食品都来自克里姆林宫,一位年轻的亚美尼亚女秘书把守着大门,莉吉娅·巴甫洛夫娜守在电话旁。莉吉娅是一个奇特的女人:她身材修长,一头淡黄的金发,人长得很丰满,她朴实、端庄,轻轻笑起来时会发出咯咯的笑声。她起初似乎显得毫无个性,但一旦工作起来,却显露出其难得的可贵之处:她积极主动,聪慧过人,尤其擅长把握往来书信的口吻,她以我的名义所起草的那些信函可谓是滴水不漏,给每一个人复函时所用的口吻也是恰到好处。况且,她还善于在电话中将那些讨厌鬼打发掉,而又不伤他们的自尊心,她的手段令人佩服。所有这些工作,她都是不露声色、悄然完成的,似乎毫不费力。但当我们对她那非凡的能力感到惊叹、进而向她表示感谢时,她总是报以悄然一笑。“萨沃依”饭店服务周到,设施齐全,品位也很

^① 阿马格罗贝里(1899—1946)1933—1936年间担任莫斯科小剧院经理。

高雅,但它却无法抵御有轨电车发出的轰鸣声,有轨电车经过时,整栋楼房都在颤动,电车一直运营到凌晨两点,而且很早又开始新的一天的运营。饭店组织的舞会要一直持续到午夜之后。好在我可以凭窗看到街头的景象。一群群勤劳的人行色匆匆,疾步地走着,他们穿得很少,或衣着短小。几乎所有的人,不论男女都穿着本色服装,有的人穿着短袖衬衣,有的人穿着用本色布制成的连衣裙,裸露着胳膊,也不戴帽子。他们的衣着一点都不漂亮,但人人都显得十分结实、健康、精力充沛。



6月24日 星期一

克留契科夫给我们带来高尔基的一封信,信是写给玛莎的,信中的言词热情洋溢。我们同意周末到高尔基的乡村寓所去住,克留契科夫带着我们的允诺回去了。从抵达这里后迈出的第一步起,我们便发觉不同的阵营相互勾心斗角,围绕着我们而展开个人之争。阿罗塞夫只是在今天早晨才知道我们溜出了他家,因此感到十分狼狈,他要竭尽全力把我们弄回去。下午4点左右时,我们去参观克里姆林宫,博物馆馆长及阿罗塞夫陪同我们一起参观。热风管在送着热风,可我还是觉得馆内冰冷冰冷的。于是,我便加快了步伐,匆匆浏览馆内的历史及艺术珍品,尽管馆长对我的举动颇为不满。说实在的,我对那些珍品也不甚感兴趣。接着,人们又拽着我去飞机场,让我登进“真理”号客机,自从“马

克西姆·高尔基”号客机失事^①以后,这架飞机就是最大的客机了(有30来个座位)。回到饭店,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莫斯科之旅开端的失误就是未给我安排一整天休息,便马上开始各种参观活动。这个失误后来又出现了若干次。本来每隔5天,我就要有一整天的绝对休息时间,医生们也是这样嘱咐的:凭着这一天的休息,我会保持旺盛的精力。但在莫斯科怎样才能确保一整天不受干扰呢?

所有的报纸都登载了有关我抵达莫斯科的报道和文章。最热情洋溢的文章则出自布哈林^②和季纳莫夫之手。

^① “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机,苏联8引擎安特-20飞机。1934年制成一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可载客80名。1935年5月18日与另一架飞机相撞失事。

^② 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 1888—1938)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苏联经济学家和党内理论家,共产国际领导人。1928年被斯大林清洗出国家的领导层,1938年被审判处决,年仅五十岁。五十年后,即1988年,苏共中央为他恢复了名誉。此时遭贬,担任《消息报》主编。



6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阿罗塞夫带我们到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去看电影《恰巴耶夫》^①。在莫斯科,这部影片赢得公众的一致好评。影片中的几个场景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尤其是白军阵营中“心理攻势”那一段。我认为,在戏剧作品中,红军慷慨地向白军表示钦佩之意,恐怕这还是第一次。我想,假如写下《九三年》的维克多·雨果能活到今天,他看到这部影片也会心满意足的。但我还是更喜欢看苏联的老影片,特别是我在蒙特勒曾经看过的那些影片,如《亚洲上空的风暴》,这部影片用很长的篇幅去刻意描绘氛围、风景,影片也更富有音乐色彩。然而,我能理解那些狂热地偏爱《恰巴耶夫》的观众,他们曾经历过那场内战。这无异于他们的《伊利亚特》^②。阿罗塞夫坐在我旁边,用他对战争的回忆来评注这部影

① 《恰巴耶夫》亦译作《夏伯阳》。夏伯阳(В. И. Чапаев, 1887—1919),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红军优秀指挥员。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9年9月5日在乌拉尔的勒比威斯克村(今恰巴耶夫村)战斗中牺牲。苏联作家富曼诺夫将其事迹写成长篇小说《夏伯阳》,并根据该小说在1934年改编成同名电影。

② 《伊利亚特》据传为古代希腊盲诗人荷马所著,与《奥德赛》合称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记述了古希腊最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因迈锡尼王阿伽门农夺其女奴而愤然退出战场,使古希腊联军连遭失败,待他最亲密的战友也阵亡后,他发誓报仇,投入战斗,击毙特洛伊主将赫克托。

片。他说这类“心理攻势”早在恰巴耶夫之前就已采用过,那是在1915年,德军在弗朗德勒地区曾尝试过这种攻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内战中在波兰前线也曾采用过。

下午休息。

晚上,我们到大剧院去看舞剧。列宁格勒芭蕾舞剧团在此上演《巴赫契萨拉伊喷泉》,这是阿萨菲耶夫根据普希金的诗篇改编的新舞剧。这是本轮的最后一场演出。莫斯科的各界名流都来观看,况且人们把年轻的女舞星乌兰诺娃吹得神乎其神,人们相信她肯定会成为又一个安娜·巴甫诺娃。人们对我的接待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将昔日沙皇的包厢留给我,值我来看舞剧之际,特意将外交使团人员从这个包厢安排到别处。无论是在剧院前广场,还是在剧场内,当我们进入包厢时,或是在第三幕之后幕间休息时,观众的欢呼声一阵高似一阵。特别是在剧场前广场上及出口处聚集了許多人,他们向我们鼓掌,欢呼着“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我随意握了握几只伸过来的手,要和每个人都握手的话,恐怕我得长出一千只手来。在包厢里,我伸起双臂,忽而向左,忽而向右,笨拙地向人们致意。幕间休息时,剧场和政界的几位要人前来向我致意。莫斯科艺术剧院著名的院长涅米诺维奇·丹契柯激动地反复说着:“您在这儿。罗曼·罗兰在莫斯科!”马克西姆·李维诺夫^①表现出一种信任感,当年他到维尔纳夫来访时尚未有这种信任感;美国大使布里特也同样露出信任我的样子。不待我问,李维诺夫便说布里特“是个坏朋友”

^①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М. М. Литвинов, 1876—1951):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此时担任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

(或者说“他不是朋友”)。而布里特却甘愿为他留下把柄。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苏联的局势很不稳定,苏维埃政权顶多能维持三四年(即使这不是他的原话,他表述的肯定是这一层意思)。面对整个时局及战争威胁,李维诺夫表现得十分悲观。布里特自诩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老朋友,他描述了这部小说对于他本人、对于他这一代美国人产生了哪些影响。在演出期间,阿罗塞夫向玛莎提出难以置信的建议:他打算在一位军官朋友的帮助下趁黑夜将我们送出城,把我们送到一座别墅里,那儿距莫斯科有几公里远。他想让我们相信这座别墅是斯大林提供的,我们绝对不能拒绝,要不然斯大林会生气的。后来,我们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人民委员会关心我们,希望我们在苏联过得愉快,便将一座舒适、安谧的别墅交给我们使用,但自然只有当我们觉得住饭店或住高尔基家不舒适时,才会让我们住到别墅那儿去。人民委员会当然不会强迫我们去住,否则会给人留下笑柄。阿罗塞夫显然是在自作主张。他知道,我们一旦住进高尔基的寓所,定会摆脱他的监护,他想把我们劫到他那儿去,而且毫不迟疑,马上动手。我们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建议。我隐隐约约地瞥见这么多小集团、这么多阴谋诡计!

演出并不十分精彩。乐谱写得不错,但却带着兼收并蓄的假古典派的风格。芭蕾舞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最成功的部分是最后一幕中描写战争而又略带野性的舞蹈,还有剧中人物的服装。对于看过《伊格尔王子》(1910年或更早),或看过捷亚基列夫的芭蕾舞剧的人而言,这台舞剧没有任何新东西。乌兰诺娃的舞姿确实很优美。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到歌剧院或芭蕾舞剧院看节目了。我很难能忍受荒唐的装腔作势的风格。我想起了列夫

·托尔斯泰^①(笔下)的娜塔莎,大概她就是在这家古老的剧院里,观看了来莫斯科后的第一场演出。



6月26日 星期三

上午,列文博士来访。接着阿罗塞夫也来了。关于别墅一事,他又来发起新一轮围攻。他这是在同高尔基较量。围绕我而展开的一场场小型战役正在幕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整个下午留给了玛莎的娘家。那是一座破落不堪的老房子,仿佛要塌了似的,过廊既狭窄又弯弯曲曲的,它坐落在一条老街上。这栋房子里有尼古拉叔叔的一间小木窝棚(照他的说法,那是他的石棺),尼古拉蓄着长长的胡须,他那满脸白胡须依然十分茂密。全家人都回来的话,那几个房间就挤满了,但如果有朋友或过路的客人来访,他们便会腾出房间的一角,放一个沙发,让客人在此过夜。墙上挂满了家庭的照片。桌上摆着全套茶具。家中那几位旧时代的老妇人训斥尼古拉叔叔,要他赶紧闭嘴,尼古拉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他顺从地闭上了嘴巴。可那几位老妇人却一刻不停地聊起来。看到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玛莎

^① 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Толстой, 1828—1910):俄国作家,出身贵族。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对世界文学有很大的影响。罗曼·罗兰曾写过《托尔斯泰传》。

的婆婆) ,我不禁想起科希玛·瓦格纳^① ,想起冯克·布伦塔诺^②夫人。我们登上螺旋楼梯 ,来到阁楼上 ,我那年轻的继子谢尔盖和他娇小的妻子达尼娅就住在这里 ,屋顶的铁板被烤得滚烫 ,从窗口望出去 ,能看到越过所有房屋的树冠。在全家所有人当中 ,我觉得惟有谢尔盖最讨人喜欢。我喜欢他那美丽的双眼 ,眼中透出真诚 ,透出若有所思的心境。他正在准备考试 ,今天 ,他顺利地通过了第二项考试。

在返回的途中 ,我们在红场下了车 ,在广场上转了一圈。瓦西里升天大教堂让我十分失望。整个一个旧货店 ,一个破烂市 !颜色也都褪没了。弥撒活动也停止了。它已经丧失了生活气息。列宁墓后面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被涂成白色 ,也许这是一种失误 ,但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莫斯科正成为欧洲平庸的大都市 ,我在这儿真的领略不到一点它特有的韵味。我对那些平庸的建筑感到震惊。住在本城的居民倒反而比这座城市的建筑更具莫斯科的特色。

晚上 ,我们去了小剧场 ,就是阿玛格洛贝里所领导的那个剧

^① 科希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 ,1837—1930) :德国著名作曲家、戏剧家、指挥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1813—1883)的妻子。

^② 冯克·布伦塔诺(Funck-Brentano ,1830—1906) :哲学家。生于卢森堡 ,1870年入法国籍。曾任巴黎政治学校教授。著有《正确的哲学思想》、《希腊诡辩学派和当代英国诡辩学派》、《法国诡辩学派》等。



院,我们坐在位于舞台一侧的包厢里,观看奥斯特洛夫斯基^①的喜剧《在他人之宴上一醉方休》)。尽管我竭力不露面,但观众还是认出了我,他们向我欢呼。阿玛格洛贝里走上舞台,在帷幕前向我致欢迎词。整个喜剧演得很生动,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演员的确都很棒。这台喜剧可以在巴黎上演。幕间休息时,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剧中那些富裕的资产者共享夜宵。

我们回到酒店后,阿罗塞夫又来了,肯定又是为别墅一事而来。我们那位正直的女护士对自己的职责尽心尽力,在我的房间门口拦住了阿罗塞夫:“您不能进去。”“可您知道我是谁吗?”阿罗塞夫用惊诧的口吻问道。“我当然知道。您可以枪毙我,随您怎么说都可以。但您就是不能进去。”

他没有再争辩,气乎乎地走了。但他绝对不会将此事丢在脑后……

夜里,我不但感到疲乏,而且还在咳嗽。

^① 奥斯特洛夫斯基(A. H.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俄国剧作家。代表作有《肥缺》、《大雷雨》、《火热的心》、《森林》、《狼与羊》、《没有陪嫁的女人》以及童话剧《雪女》等。擅长人物性格的刻画。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形成和发展有很大影响。曾任俄国剧作家协会主席、莫斯科帝国剧院艺术指导。



6月27日 星期四

普列特涅夫医生来访,有人叫他来为我诊视。他是治疗心脏病的著名专家。在诊视一番之后,他对我说:“我要是您的那位瑞士医生,我不会让您出门旅行。瑞士医生了解您,但他们并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条件。”他说我的神经一直太紧张,未得到很好的休息。他要我不得再会见任何人,建议我尽快离开莫斯科。甚至就连高尔基的乡间寓所似乎也不适合我疗养。假如那里无法保证我完全离群索居,他要我搬到斯大林提供的别墅里去住。其实,普列特涅夫医生就是阿罗塞夫拽来的,他想利用医生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当我和医生独自在一起,没有任何人在场时,他小心翼翼地透露出来。我见他在投石问路,而且能感觉到他是一位不露声色的敌对分子。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曾被投入监狱,但高尔基对他十分敬重,况且也需要他,便设法将他保释出来。我无法验证这件事的真伪。普列特涅夫医生谨慎地拿当今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对比,其含义可真是意味深长。他真想生活在40年后,而非今天。时代残酷呀,但他见我并未表露自己的情感,便马上补充道:“不管怎么说,选择已经作出了。要是在10年前,也许人们还会犹豫。但今天人们不再犹豫不决了。要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

下午4点30分,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举办招待会。50多位政界要人及著名人士参加了招待会,其中有:布哈林,他的外表总是

很年轻,面带微笑,性情随和,思维敏捷,待人亲善,他身材不高,特征明显,不禁让我想起昔日的达努恩乔·施密特教授,曾乘“柴柳斯金号”破冰船去探险,他个子很高,为人善良,是沃坦这一角色的最佳人选(布哈林语);布勃诺夫,教育部人民委员;克里斯蒂,我以前就认识他,他曾和卢那察尔斯基到维崴拜访过我,现在任俄罗斯绘画博物馆馆长。特列基亚科夫、季纳莫夫、斯塔索娃,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雕塑家梅尔库罗夫,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博物馆及图书馆的负责人等。在6盏镁光灯的强光照耀



布哈林像

下,照相机对着这些人物一通猛拍。在餐桌上,我坐在布哈林旁边,还与卢那察尔斯基女士相邻(不知究竟何故),和施密特隔得不远,与斯塔索娃相对。各种各样的醇酒、香槟、冰淇淋和水果供大家享用。阿罗塞夫既是东道主,又是本次招待会的承办者,向大家致了祝酒辞,在致辞中,他竟然把我比作太阳!可怜的太阳!我不知在答词中都说了些什么^①。茶点用毕之后,普罗科菲耶夫演奏了钢琴曲;一位年仅13岁的小提琴手,大概叫戈尔斯坦^②,拉

^① 我只记得真情地回忆起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但女译员将我的讲话翻成俄语时并未提及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未表达出我对他的谢意。—原注

^② 他刚刚在华沙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奖。1935年6月6日那期的《苏联建设》杂志刊登了他的照片。—原注

出的乐曲美妙动人,他那把握音乐的能力令人折服。在阿罗塞夫致辞之后,参加地铁建设的三位工人代表宣读了献给我的祝辞,还送给我两本工人创作的诗集。但阿罗塞夫却未让他们参加宴会,至少我在宴会上没见到他们。要是让他们坐在我的右边,总比让卢那察尔斯基夫人坐在我旁边好得多。虽然人们在提倡平等,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在各阶层或各职业间亦提倡融洽相处,但那些一边喝着香槟酒,一边欣赏着普罗科菲耶夫、肖邦和亨德尔乐曲的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在返回饭店途中,我看到了《战争与和平》中描述的罗斯托夫家的小邸宅。



托尔斯泰庄园景色(他在这座房子里创作了《战争与和平》)

晚上,吃过晚饭后,我早早地上床就寝,玛莎则到剧院去看戏。大约在9点半时,那位正直的女护士到我房间来,对我说:

“我得向您告辞了。有人要我回去。”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以为她家里出了事,她肯定有难言之隐。于是,我对她说:“那您至少得等我妻子回来以后再走,好不好?您要是就这么走了,她没同您吻别会感到很难过的。”不,”她答道;“我真的不能再等了。汽车在楼下等着呢。我得马上走了。”说完,她便走了。此后,我们再也未见到过她。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这肯定是阿罗塞夫在报复她。我情愿相信阿罗塞夫并不能由着性子去处置她,只是把她支走,让她离开我们。她是共产党员,应当有办法保护自己。我们对列文医生谈起过这事,他要我们放心,并保证我们还能在高尔基那儿再见到她。但实际上,我们的确再也未见到过她。我把对这事的感觉记在笔记本上:“让个人手中掌握过多的权力是不明智的。当一个人的权力受到另一人权力的制约时,勾心斗角、记仇怀恨则在所难免,甚至会引发你死我活的争斗。”

诚然,阿罗塞夫并不是一个恶人。但他却是个心胸狭隘、脾气暴躁的家伙,就像一头野猪。在莫斯科,每当谈到他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用轻蔑的口吻说:“那是一个杜拉克(笨蛋之意)。”其实他并不笨,他贪图虚荣,养成好面子的恶习,不断膨胀的虚荣心一旦受到伤害,便会做出愚蠢之举,进而酿成危险的失误,这个陋习他已改不了了。他曾为此而丢掉了大使的官衔,恐怕不久的将来还会因此而丢掉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的乌纱帽。



6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我要去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整个上午我都在思索该和他谈哪些内容。

下午4点,阿罗塞夫来接我和玛莎。工作人员引导我们三个人穿过长长的走廊,经过几间秘书们工作的办公室,最后来到斯大林的办公室。这间大办公室位于克里姆林宫一翼的顶层,窗子朝向内院,院子里摆着当年从拿破仑手中缴获的战利品(那是拿破仑从俄国撤退时被俄国人缴获的)。

会谈从4点10分开始,一直持续到差10分6点。要不是因为担心过多地占用斯大林的时间,会谈可能还会延长一些时辰。我们会谈时,外面还下了一阵雷雨,雷声轰鸣,雨点拍打着窗户。

斯大林与他的画像有很大的差别:他的个子并不高,身体也并不强壮,远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他的个子较矮,身材较瘦。他那头极有特色的粗硬头发已开始变得花白,而且也显得稀疏了。大概也就是这一两年,他变得苍老了。但他的目光依然那么直率,那么炯炯有神,他那像谜一样的微笑总是(或可能是)那么真诚,那么令人难以捉摸,又带着一丝冷漠;他心地善良,但不留情面;虽会受人哄骗,但也十分诡诈。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能控制住自己。他说话时,嗓音不高,他的鼻音和喉音都很重(有人告诉我,那是格鲁吉亚口音),有时他会停顿很长时间,似乎在思索着

什么。他更擅长于听别人说话,而不善于表达。我讲话时,他在一页纸上用红蓝铅笔潦草地写着,把我所说的要点都记下来(我没有向他索要这份手记,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斯大林会见罗曼·罗兰夫妇(左一为阿罗塞夫)

我们坐在一张大桌子的一端,他坐在我们中间,我坐在他右侧,阿罗塞夫坐在他左侧,玛莎挨着我。阿罗塞夫借口给我们担当翻译,也挤进来参加会谈(因为斯大林像其他人民委员一样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法语)。但他的翻译实在是糟糕,玛莎尽可能纠正他的翻译。

经过一番致意之后(我真的感到特别高兴),斯大林要我先讲。于是,我便说起来,我讲了20分钟,他没有打断我的话。

根据我的笔记,我对他说: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在百忙之中能接见我,我谨向您表示感谢。也许您能想像得到,您的名字及您本人对我们西方人意味

着什么,知道您在领导这么一个伟大的新世界,对我们而言,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可靠的保障。我们所有人都为这个新世界感到自豪,并对它寄予厚望。今天能与您握手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想对您说,在这里大家对我的关怀让我无比感动,尤其是您邀我到您的别墅去疗养。”

(对此,斯大林答道——前文我已经记叙过了——那座别墅并不是他的,他个人没有别墅,邀请并非是他个人发出的,而是人民委员会发出的,也就是说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他本人决定将归国家所有的一座别墅让我们使用,这些别墅位于莫斯科郊外,供来往的客人们使用。)

我接着说道:

“现在,我想以我的双重身份同您谈一谈。我既是苏联的老朋友和同路人,又是西方的见证人、观察家,还是年轻人及同情苏联的法国人的挚友。

“您知道,在西方千千万万人的眼中苏联代表着什么。他们对苏联的认识非常模糊,但他们觉得那里体现着他们的希望、他们的理想,虽然这类理想是五花八门,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在目前西方遭受严重的经济和道德危机之时,他们期待着苏联能给他们指明方向,提供纲领,解除他们的疑虑。

“诚然,要满足他们的愿望是很难的。苏联本身有自己的任务,而且这个任务十分艰巨,它在国内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它要全力以赴去搞建设:苏联所能提供的最佳纲领,就是它的业绩。它指明了道路,而且证明它在大步向前走。

“然而,苏联并不能卸去当今世界局势压在它身上的责任,这

是某种‘神圣’的责任,要去关心其他国家的大众,他们信赖你们。将贝多芬的名言:‘人啊,你要自助啊!’挂在嘴上远远不够。应当去帮助他们,为他们指点迷津。

“不过,要能有效地实施这项工作,应当考虑到每一个国家所特有的个性及思想观念,在这里我只谈论法国。不了解一个国家传统的思想观念,或对它漠然处之,便会造成严重的误解,而且确实引发过严重的误解。

“不要期待法国公众会作出什么事,即使那些支持你们事业的同情者也是如此,这是一种辩证的思想,而思想辩证法在苏联已成为某种习惯。法国人习惯于抽象逻辑思维,喜好争辩,认死理,善于推理而不勤于实践,这就是法国人的个性。要克服这种个性,就必须了解它。这是一个民族,一种信念,他们惯于争辩。总要给他们讲明采取行动的道理。

“我不妨冒昧地说几句,苏联目前的策略则是并不刻意将其采取行动的道理讲给外国朋友们。然而,那些合情合理、令人信服的道理并不是没有,但它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我个人认为,这是严重的失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而且确实导致了不切实际的解释,或故意歪曲真相的说法,将成千上万支持苏联的同情者置于混乱之中。最近,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正直的法国人都陷于这种混乱之中,正因为如此,我才向您指出来。

“您大概会说,作为苏联同路人的知识分子,向他们解释正是我们所能起的作用。我们不足以胜任这项工作,首先连我们自己都不熟悉苏联发生的情况,你们也不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资料,好让我们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能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

“我觉得应当在西方设立一个办事处,以促进法苏在知识领

域相互理解 ,这个办事处类似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但更富政治色彩。否则 ,误解愈积愈重 ,而苏联的外派机构 ,如大使馆等 ,都不去设法消除这些误解。人们似乎以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误解会自然消失的。实际上 ,它们是消失不掉的 ,反而愈聚愈浓。误解刚露苗头时就应采取行动 ,只要有误解产生 ,就要随时设法消除掉。我希望你们在对待法国公众舆论时采取有别于对待苏联公众舆论的对策。

“ 谨举几个例子 :



斯大林和基洛夫(中)

“ 根据诉讼的判决 ,或依照修改后的刑罚法律 ,苏联政府采取这样或那样的决策 ,作为主权国家 ,这是政府所应有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 ,涉案的问题或个人会引起广泛的注意 ,影响也会很大 ,外国的舆论会热中于这样或那样的案件。最好能避免意见的



冲突。那么人们为何不这样做呢？

“你们有力地镇压那些参与密谋反对基洛夫^①的帮凶，此举百分之百正确。但你们在审判这些帮凶的同时，应当拿出对这些疑犯的指控来，要让欧洲、让世界的公众都了解这些指控！”

“你们判处作家维克多·塞尔什^②3年徒刑，流放到奥伦堡。本来这是一个不大的案件。但两年来，这事在欧洲舆论界闹得沸沸扬扬，为什么任由它肆意扩大呢？这个案件的影响被夸大了，甚至有人为煽动之嫌，这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了伤害，为什么就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呢？本来，在案件的初始阶段，就应把塞尔什的罪责、把围绕对他的处罚而编造的不实之词统统揭示给法国公众，但为何却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身上扎了刺不马上把它拔出来，而非要等到伤口感染呢？我拿塞尔什这个案例作为典型举出来，因为我本人并不认识塞尔什，我不过是他的几个朋友的朋友，我是从客观的视角来谈这事。我认为，在

① 基洛夫(С. М. Киров, 1886—1934):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3年当选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书记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西北局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12月1日被暗杀。此事件直接导致了30年代的肃反运动。

② 维克多·塞尔什(1890—1947):比利时人,无政府主义者。1919年赴俄国,投身布尔什维克运动。他是党内左派势力的人物,1928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并被流放到奥伦堡。法国掀起一场拯救他的运动,参加拯救运动的不乏著名的作家,其中包括纪德和杜亚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也因此而产生纠纷,形成“塞尔什”事件。布洛克和罗兰也分别采取了行动,尽管他们对塞尔什本人并无好感。罗兰的干预虽不露声色,但还是十分有效的。塞尔什于1936年被驱逐出苏联。

一个曾经历过卡拉斯和德雷福斯事件^①的国家,让一个自称遭受了迫害的家伙成为请愿运动的中心,这总是十分危险的。

“另外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例:你们刚刚颁布了一项对年满12岁的少年犯进行处罚的法律。该法律的文本外界并不熟知,然而,即使外界了解这个文本,那也给舆论界授以可怕的把柄,死刑的威胁似乎就悬在这些少年犯的头上。这项法律的动机是要让那些所谓不负责任的人,尤其是那些想利用孩子们的人产生畏惧心理,对此我能理解,但公众并不理解。公众见威胁业已形成,他们的命运掌握在法官手里,法官在冲动时会滥用他的职权。这大概会成为抗议运动的导火索。要在抗议运动爆发之前,对其有所防备。

“你们一定要重视西方人的思想情感!在西方,感情的舆论还是很重要的。即使它不能左右一个刚毅果断的政府,恐怕也会影响所有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政府,因为这样的政府毕竟是占多数。

“最后,我要说说目前最大的误解,这种误解是由战争问题及

^① 德雷福斯事件: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法国总参谋部犹太血统的军官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1859—1935)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的事件。1894年9月26日,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女仆的一个法国情报人员,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上校的字纸篓里发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了关于法军布防情况和炮兵训练动向等五份法国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清单。法国总参谋部反间谍部门认为是犹太人干的,又以字迹相似为由,认定罪犯是德雷福斯。尽管缺乏有力证据,法庭仍判处德雷福斯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围绕德雷福斯案的斗争,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力量(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众多进步作家如左拉支持德雷福斯,抨击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德雷福斯在1899年被政府宣告无罪,1906年恢复名誉。

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而引发的。在法国,这个问题本来早就应当用心去研究。几年前,我曾提醒巴比塞^①和《人道报》的朋友们注意他们那无条件的反战运动之危险。(应当指出的是:在说这番话时,我从客观的视角出发,这是他们的观点而非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是非暴力的支持者)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不引导公众去区分不同性质的战争,不去区分依不同战争而采取的对策,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假如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苏联和苏联人的理想是需要和平,渴望和平。但他们的事业决不能等同于绝对的和平主义,要将手段与真正的目标区别开来。1932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国际反战大会,会后发起的运动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好。现在,舆论界已迷失了方向,不仅和平分子,而且就连苏联的朋友、有着社会主义思想、同情共产党的人士在舆论上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苏联与法兰西共和国在政治上改善关系、军事上结成同盟,舆论对此极为不解。这给人的思想造成极大的混乱。许多重大的革命策略及辩证法的问题都应解释清楚。应当坦率地、开诚布公地解释清楚,越坦率、越开诚布公越好。”

说到这儿,我停了下来,尽管我在笔记本上准备好要说的话尚未完全说完。我对斯大林说:

“我认为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要点。我讲了这么长时间,请您原谅。”

^① 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1923年加入法共。著有《炮火》、《光明》等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组织过文学团体“光明社”,是1933—1935年反法西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斯大林客气地说他很乐意听我说。接着,他开始讲起来。

他说:“现在,您能允许我来回答所有的要点吗?”

他讲话时,不时瞥一眼记在纸上的红蓝铅笔勾画的潦草笔记。但他是依照他的顺序,而并非按我提出问题的顺序来回答,按照他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考虑及思路来回答。我在笔记中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我凭记忆将其记录下来。有关斯大林讲话的准确思路,人们可在官方会谈纪要中略见一斑。他看上去绝对俭朴,无可挑剔,显得正直、诚实,他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他人。他会说:“也许我们搞错了。”他似乎总是乐于修正自己的论断,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会让经验去检验,让经验去修正,并为此大开方便之门。

他不会竭力去美化自己的行动。他谈起在基洛夫遇刺后,确实有几百人被仓促地处死了,此举并不合法,也有悖于道德观念,这或许是个政治错误,但“我们被情感(激情)冲昏了头”。这几百人并未直接参与刺杀基洛夫的行动,但他们却是恐怖分子,是德国、波兰、立陶宛(或拉脱维亚?)的特务。我们要杀一儆百,而“我们又不想让这些杀人恶魔去享受公开审判的礼遇,其中有些凶犯甚至傲慢地吹嘘自己如何敢动手杀人”,公开审判也许会成为他们的讲坛……

斯大林接着补充道:“我们并不乐于去审判,去处决。这是一种极为肮脏的手段。置身于政治之外,落得两手干净,这样最好,但如果我们要想解放全体受奴役的人,那么我们就没有权利置身于政治之外。当我们同意投身于政治之中,那么我们的言行都不是为自己,而是服务于国家,因为国家要我们不讲情面。”

他还说:“我们不但要和(苏联)外部的朋友打交道,他们责备

我们太无情了,还要和(苏联)内部的朋友打交道,而后者往往责备我们太宽容了。我们会把死刑降到最低限度,即使像参与刺杀基洛夫的同谋,如季诺维也夫^①和加米涅夫^②等人,我们也不会将其处死,他们确实知道这起密谋,可却任其发展,甚至希望刺杀能成功,但他们并未积极参与暗杀行动。然而,苏联境内的朋友们对我们赦其不死感到极为愤慨。”

当谈到对少年犯进行惩治的法律时,他说:“啊!这事还真难以向西方人解释。您瞧!资本主义世界的敌人真是不遗余力。他们把特务派到各个阶层中,派到教会里,派到老百姓家中,去毒害妇女和儿童。这就是事实真相。我们最近发现,有些出身于旧家庭的年轻女人竟然能混入与党的领导者亲密接触的范围内,想毒死他们。(斯大林并没有明确说明,但我也最近才知道,这事就发生在他家,他雇用的一位女图书管理员要对他下毒手,在她要动手时被抓,而他却以为这人十分可靠。她是由人民委员叶努

①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苏联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人。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2年任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历任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主席等职。1925年与加米涅夫结成“新反对派”,1926年又与托洛茨基结成联盟。同年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也免除其职务。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在承认错误后被恢复党籍。1932年被再次开除出党。1934年以叛国罪遭逮捕,1936年被处死。

② 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 1883—1936)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新反对派”。翌年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公开承认错误后恢复党籍。1932年再次被开除出党。次年重新恢复党籍。1934年第三次被开除出党,以叛国罪遭逮捕,并在1936年被处死。

基泽介绍的,而后者则放松了警惕。)我们的敌人鼓动这些女人去犯罪,她们以为自己就是夏洛特·科尔黛^①。发生在孩子们身上的事则更糟糕,他们到处组织黑帮团伙,十五六个小坏蛋,手持凶器,去暗杀‘青年突击手’,不论他们是男是女(有时甚至根本没有政治原因,就因为被袭击的目标是‘青年突击手’,是好学生)。他们是受某些成人的教唆才行凶的,而那些成人又是被我们的敌人收买的。他们杀人越货,强奸幼女,逼良为娼,干了许多坏事。直到最近,在调查一起少女被杀案件时,这一系列暴行才被揭露出来,实际上这类劣迹已有两三年了。过去我们过分致力于政治建设,忙于集体农庄的事务,对这一切竟全然不知,我们也确实没有时间……当我们得知此事时,我们对此深感震惊。怎么办?铲除这些流氓团伙起码得用两三年的时间,我们能办得到。但从现在起,就得创造出威慑力量,我们只好制定了这部制裁法,对年满12岁的少年犯,尤其是对教唆犯严惩不贷,让他们感到死刑的威胁。但事实上,这部法律从未付诸实施过。我本人希望这部法律永远也得不到实施。当然,我们不能公开声明,这部法律将不会付诸实施。这样的话,这部法律就会失去其必要的威慑效果。况且我们已下达了密令,只严惩那些教唆孩子们犯罪的成年人。对这些人,我们决不会手软……”

(回想起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况且又都是妇女和儿童躲在阴暗处干的勾当,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个残酷的现实,我们在西方将这事实忘得一干二净,那就是:野蛮、凶暴的旧俄国还依然存

^① 夏洛特·科尔黛(1768—1793)法国人,暗杀马拉的刺客。

在 ,布尔什维克的独裁者们要将它制服。)

谈及苏联整体政策时 ,斯大林否认苏联在给其他国家下达指令。他说：“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每个国家的国情与局势各不相同。我们没有能力来领导他们。要是领导他们 ,那将会犯下一系列致命的错误。我们这些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人 ,过去曾是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学生。假如在战争中及战后 ,我们盲目地跟着老师走 ,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每一个国家 ,该走什么样的路 ,应该由党自己来决定。”

关于战争及政治结盟的问题 ,他说：“有两项义务值得重视 ,一个是国家的义务 ,一个是党的义务。苏维埃国家目前正努力与法兰西共和国建立联盟关系。既然是联盟 ,那么就应坦诚相见。每一方都应武装起来 ,并随时准备援助对方。否则 ,建立联盟又有何用呢？欧洲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改变了社会斗争的局面。法西斯主义就是对自由的毁灭 ,是对进步运动的毁灭。它迫使共产党人与西方‘自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结成短暂的联盟 ,以抗击法西斯主义 ,目前在西方尚存着某些自由以及采取行动的能力……但假如法西斯主义不当政的话 ,我们会让它们统统见鬼去！……”

斯大林接着说：“法国共产党不应因此而放松对国内资本主义的斗争。如果由希特勒分子挑起的战争一旦爆发 ,那么共产党人将参军参战 ,向希特勒分子开火 ,但这并不妨碍他向自己的政府表达他的意愿。至于提倡破坏工厂及货栈 ,这绝对不行！共产党的理论决不接受这种举动。共产党的十月革命没有毁坏任何一家工厂 ,它不过将工厂夺回到自己的手中。”

斯大林一边说,一边露出一丝冷笑:托洛茨基^①先生不再坚持去回忆党章的某一条款,即共产党人执政的国家可以同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结为同盟……他忘记了……况且,这个条款已经被取消了。因为不需再把这样一个条款写入某一章程之中,只要在实践中根据不同局面付诸实施就足够了。”

接着,他问我是否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是否还有其他事情要问他。

我说:“我还有其它话题要同您讨论——这个话题说来更轻松,更让人高兴,比如像新人道主义,斯大林同志,您还是新人道主义的倡导者呢,您在不久前的一次措辞优美的讲话中说道‘世间现存的所有资本中,最宝贵、最具决定性的资本就是人’,即新人及由新人创造的新文化。为达到革命的目的,就要去赢得人的希望,要做到这一步,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为他铺设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大路更合适的了,这条大路正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概括。在马克思列宁的遗产中,有关人的精神、丰富人的发现力与创造力

^① 托洛茨基(Л. Д. Троцкий, 1879—1940):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托洛茨基联盟的首领。生于乌克兰一个富裕的犹太农民家庭。1897年组织“南俄工人联盟”。翌年被逮捕、流放。1902年逃至伦敦。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同年9月参加孟什维克的会议。1905年革命时期任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1912年组织“八月联盟”,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二月革命后回国,参加了区联派,并和区联派一起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当选为党中央委员、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1920年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反对新经济政策。列宁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攻击列宁主义。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党联盟。翌年被开除党籍,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1938年在巴黎组成“第四国际”(“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暗杀。

那一部分或许是迄今为止^①在西方最不为人所熟知的部分,然而这些论点对像我们这样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正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斯大林答复说,他对我引述他那有关尊重人的讲话感到高兴。他用嘲讽的口吻问我:“您喜欢那篇讲话稿?……可我们的很多同志却不喜欢它。300年来,他们一直在遭受棒打,对此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说:‘尊重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玩艺可不适用于我们呀!’”

接着,我们又回到新人道主义和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话题上。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时,他说了一些漂亮的话语,语气热情洋溢,信心十足,那就是要让人摆脱非本愿的束缚,去争取更大的自由。让人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就是目的,他建议我读一读《反杜林论》^②。

要不是顾忌过多地占用他的时间,会谈可能还会继续下去,我作了一个欲起身的动作。他站了起来,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并不喜欢人们恭维他,或向他表示谢意。他用嘲笑的口吻说,感谢总会给他留下某种印象,似乎人们并不期待着他能接受别人的谢意。他希望能有其他机会同我见面:“在高尔基家好吗?”那太好了!”

① 我要在这里指出,法文版的最新出版读物已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它与科学进步的关系。—原注

② 《反杜林论》:全名《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恩格斯所著(1878年)。这部著作批判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欧根·杜林的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有人叫来克里姆林宫的摄影师,为我们拍了四五张照片。

我们就此告辞。

会谈持续了1小时40分。阿罗塞夫负责记录,并交给我们一个记录副本。

晚上回到“萨沃依”饭店时,我见到安东尼奥·格拉姆希^①的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1岁,他们前来向我表示谢意,感谢我为他们的父亲所做的一切。(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引起世人的关注,成功地为一位共产党议员赢得了部分自由,他被墨索里尼^②长期关押在狱中,身患重病,已奄奄一息。)孩子是由他们的姨妈带来的。而孩子的母亲自丈夫被捕后得了严重的精神病。

① 安东尼奥·格拉姆希(1892—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之一,因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被判处20年监禁。罗兰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为拯救他而高声呼吁。

② 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 1883—1945):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法西斯党党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之一。1901年师范学校毕业,曾任小学教员。17岁时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成为社会党执行委员。1914年因鼓吹参加战争被开除出党。1919年创建法西斯组织“战斗团”。1921年正式建立法西斯党。1922年10月带领党徒进军罗马,迫使国王任命他为首相。还先后兼过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军事大臣、殖民地大臣等。1928年取消议会制,自任首相,建立法西斯独裁制度。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与希特勒德国结成法西斯同盟,共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4月被处决。著有《我的自传》等。



6月29日 星期六

上午 ,到莫洛佐夫博物馆去参观(现代西方绘画展)。年轻时那些令我着迷的图画再次展现在我眼前 :莫奈、雷诺阿、塞尚、高更 ,还有毕加索、马蒂斯的新作等。该馆只收藏着一幅于特里约的画作 ,在我的要求下 ,他们把这幅画找来让我看。



托尔斯泰庄园景色(1)

在返回的路上,我们还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这处居所距离博物馆不远,它朴实无华,但很舒适,是一座独立的别墅式寓所,有内院,还有一个小花园,颇像法国外省一个有钱人的住宅。



托尔斯泰庄园景色(2)



托尔斯泰庄园景色(3)

中午吃饭时,与尼娜·涅姆琴柯会面(她是广播电台文学部主任,曾就《约翰·克利斯朵夫》给我写过一封措辞优美的信函,将克利斯朵夫誉为年轻伙伴们的战友,在内战中鼓舞着她的伙伴们去战斗)。她特意从克里米亚赶来同我会面。这真是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她见到我竟然流下了泪水。她一口饭也吃不下去,她是顿涅茨克地区一位矿工的女儿。童年时,她曾就读于实用艺术学校,上学期间,有幸遇到一位好老师,老师对她很器重,教她从学习罗丹开始,引导她接触现代文化。革命爆发了。她虽然没有任何政治信念,但却毅然决然地上了前线。正是在前线她读了

《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卷)。后来上了大学。现在就任广播电台文学部主任,她还常为《真理报》撰写文章。晚上,玛莎的女友,在学校任教的米丽琴娜小姐来访,正如她所说的那样,这些工人家庭的孩子们并没有什么文化背景,但他们却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和狂热的激情,他们决不会问是为谁、为什么而奋斗:当然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他们的一切都是革命给的。革命的事业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业。

下午5时,克留契科夫来接我们,带我们去高尔基家,到他那位于莫斯科小尼基斯卡亚街的寓所去。高尔基正站在门槛处迎接着我们。



高尔基当年在莫斯科的别墅,他在这里会见过罗曼·罗兰



如果斯大林与人们想像的绝然不同的话,那么,高尔基则与人们想像的丝毫不差。他个子很高,比我还高;一张大脸,虽不漂亮,但却透出善良;鼻子很大,嘴上蓄着浓密的胡子,原本淡黄色的眉毛已露出斑斑灰白,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一双大脚,穿着肥大的衣衫显得身体有些单薄;嗓音似低沉的男中音;淡蓝色的眼睛深处流露出浓浓的善意和丝丝忧郁。他与我拥抱,使劲握着我的手时,我才发现,他比我要高一头。

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喝茶。克留契科夫不得不起身去接电话,电话装在居室里,他先后接了三四个电话。(高尔基住的这所大房子并不归他所有,是大富贾里亚布申斯基建造的,装饰得极为豪华,但却十分粗俗,高尔基讨厌这种风格。)

不论是高尔基还是克留契科夫,他们都不会讲法语,高尔基只会讲几句意大利语,虽然他曾在意大利逗留过很长时间。玛莎为我们作翻译。高尔基因患支气管炎,不停地咳嗽,但这并不妨碍他吸烟,他一天要吸一盒香烟。他知道这对他的身体有害,而且保证不再抽烟了,那得等两年以后。

大家聊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既谈到昨天与斯大林讨论的问题,也论起旧俄国野蛮的陋俗,这些陋俗至今依然存在。高尔基希望人们能将这这些伤疤公开揭露出来。他谈起了叶努基泽,这人竟然失去警觉,上当受骗,将一名女刺客介绍到斯大林家里。许多现象都遭到高尔基的抨击,特别是在工人当中维持的那种虚荣心,为他们颁发英雄奖章,为模范人物挂大幅肖像,等等。“一个

好的劳动者不过是在履行他的职责,怎么就成为英雄了呢?”在公开场合,他曾不止一次地批评这种恶习。他似乎觉得许多老同志常常已经懈怠了。我对他说,在我的人生之路上,已把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甩掉了。这时,他十分忧郁地说:“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可又能怎么办呢?……”他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寄托在值得仰慕的新的思想境界上。他想让我了解鲍尔舍夫少年犯公社,这是一个对少年犯进行改造的典范。他讲述了我所知道的事情,讲述了我苏联代表着什么。在去年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他就已经注意到作家们对我的认可,对我所做的工作的敬重之意,甚至有些法国作家也流露出这种敬意,即使这些作家并不是我的朋友。他想让我在苏联、在克里米亚多住些日子,可他又不能把这些地方吹得太神奇,于是他便竭力要拉我沿伏尔加河去旅游几天。他谈起俄罗斯农民的变化,过去他一直对农民极为苛刻。在他的内心深处有某种厌倦感。当然最近患上的支气管炎也让他饱受痛苦,把他弄得心力交瘁。

晚上到小剧场去看戏,上演的节目是列昂诺夫编写的现代喜剧《斯库塔涅夫斯基》。但当我们按演出时间来到小剧场时,剧场里的会议尚未结束,新闻系的学生与教师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俄罗斯人没有时间观念,而且又特别健谈,结果演出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大家很快就认出了我,向我欢呼致意,还有人向我投来鲜花。(在演出休息期间,这种场面再次出现,真让人感到厌倦不已!)戏剧本身及演员们倒成了陪衬了。表演有些过火、夸

张,这是一种矫揉造作的狂热,有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①之笔的感觉。



斯大林和高尔基(右一)坐在列宁墓前的台阶上。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俄国作家。军事工程学校毕业。1844年退役后成为职业作家。1849年因参加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小组,被判死刑,后改判苦役四年,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后对革命失去信心,试图从宗教中寻找出路。发表了不少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长篇小说,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等。其作品充满消极悲观情绪和宗教哲学色彩。

列昂诺夫也坐在我们的包厢里。他身体结实,性情爽朗,外表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36岁)。他本人与他的作品似乎没有什么共性。他拿出一本厚厚的手稿向我炫耀,这是为《俄罗斯澡堂》剧本而设的名人签名集,他竟打算让我在那上面写上几页!被我拒绝了!



6月30日 星期日

今天,青年工人们(来自工厂、公司及工会)要举办大型体育盛会。

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只有片片云彩。莫斯科那淡蓝色的天空真是美极了,朵朵白云从空中飘过。时而骄阳似火,时而清风扑面。12点半,阿罗塞夫驾车来接我们。穿过克里姆林宫,我们来到红场,这时红场上已是人山人海,在这儿要举行有12.7万人参加的大型游行活动,参加者不仅有男人,还有女人和孩子。在列宁墓脚下的人行道边上,组织者为我们留了两个座位。要走到座位上去,就得从最前排的人群面前经过,他们向我鼓掌致意。(此后,在一部新闻记录片中,我又看到了那场景。在这种场合下,我看上去倒不显得那么滑稽,那是因为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在向我鼓掌。这样,我的步履轻盈,泰然自若,任何事情也惊动不了我。在记录片中,我似乎打着亲切的手势来回应善良人们的敬意,仿佛在对他们说:“好了,好了,你们真

是太好了……”其实,当年在维也纳纪念贝多芬的盛典上,在最大的饭店里,我也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波拿巴公主问我在这儿感觉如何,我不假思索,不经意地答道:“这家小饭店挺不错的……”)



红场上的“五一”节游行(油画)

我们就座后不久,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就来了,他们登上列宁墓的检阅台。斯大林远远地瞥见了我,叫人请我上去。我们也登上列宁墓,但谢绝了第一排的贵宾席,我们坐在检阅台的左侧,靠近栏杆处。我认识了所有的首脑:上了年纪的加里宁主席,他蓄着灰白的山羊胡子,头戴一顶鸭舌帽;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①、卡冈诺维奇等人面带微笑,看上去显得很年轻(比

^① 伏罗希洛夫(К. Е. Ворошилов, 1881—1969)苏联党、政、军领导人。此时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人民委员(1934—1940年)。



高尔基、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1934年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体育大检阅)

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季米特洛夫比我想像的要朴实、谦逊得多,他尚未从德国那场磨难中恢复过来,身心依然十分疲惫;著名的布琼尼将军与他的肖像相比,倒不像赫赫有名的战将,他对我表示出敬重之意,显得极有礼貌,似乎在证明他也是知书达理的;雅罗斯拉夫斯基^①是“无神论”的首领,他不禁让我想起法国保罗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Е. М. Ярославский, 1878—1943):苏联政治家、学者。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曾任俄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1939年间为苏联科学院干部培养训练委员会委员,任《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编委。写有苏共党史方面的著作。

· 贝尔^①时代那帮反教权分子 ,还有布哈林 ,洛佐夫斯基^②等人。后来 ,我还见到了卡申 ,他显得既激动 ,又诚恳 ;既刻板 ,又夸张。在我们这层检阅台的下面 ,是外交使节的专席 ,我看见了布里特 ,阿尔方 ;日本大使一脸严肃 ,不像别人那样面带笑容。(注 :法国大使阿尔方在我逗留苏联期间一直对我持一种极不礼貌的态度。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 :一次大战之后 ,在我所走访的所有国家中 ,法国大使们都是抱着这种态度来对待我 ,他们担心受我的牵连 ;我始终是《超然于混战之上》^③的坏公民。他们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可当他们明显装不成这样子时 ,正如在这里 ,在他们眼皮底下 ,我得到官方的正式接待时 ,他们会感到很恼火 ,因此也就更怨恨我了。他们真的不聪明……可他们要是不聪明的话 ,还能当成大使吗?……)

在苏联体育运动协会主席致词后 ,奏起了《国际歌》,宣布体育盛会开始。接着 ,在 3 个多小时内 ,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男人、女人、孩子们穿着很少 ,排着整齐的队伍 ,依照同一节奏 ,热情奔放地走着 ,其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女人似乎表现得更出色 ,她们的队形整齐划一 ,步子迈得铿锵有力。每一团队 ,每一方阵 (隶属于一个街区 ,一家工厂 ,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色彩 ,自己的服饰 ,自己的标志 ,有时给人感觉仿佛是鲜花盛开的田野在行走。

① 保罗·贝尔(Paul Bert, 1833—1886)法国物理学家、政治家、外交家。

② 洛佐夫斯基(А. Лозовский, 1878—1952):苏联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1921年起为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7年开始任国家文学出版社社长。1939年获历史学博士。1939—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曾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撰有工会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③ 该书是罗曼·罗兰于1915年结集出版的反战文集。

我从年轻时就一直梦想着能看到这种人民的盛会,正是这种盛会让柏辽兹激动不已。有时,这就像古罗马军团在行进,士兵们举着“古罗马皇帝”及恺撒的副官的肖像;又宛如罗马军团凯旋的队列,队列中仿佛就是罗马军团的士兵,他们拿着各种战利品。他们在行进中不仅手持各种运动的器械、劳动工具及武器,还托着由真人构成的图形,在摇摇晃晃的支架上,半裸的男人、健美的女人,或摆出铁饼运动员的姿势,或一展标枪运动员的雄姿,或作出变幻不定、形态优美的姿势。这是一种将大规模展示和滑稽表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这是由活人构成的图画,是在人肩膀上塑造的造型:登山运动员在攀岩,拳击运动员在格斗(真打);有打球的,还有踢球的;技巧运动员在叠罗汉,做危险的翻腾动作。而所有这一切运动都是在行进中完成的,是在烘托着他们的那广阔、狂热的人浪之上完成的。所有人在经过列宁墓时,都把脸转向站在检阅台上的领导人,向他们欢呼(多么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啊!特别是女人的高喊声),他们欢笑着。人们将气球升入天空,让鸽子飞向蓝天……飞机在天空中勾画出字母和符号。突然,几架速度极快的新型飞机(时速可达500公里),宛如巨大的黑熊蜂向我们猛扑过来,它们就像史前的怪物一样。在自行车方阵和军队方阵经过之后,“蒂纳莫”^①工厂的方阵(最棒的一支方阵)成为整个游行活动的压轴队伍。

到下午5点钟了。我已经疲惫不堪了,全身有些冰凉,我起身离开这里。玛莎虽有些不乐意,但还是跟着我走了。我已来到

^① “蒂纳莫”俄文“динамо”之音译,本意为发电机、动力。

列宁墓的下面。伏罗希洛夫在上面冲我喊道：“先别走！再待一会儿！这可是最好看的！”我不得不在列宁墓下面又坐了一小时。我身旁的李维诺夫坐在石栏杆上，晃来晃去，结果向后翻倒了，这个胖乎乎的小个子毛发无损地爬起来。在颂扬斯大林的序曲伴奏下，一场场舞蹈登台表演，那序曲也是雅克·达尔克罗茨^①式的，我对此不太感兴趣，便起身溜走了。但在出场的沿路上，如同入场时一样，大家认出了我，向我鼓掌致意。

我们在“萨沃依”饭店休息了一小时，然后动身去高尔基在郊外的别墅。我竭力在记忆中整理这一天的思绪，但几乎很难将其聚集起来，因为所有的印象仿佛都混杂在一起似的。前天我在克里姆林宫里会面时见到的是那个斯大林，而今天见到又是在6个小时内任人尊其为罗马皇帝的这个斯大林，这两幅形象我怎么也无法融合在一起。装饰着各种边饰的巨幅斯大林画像，人们一幅幅地将其扛在肩膀上，行进在游行队伍中。飞机在空中勾勒出斯大林名字的字首字母。各种各样的人物聚集在帝王般的检阅台前，唱起歌颂斯大林丰功伟绩的颂歌。所有参加游行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举起手，弯着肘向他致意。而斯大林呢，他要是真的感到局促不安，感到难为情，就应当回避，但他却在显示自己。莎士比亚要是在世的话，会很乐意去描述这两个斯大林，这两个恺撒，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我还忘了另一个看不见的恺撒，那就是列宁的影子……他的

^① 雅克·达尔克罗茨(Jaques-Dalcroze, 1865—1950) 瑞士作曲家和教育家、音乐节奏教学体系的创始者。世界各国的芭蕾舞学校和学院都推广他的音乐节奏教学法。该体系注重音乐和动作的协调结合。

遗体就安息在我们脚下。但现在却无法瞻仰他的遗容(也许我不会对此感到惋惜);目前,人们将他的遗体收殓起来,因为遗体正在腐烂……但在列宁墓内,啊,那是何等滑稽的场景呀!在地下室里竟然开设了一家餐厅(我们在那儿见到了艾登曼^①司令员,后来在高尔基的家里又碰到了他)。

快到6点半时,列文医生开车来接我们,把我们送到高尔基在郊外的别墅。与“萨沃依”饭店告别。饭店的雇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不肯接受我们微薄的酬金。他们似乎显得很窘迫或表现出受辱的样子。有些为我们服务的人道出的话语让我十分感动。在莫斯科,感谢可不是一句空话。

别墅距莫斯科有50公里远,要开一小时的车。前三刻钟走的路路面很好,公路一直通向斯摩棱斯克(这是当年拿破仑进犯莫斯科时走的路,他留下的记忆依然没有抹去)。而后一刻钟走的路路面极差(我们在莫斯科逗留期间,这条路才修好),可这段路却是惟一风景优美的地段,它穿过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一座二层楼式的大别墅,拿破仑时代的建筑风格(可他们却说这是叶卡捷琳娜^②时代的风格),浅赭石色,立柱都是白色的。高尔基先于我们到达这里,亲切地在大门处迎候我们。他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有四个房间的套房里,前厅十分宽敞,阳台也很大,这间套房位于别墅右侧的二楼。别墅左侧的布局与右侧相同,它让给“一个安

① 罗伯特·艾登曼(Robert Eideman, 1895—1937)苏联军官,1937年遭逮捕并被处决。详情不知。

② 叶卡捷琳娜指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她在位的时间是1762—1796年。

稳的老作家”来住,说这话时,他露出一丝善良而又疲惫的笑意。在别墅两翼的中间是一间宽大的长方形餐厅(楼下有一间同样布局的大厅,作客厅及节日聚会用)。从我的房间窗口向外望,一望无际的草场尽收眼底(草场的后面就是莫斯科河,但我看不见),还有一条林带。安静极了。



高尔基在别墅会见罗曼·罗兰夫妇

晚餐安排在底层那间大厅里,里面摆着一个长长的餐桌,我们占用餐桌的一端,我坐在高尔基的对面,玛莎坐在我们俩中间,像一家之主似的,恰好高尔基的儿媳不在家。高尔基的右侧是克留契科夫,还有高尔基家的两位亲属。我的左侧是克留契科夫那年轻的妻子,高尔基的两个孙女:达丽娅和玛尔法;接下去是管家、胖乎乎而又善良的奥林匹娅达,还有护士等人。每次用餐,大

家坐的位置和顺序可以变化,惟有我们三个人的位置始终不变,总是坐在长桌的一端。除了玛莎,谁也不会讲法语。高尔基讲述着逸闻趣事,玛莎随时翻译给我听。他讲话很慢,嗓音也很轻,眼睛里不时透出一丝狡黠的目光,脸上很少露出笑意。家中的气氛极为纯朴、自由。不时有人离开饭桌,有人又回来坐下。“只要你们不觉得拘束,我们也就因此不感到拘束。”高尔基和孙女儿们逗着玩,称其中的一个为无政府主义者,爷孙俩嘲笑着相互吐吐舌头。高尔基说,有一次他和孩子钻到桌子底下,两人一起将那件他们不喜欢的餐具摔碎了。我对他说:“您这不是在教她乱来么?”他耸耸肩膀,似乎显得很无奈,承认是他的过错。他说:“我一直不会让孩子们尊重我。”我对他说:“您得到了比尊重更好的东西。”他开玩笑地说:“是的,得到了他们的爱,可那是靠巴掌打出来的呀。”

晚饭后,我们在一起用留声机听了几张夏里亚宾^①的唱片。高尔基抱怨说,这个歌手将苏联优美的民歌弄得面目全非了。

^① 夏里亚宾(Ф. И. Шаляпин, 1873—1938) : 全称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夏里亚宾, 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俄罗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代表, 善于揭示角色复杂的内心世界。1922年起定居在国外。



7月1日 星期一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了来这儿后的第一顿早餐,在午饭前,即1点30分前,我没有见到高尔基。(晚餐安排在7点半,下午茶安排在4点半。)

列文医生为我作了体检,发现我的支气管有点发炎(肯定是昨天的盛会在露天里呆了那么长时间所致),他建议我作拔火罐治疗,让奥琳匹娅达晚上来给我治(她经常给高尔基治疗,有时早晚要各拔40个,每罐扣在身上的时间要在15分钟以上,他的皮肤可真够硬的)。医生还给我开了消炎针。

我在别墅前的花园里随便走了走,这是一个很大的法式花园,十分平坦,几个花坛修整得很庄重,维护得极为精细,这肯定不合高尔基的情趣,但他不过视自己为过客,因为这座别墅并不归他所有。而且后来我才知道,这座别墅根本就不是他自己选的,人们将这座别墅作为疗养地分配给他使用。园中各花坛间的小路都是用黄色的砂石铺就的,就像我们在蒙布隆的花园一样。天芥菜散发出浓郁的气味,花园的左右两侧是茂密的白桦树林、松树林、椴树林,构成天然屏障。在花园的尽头,垂直放着一只木梯子,有十几个踏步,可以下到莫斯科河岸。莫斯科河并不宽,蜿蜒曲折,左转弯,右转弯,形成诸多小沙岸。在河对岸由砂石形成的陡壁上,栖息着成百只燕子,从这边能看见鸟巢的洞穴,像



莫斯科郊外景色

蜂房似的。河对岸是一片广阔的野生草场，上面长着高高的野草，随着季节的变换，野草或被大水淹没，或得到河水的灌溉。我想象着，托尔斯泰正脚蹬着靴子，在这野草地上缓缓步行。过了野草地，又是一圈树林带。在花园左侧的树林里，条条小路向四处伸去，在树林的深处有一深深的沟壑，一座既长又窄的吊桥横跨其间，那些小路在这吊桥前又汇合在一起。顺着吊桥，穿越沟壑，有一条小路沿着陡峭河岸的丘脊直通向一座小亭子，小亭子俯瞰着这九曲十八弯的河流。视野真是开阔极了。还能听到鹤鹑的啾鸣。回到别墅时，我碰到一窝小猫，有14只之多，各种颜



色的都有,它们俨然成了别墅的主人。在花园的砂石路上,一群白绒绒的小鸡正在啄食,将来有一天它们必将成为客人的盘中餐(每个客人要吃掉一只鸡),但今天,它们依然像尊贵的国王似的。

依照俄罗斯的习惯,餐桌上摆满了各种新鲜蔬菜,像黄瓜、蘑菇,还有鱼子酱、腌菜、熏鱼。用餐时,每个人拿着自己的盘子,起身到摆放食物处取菜。主人还准备了红菜汤,配着浓稠调味汁的油膩的肉菜,像烤榛鸡等。他们竭力为我准备了一份健康食谱,但并不成功。还有高加索的葡萄酒和矿泉水。但大家都吃得不多(浪费了许多)。



7月2日 星期二

我的继子谢尔盖·库达舍夫刚刚在大学里通过了各门考试,他妻子达尼娅陪他一起到我们这儿来住,他们享用我们那套房间的一部分,并一直住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俩几个月前刚结了婚。谢尔盖18岁,达尼娅大概21—22岁。他们俩青梅竹马,谢尔盖从小就喜欢她。我们得知这件婚事时,他们已经完婚了。他们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今天结婚。望你们能同意。”达尼娅是一个可爱的姑娘,她身材匀称,人很精明,也很温顺;显得十分谦逊,外表看上去倒像一个英国姑娘。她的职业是“技巧舞蹈演员”。费加罗的话在这儿倒是派上了用场:“(这个位置)需要的是个数学家,可却让一个舞蹈演员抢去了。”在这儿,舞蹈演员嫁给了数

学家……

与高尔基聊天。他总是讲些逸闻趣事,而且讲了许多许多趣事。我凭着记忆,能记下来的我都把它记下来,没有顺序,想到哪儿,便记到哪儿。

他对俄罗斯作家的评判十分尖刻。

托尔斯泰:高尔基强调指出,托尔斯泰本上才华横溢,而智力上却是平庸无华,二者常常发生对抗。其实,托尔斯泰也知道自己的智力并无过人之处,可他就是不愿承认,而且顽固地要让智力明显胜于本能。高尔基举了几个实例,我只记住这么一条: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和托尔斯泰谈起贝多芬的才华,托尔斯泰就是不肯承认贝多芬的才华。音乐家也不和他争论,到旁边的房间里弹起了《热情奏鸣曲》,弹着弹着,他突然停了下来,转身出现在托尔斯泰面前,后者正躺在沙发上,泪流满面。可他又不肯承认落泪的理由。他嘴里不停地唠叨着:“是的,我真是一个杜拉克(笨蛋)!……”他嘴上宣称敬重生命,可他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猎手,要是看到猎物从他眼前跑过,他必然要做出射击的姿势,高尔基亲眼看到过。高尔基评论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现已成为苏维埃的敌人)时,说她看似凶恶,实际上是愚蠢,而另一个女儿塔吉娅娜看似愚蠢,实际上是凶恶。但在高尔基的眼里,罪魁祸首就是切尔特科夫^①,高尔基称他是个虚伪的小人、一个一钱不值的蠢货,他死命抓住托尔斯泰,来控制他,惟有依靠托尔斯泰他才能

^① 切尔特科夫(Владими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ертков, 1854 - 1936):俄国社会活动家,出版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朋友。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7 - 1907年侨居国外,出版《自由言论文集》。1928年起编辑托尔斯泰全集(90卷)。

生存下去,要是没有托翁,他什么也不是。

柯罗连科^① :说来令人心酸,高尔基带着几分窘意为自己辩解,他忘掉了他欠柯罗连科的情分,只记住了让他深受伤害的举动。他向柯罗连科去借钱,这已经是他三番五次前去借钱了,柯罗连科把钱从背后递给他。(这可能不是在羞辱他,而是有另一层意思。但出于自尊,高尔基至今仍不能原谅他。)他说在柯罗连科身上,追求正义的意愿十分强烈,可他并没有时间去观察、去了解每个人的状况。一位作家能热情地关注公共事业,决不放过任何不公正的举动,通过抗议来反对这种不公,他就是这样一位作家的典范。但他的言谈似乎在进行道德说教,并没有真正深入到每一事件活生生的特性之中。况且,他把一部作品的大部分都奉献给公共行动,似乎在尽这方面的义务,使得这部作品像未写完似的,但高尔基对其中优美的篇章大为赞赏。

高尔基极为钦佩托马斯·哈代^②。他把三部作品汇集在一起《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德伯家的苔丝》,他还是最喜欢哈代的作品。

他讲起初到莫斯科的岁月,讲起那一件件不顺心的蠢事。在一次作家聚会上,大家很友好地接待了他(那时他尚未对任何人形成威胁),有人向他祝酒,对他前来参加聚会表示欢迎。他在答

^① 柯罗连科(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1853—1921):全称为弗拉基米尔·加拉克季奥诺维奇·柯罗连科,俄国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马卡尔的梦》、《盲音乐家》、《哑口无言》、《巴甫洛夫特写》、《嬉闹的河》和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② 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现实主义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和诗剧《列王》等。

谢时引用了一句民谚：“在没有鱼的地方，小虾就是鱼；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托马斯就是个人物。”听众露出一副副冰凉的面孔。一位朋友为了弥补他的蠢话，马上补充道：“好了！可别忘了柯罗连科呀！”高尔基说：“此后，我那事就算了结了。”他依然把当年所经历的屈辱记在心里。一天，一个年轻女子在街上喊住他：“外地佬，借个火！”他问：“您怎么就能断定我是外地人呢？”“瞧你那傻样儿。”

距他这乡村别墅不远处是前亚美尼亚石油大亨祖巴洛夫的领地。战前他曾资助过亚美尼亚爱国者协会，后来他感到厌倦了。协会的人告诉他，如果他中止提供资助，他会因此而付出代价。他只好又付了一年的钱。接着，他认为悄悄离开梯比利斯才是明智之举，于是他买下莫斯科郊外的这块地产，在领地四周建起了又高又厚的围墙，还在墙上筑起雉堞。还召来一队切尔克斯族的卫兵，卫兵们对他绝对忠诚。后来，他来到这领地。他进了家门还不到两分钟，就倒下了，他死了。这真是一篇托尔斯泰式的故事。有人说他是被暗杀的。高尔基见过他，说这人很胖，是个大块头式的人物，胖得连脖子都没有了，说他是患中风而死的。

从下午5点到7点，有时一直到8点，人们让我们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这是应我的要求而安排的，不过我很快就看烦了，而那些俄国人却是百看不厌呀。

应我们的要求，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铁甲列车“波将金”号》，这部影片我过去没看过。那天晚上，接着放映了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母亲》。在这两部影片中（如同在《恰巴耶夫》中一样），有某种残酷的本质，甚至是仇恨。而且，不管怎么样，视觉是血腥的、恐怖的。高尔基让他的两个孙女也看这类影

片,让我感到局促不安,这两个小女孩一个11岁,一个才9岁,幸好她们看不懂(但谁知道呢),笑了一会儿,就感到厌烦了。

第二天给我们放映的是《快乐的伙伴们》和《羊脂球》,后一部电影拍得很好,很成功,虽然有点过火,比莫泊桑的小说更富倾向性。但另一部影片让人难以忍受,典型的美式影片,是融难以容忍的滑稽和索然无味的抒情于一体的大杂烩。这表明在苏联存在这么一种趋势,而这种趋势对苏联影片是灾难性的。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厌恶之情。克留契科夫和来访的阿维尔巴赫^①(也许)和我有同感,但我不能确定高尔基是否也有同感。他觉得现在给观众提供的影片千篇一律都是悲剧片,他说得有道理。他想要在影片中看到快乐,我又何尝不想呢。但千万别给我们灌输美国式快乐,别把他们的情爱和爵士乐传给我们!

第三天给我们放映的是《边界线》,这是一部由犹太人编导的影片,讲述了发生在苏联与波兰边界上的故事,影片极富特色,具

^① 我这里谈到的阿维尔巴赫,是特意到高尔基家来喝茶的。他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在莫斯科曾名噪一时。他领导着一家名为《岗哨》的杂志社,通过这份杂志,他对整个文学界行使着一种精神上的审判权,其手法辛辣,令人生畏。他是雅戈达的小舅子,打着强硬的政治纯粹主义的幌子到处招摇,似乎成了谁也冒犯不得的人物。但他那过于尖刻的批评及不现实的纯粹主义在上层被认为是有害的。接着,他很快便被发配到乌拉尔,去一家大型工厂(机械厂)负责党的组织工作。他不仅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职务,而且很快便适应了新的任务,今天,他甚至有点瞧不起以前所做的工作。他对新角色也很投入,被视为最出色的党的组织者。高尔基说这种事并不鲜见。年轻人的队伍会培养出精明强干的组织者,在苏联各行各业都有这样的精英,有些人甚至成为省一级的领导者(任党代表)。没有人会把对他的调动及发配到边远地区看作是一种惩罚,而是看作一种荣誉。阿维尔巴赫性格开朗,积极肯干。大家都认为他很聪明,他将来会成为一名政要。—原注

有强烈的表现力。《傀儡》,这部影片以阿里斯托芬^①式的象征手法,竭力去反对西方议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二者实际上是受冶金工厂主的支配。这种构思会授人以把柄,有些场面拍得很美,但很多场面显得很幼稚,而且依然是美国式的风格。似乎这儿的人由于享受不到小酒馆和舞厅的淫猥表演,于是随便找个借口就可尽情享受,而且无缘无故地去享受。



7月3日 星期三

上午,我们乘车去兜风,汽车围着“高耳奇”行驶了80公里路(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叫这个名字;“高耳奇”在俄语里是“小山丘”的意思)。蜿蜒曲折的条条砂石路顺地势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广袤的平原上还有许多平缓的土丘,有些小高地还相当陡峭(在我们这条路的右边,有一座小高地据说还是拿破仑堆建的呢,在莫斯科河战役中用做瞭望台)。汽车行驶在桦树林、橡树林或松树林之中,疾行在草场之上,草场或多或少有人工种植的痕迹。所有的枞木屋都是平房,只是在阁楼处开一个窗户,屋面都用圆木来装饰,上面几乎都开着三个窗户,用木制窗框装饰起来,有些

^①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约公元前446—约前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被称为“喜剧之父”。其喜剧风格自由奔放,揶揄诙谐,语言朴实、优美,含有抒情诗般的快意。

窗框还被漆成蓝色或黄色。当家族扩大或需要分家时,可在原舍处增建或隔开,就像切蛋糕那样。这些枞木屋就建在草地上,或建在树林里,木屋的主人根本就不刻意去清除木屋周围的杂草。附近有几家饲养家禽、养蜂及从事园艺的国营农场,田野里见不到一头牲畜。牲畜大概全被赶到集体农庄里去了。有一个由棚屋形成的小村庄,里面住的都是参加向莫斯科供水工程的工人。在这个地区,政府明令禁止人们到莫斯科河里去游泳。远处隐约能看到莫斯科城。我们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停了一会儿,采集了一些鲜花。

几条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环绕莫斯科的这一地区,分散建着许多别墅,可它们并未标在地图上(甚至连高尔基的这幢别墅也没标上),这些别墅或者是专为政府首脑建的,或者是留给首脑的客人的,或者是分配给有成就的作家的。用硬石铺就的宽敞的林阴道修建了好几条,人们会问这路到底通向何方呢?有人会告诉你:“从莫斯科通向别墅。”在这条路上,隔不远就站一个警察,再不然他们就躲在树林里担任警戒(谢尔盖在林中就曾遇到过警察)。有一座疗养院,整座建筑都是白色的,在林中勾勒出它那美丽的轮廓。我问这是为谁建的,人们答道:“是为政府的高官呗。”我接着问,那么石油大亨祖巴洛夫那戒备森严的广阔领地如今被派何用场,人们答道:“那儿现在已为高官建了别墅,成了他们的疗养地。”在路上,我们与鲍里斯·皮里尼亚克^①的车迎面相遇,他像其他作家一样在郊

^① 鲍里斯·皮里尼亚克(Б. А. Пильняк, 1894—1941) :苏联作家。擅长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荒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等。

外有自己的别墅。许多作家像他一样还有了汽车。我们在路上还碰到了许多农夫和工人,他们向我们投来忧郁的目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竟然向我们挥起了拳头(也许我理解错了,但我随笔记下了第一感受和印象,这些印象将来会得到修正,如有必要的话)。

高尔基经常到意大利去,在那儿曾居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对意大利似乎并不十分了解,除了那不勒斯湾地区以外,而且他一直也没学会讲意大利语。他讲了许多有关索伦托和卡普里^①人的奇闻逸事。他对墨索里尼倒也未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认为他不过是个喜欢吹牛的家伙。对他的一部分业绩也持认可的态度,尤其是对庞廷沼泽地进行整治的举措。苏联驻意大利的使节们似乎同“领袖”^②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年在索伦托时,高尔基住在卡普里奥公爵的别墅里,卡普里奥公爵是一个怪人,他整日无所事事,就是喜欢穿戴,每个月都要定做好几套新服装,为了在衣橱里腾出放置新衣服的地方,他宁可将一推车家庭档案扔到大海里去。据说有一次,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把当地所有贵族绅士都请来了,可他自己却迟迟不露面,让客人们等了好长时间,最终他穿着一身连体服出现在大家面前。他猛然跳起来,攀住大吊灯,将整个身子悬在吊灯上来回晃动了几次,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女儿对高尔基

① 索伦托和卡普里:意大利地名,通常称卡普里岛,位于第勒尼安海,面积10.4平方公里,海拔589米。由石灰岩构成。海岸陡峭,岩洞呈浅蓝色。岛上有疗养区。1906—1913年高尔基曾在此居住,1908年和1910年列宁也曾来此访问高尔基。

② 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称号。

说,女人要是想得到男人的爱抚,那么在月经期就不应洗澡,因为这时她身上的气味会吸引男人。

在高尔基的要求下,我对他回忆起与邓南遮^①的交往,他喜欢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尤其欣赏他的《死神的胜利》(特别是对诉讼过程的描写)。他带着几分偏爱之情向我询问卡尔杜奇^②,对未曾与其谋面而深感遗憾。他谈起这位作家的《撒旦颂》)。

他还讲了一些讽刺巴尔博的逸事。这位意大利空军元帅以贪得无厌而著称(他暴敛了2300万的巨款)。他曾率领他的飞行大队中途停经南美某共和国,不管是南美共和国的总统,还是他本人,都不能准确地用法语来交流,然而在官方正式招待会上,他们俩却坚持用法语来交谈。总统先生对他的客人说,他非常高兴能向“意大利最伟大的‘扒手’^③”致意。巴尔博则谦虚地答道,像他这么优秀的“扒手”在意大利不乏其人。还有一次,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后,他向墨索里尼吹嘘那边的餐具如何精美绝伦,刀叉全是金制的。墨索里尼对他说:“你拿出来让我看看!”高尔基还讲了有关巴尔干人的一则逸事。罗马尼亚议长举办了一次宴会,

①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意大利作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鼓吹帝国主义战争,并志愿入伍,去前线作战。后拥护法西斯主义,效忠墨索里尼。主要作品有诗集《新歌》、剧本《琪琪康陶》、小说《佩斯卡拉故事》及《死神的胜利》等。

② 卡尔杜奇(Giosue Carducci, 1835—1907):意大利诗人、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作品有长诗《撒旦颂》(描写理智战胜宗教)和诗集《有韵的诗与有节奏的诗》、《野蛮颂歌》等。1906年获诺贝尔奖。

③ 法语里动词“voler”有“飞行”和“偷东西”两层意思。但“voleur”一词只含小偷的意思,而决无飞行员的意思。

邀请外交使节出席,英国大使发现他的挂表从系在腰间的挂表口袋中不翼而飞。他将这事悄悄地告诉了议长,后者问他:“刚才谁坐在您旁边呢?”保加利亚大使:“好了,您别担心了。您会找回挂表的。”几天后,议长果然给他找回了挂表。英国大使感到十分吃惊,便问他:“您使的什么妙计让他还给您的?”咳!”议长答道,“他到现在还没察觉呢。”

与待罗马尼亚人相比,高尔基显然更尊重保加利亚人。他曾提起过许多保加利亚的作品,可他对伊斯特拉蒂的作品却只字不提(后来,他谈起这个人时表露出明显的反感之意。他们俩在莫斯科碰过面,高尔基很快就非常厌恶伊斯特拉蒂,而后者,我认为,则是一报还一报。因此,我在苏联逗留期间,尽量避免谈论伊斯特拉蒂。况且,他刚刚去世,听别人苛刻地评论他总会让人感到痛苦,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疯狂的举止曾授人以柄)。

一天,到该吃晚饭时,明茨来了,他是《国内战争史》丛书编委会秘书,书中有关英法武装干涉苏俄的章节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接着,人们为我们放映了今年五一节庆典的记录片。这部影片使我对6月30日那场精彩表演的印象更丰满。各代表团和群众团体那洋溢的热情没有半点虚假之意。而检阅群众队伍的首长们却连一点高兴的样子也未表露出来,他们这种样子倒也更不像是装出来的。人们觉得,他们对为自己安排的这壮观的节目而感到高兴,他们似乎显得很好奇,渴望了解新事物,却又露出惊叹之意,就像是大孩子,看什么都新奇(比如,伏罗希洛夫将在天空中飞掠而过的受阅飞机指给斯大林看,就像两人谁也没见过飞机似的。再不然,斯大林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一样)。五一节庆典要比6月30日的庆典隆重得多,受阅的有坦克、战机等军事装

备,而外交使节们则露出阴郁和装腔作势的面孔(尤其是日本大使)。



7月4日 星期四

上午,摄影师在花园里为我和高尔基摄制节目,要我们对着话筒讲几句话。高尔基断然拒绝,但他的口气却十分平静,他几乎从不发怒,极善于保持平静。接着,尼娜·涅姆琴柯和她的同事们,其中有塞西尔·拉宾诺维奇,前来要我为他们改编的广播剧《哥拉·布勒尼翁》读一篇原作者致词,以献给苏联听众。还要我讲一讲对苏联的印象(我让玛莎写了几句)。摄影师和录音师就像是苏联的蚊子。

和布哈林^①一起用早餐,他年轻,欢快,总是面带笑意,常和高尔基打闹(但高尔基很快便求饶,抱怨布哈林出手太重)。他又向我炫耀起中亚的美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已经吹嘘过了,他对此真的很着迷。下午4点,我和布哈林单独交谈,我们俩坐在花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后来又来到那座俯瞰着莫斯科河的小亭子里。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向他提出来:“我见到了你们国家的首脑,也见到了劳动大军。我想知道(苏联内部)敌人的势力究竟有多大。我的印象是你们始终处于战争状态。”“不,”他

^① 布哈林是惟一会讲法语的政要。拉狄克也会讲法语,但口音很重。—原注

说：“如果敌人的势力已十分强大，那时方可言称处于战争状态。事实上，他们的势力很弱，他们是隐藏得很深的小集团。但他们那不断激化的仇恨以及所采用的手段会使他们变得十分可怕。”他只是想到了“反对派”，想到了托洛茨基分子（我同时还想到野蛮的旧俄国，想到了旧时代的残余势力）。布哈林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那错误的思想观念。我问他，在这场冲突中是否存在着



布哈林和高尔基在一起

个人的争吵，而个人的激情又反过来激化了这种争吵，这时，布哈林对我说，通过法国大革命的种种实例，我大概应该知道：实际上，个性的对抗总是掩盖着思想上的对抗，比如像丹东、吉伦特派、激进派等（我倒觉得是思想上的对抗掩盖着个性的对抗）。但对这位大知识分子而言，思想始终是行动的先驱和倡导者。他说，托洛茨基声称要是没有其它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苏维埃革命将无法生存下去。事实证明恰恰相反，苏维埃革命独自取得胜利之后，可以保护其他无产阶级革命者。我接着谈到法苏结成军事同盟后，在西方革命者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布哈林说，要善于发掘字里行间中的真正含义，共产国际丝毫没有放弃它的方针路线。在这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共产国际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令。而且目前它也不能公开下达某种指令。在国内战争时期，



托洛茨基在苏呼米休息

列宁曾制定出政策,要接近法英,以抗击德国,而且宣布,革命的无产阶级有权以敌制敌。“当时,”布哈林说;“我还不理解,我显得太‘幼稚’了,(这个词他后来又重复了好几遍)。“那么现在,我明白了。”依照布哈林的设想,政治应当紧密地适应各种环境,适应各种事件,政治也在不断地发展,面对各种局面时应随时作出调整。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运动之中。这样,在革命的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则就是循序渐进求发展,一步一步地走。我们先有了十月革命,接着是国内战争,消灭富农阶级,再后来是建设计划。只是在这之后,才迎来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它在此前的历史阶段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布哈林又谈起了人的个性问题(尽管我对他说,我对此问题已不再担心了,我已经弄明白个人与集体相对立而产生的误解)。布哈林表示,我们不应抽象地谈论个性,而是要看具体实例,比如农民呀,工人呀。我们注意观察他们,发现几年来他们的个性得到惊人的发展(以事实为依据)。农民过去都没有什么前途,但由于他要使用机器,便不得不去接受技术培训,接着,他还要弄懂集体农庄内的各种关系,农庄与农庄间的关系,远近各个集体间的关系等。今天,工厂已变成富有生命力的大学……

与布哈林和高尔基在一起喝茶。布哈林辞别前,吻了高尔基

的额头(刚才,两人闹着玩时,布哈林用胳膊勒住高尔基的脖子,让他高声喊叫)。摄影师为我们拍了合影照片。

我对布哈林对我表示出的好感感到吃惊,同时也深受感动。这是比理性的友谊更深的情感,是一种诚挚的爱意,自我们俩初次见面起,这种爱意便萌发而成。他在许多热情洋溢的文章中都表露出这种爱意。但在他的话语和眼神里,我对这种爱意体验得更深刻。总的来说,布哈林有一副热心肠,容易冲动,总露出朝气蓬勃的样子,丝毫不会受年龄的影响。他个子不高,总是面带笑容,头脑敏锐,是个难以置信的活跃人物,他领导着苏联最大的一家报社,而且亲自主管其中的事务,他的活力与智力对承担这项重任而言是游刃有余,谁能想到这么一个人物竟然是一位数学家兼哲学家呢?

晚上,四名党中央成员围坐在高尔基的饭桌前与我们共进晚餐,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个子很高,宽脸,天庭饱满,脸色苍白,露出病态和忧郁的神情。卡冈诺维奇个子更高,身材也更魁梧,但却露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显得与众不同,但他决不会露出懒散的样子,他静静地观察着,显得格外紧张。伏罗希洛夫个子不高,脸色红扑扑的,眯缝着一双笑眼,左顾右盼地瞧着,露出一副爱搞笑的大小孩的样子,在他眼里,任何小事都是无忧无虑地寻开心的机会。斯大林的性格十分诙谐,也爱开玩笑,但他的俏皮话往往显得很生硬,有点乡下人的味道,他不是开这个人的玩笑,就是逗那个人的乐子,笑得很真诚。伏罗希洛夫接过斯大林的玩笑话,再照原样奉还,同时爆发出爽朗的笑声。高尔基的口气要平和得多,附着着他们的玩笑,不时也抛出个笑料。

还有一位客人,那就是工程师伊格纳吉耶夫伯爵,高尔基对他给予很大的支持,他发明出一种可自动打磨的刀具系统,而这种刀具决不会变钝(该系统现已被采纳,有一家刀具厂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现在正忙于研制一种新的用螺旋桨驱动的船,船逆水而行时,动力就来源于水的阻力。这会儿,他将全身心都投在发明创造上。斯大林和他的同事们都在讥讽他,但却认真地听他讲述。发明家对此感到有些气恼,最后,斯大林说,他对发明家的描述很感兴趣,他不过是想逗他乐一乐;“因为他太严肃了”。这艘船现正泊在距高尔基花园下面几百米远的莫斯科河里,伊格纳吉耶夫对斯大林说,为了验证他的试验效果,他曾自作主张在河中建了一个水坝,后来,他把这事告知政府部门后,方知这种事不可乱来,他补充道:“为这事,我大概得被投入监狱里去,但此前我还是有时间验证了……。”

餐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品:有各种冷盘、火腿、咸鱼、熏鱼、鱼冻,有用小虾加鲟鱼烹制的热菜;有奶油榛鸡等菜肴。他们喝得很多,高尔基更是当仁不让。他一杯接一杯地喝着伏特加,结果付出了代价,他猛地咳嗽起来,不得不起身离开饭桌,到远处去透透风。当他违背医嘱时,他周围所有的人,包括敬爱他、负责照料他的克留契科夫都没有出面劝阻他(我应当补充说明,高尔基平时对饮食是很节制的,他吃得特别少,而且是太少了。但列文医生对此并不感到担心,因为高尔基的体质更适合于少食,而不适应于饱食)。斯大林的胃口不错,酒量也很大,但他知道何时该停下来。在喝了几满杯之后(依照俄罗斯的传统,要轮流为在座的

人士举杯祝酒：先从我开始，然后是为斯大林，接着是为我夫人，再其后是为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克留契科夫……这几巡酒还是很适度的（如大家所见到的那样），斯大林便就此打住，酒水、食物一概谢绝。可为我们服务的姑娘却劝他再用一些，他和她开玩笑来吓唬她，再不然，便朝她转过半个身子，为她祝酒，结果把姑娘窘得满脸通红，端着菜赶紧溜走了。他有滋有味地吸着他那木制小烟斗。他还带着几分深情之意同高尔基开着玩笑，但那玩笑有点粗鲁。他问道：“这儿到底谁是秘书，是克留契科夫，还是高尔基？”再不然就问：“这家里有没有级别呀？”而高尔基却耸耸肩膀，仿佛什么也不知道，问克留契科夫：“有级别吗？”

在晚饭前，他们四个人在一起讥讽阿罗塞夫，我们晚间从他家溜走也成了笑料。他们还要向我们问这问那，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了。然而，我们并不想伤害我们的主人，于是便说那是因为他家太热了（屋顶下太热了）。斯大林狡黠地坚持道：“除了炎热，就没有其他原因？”玛莎感到有些窘迫，便答道：“阿罗塞夫对我们倒是很热情的。”斯大林对她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您倒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家呀。”高尔基在一旁提示：“是有臭虫吧？”玛莎赶紧点头认可。闻此言，伏罗希洛夫乐得拍起了大腿。其他五个人放声大笑起来。我们赶紧为主人开脱：“他也许并不知道。”“不，不！”斯大林说：“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寻思着：也许他们察觉不了！他自己的皮就很厚呀。”又是一阵大笑，比刚才笑得还起劲。“可是，”玛莎说：“大家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当时只有我们

夫妇俩,可我们对谁也没说。还有两位女士(护士和服务员),可她们发誓不会说出去。”高尔基提示道:“还有第五个人呀,那就是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讲述道:“从前,庄园主准备接待朋友来访时,先让一位体格健壮的漂亮姑娘在客人的床上就寝,把臭虫都喂饱了,这样臭虫就不会再骚扰客人了。”

莫洛托夫对我谈起艺术品出口的事情:我们卖掉这些艺术品是为了换取外汇。现在我们需要外汇了,因此艺术品的出口也就停了下来。况且我们卖的并不是稀有的珍品。莫洛托夫平静地补充了这么一句傲慢的话语(卡冈诺维奇也用过这句话):“这些艺术品到了英国人或美国人手里,从本质上讲,这对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既然这些国家早晚要实现苏维埃化,那么这些作品也将永远属于我们。”

在餐桌上,卡冈诺维奇(他坐在我旁边,我对面是高尔基和斯大林),他因地铁建设的出色成就而受到同志们的赞扬,应我的要求,他向我解释道:在这项工程中妇女承担着与男子同样的工作。我特别指出,妇女们在6月30日庆典上所表现出的快活、强壮的风貌,说明这并未损害她们的健康。卡冈诺维奇答道:起初,承建单位并不想要她们,但她们一再坚持要上工地,承建方便作出让步,但要她们每天只工作4小时,而男人每天则要工作6小时。

席间大家还谈论了发行几十亿公债的举措,其目的是为了建造类似“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大型飞机。这批公债很快就被公众认购一空,政府不得不停止发售。



大家还谈论了新宪法,在最近党的代表大会上决定制定一部新宪法,目前这部宪法正在起草之中。斯大林希望这部宪法能成为一座铭刻史册的丰碑。

晚餐结束时,4位首脑围在一起,展开一张张国内战争的地图,这些战役图是明茨亲自拿来交给他们的,他今晚也在餐桌前就座。他们热烈地讨论着当年作战时各地区的局势,他们每个人都在那场战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几位首脑(如我前面所说)都不会讲法语,在这方面他们和高尔基不相上下,而且苏联境外的任何一种语言他们好像都不会讲。我和卡冈诺维奇谈起这个话题,他似乎对世界语并没有什么好感,他说,这种语言在苏联肯定不会得到发展,我对此深感遗憾。对我本人而言,整个晚餐我感到非常疲乏、厌烦,因为我得集中精力去听他们谈话。

斯大林在与高尔基谈话时,提到大众音乐数量太少的问题。在这方面我能做许多事情,而高尔基却对此十分悲观。他似乎以为无产者们尚不能创作出任何有意思的作品,因为他们只是热衷于模仿时尚艺术家。我许诺为苏联报刊撰写一篇有关大众音乐的文章。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11点,利宾一家人来看我,几年来,我一直同他们保持着通信联系(他们是我的小“鲟鱼”)。他们一共来了11个人,有母亲,有儿子(他的鼻子很像勃艮第人),还有女儿(她今天上午特意从克里米亚赶来)。还有一些其他人,都是他们的朋友,其中一位年轻的姑娘作为生物学家曾参加过“柴柳斯金号”的考察活动;还有一位正在服兵役的大学生(他们必须在部队服役两个月,还要在某一时段内,每月尽若干小时的军事义务)。他们都是大学生,有学生物的,有学地质的,还有学物理和化学的。利宾夫妇从事水生生物学研究,因而感染上了疟疾症。他们所有的人都十分兴奋、活跃,相处得和睦融洽。他们每周都要聚在一起,跳舞、唱歌、吟诗。这些学生年龄最大的只有22岁。他们长得并不漂亮,但却惹人喜爱;他们是勤奋、幸福的青年一代之典范。母亲的思想也同样充满了朝气。我们俯瞰莫斯科河,在位于花园深处的小亭子里交谈着。河对岸,一台重型拖拉机正在割草,一群小嘴乌鸦一边追逐着拖拉机,一边呱呱地叫着。我问利宾一家人是否来过这个地区,母亲回答从未来过。然而,我知道他们一家人喜欢远足,而这个地区距莫斯科并不远,可见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地区是禁区。

后来,人们叫我到高尔基那儿去接见一个工人艺术家代表

团,他们来自帕列赫^①。他们刚从土库曼斯坦和亚美尼亚回来,在那里旅行了一个半月,进行写生创作。他们带来许多优美的图画册,都是依照创作原稿及建筑装饰图重新描绘的(在这些图画册中,我发现某些素材,尤其是带有鲜明特征的马的素材,装饰着帕列赫作品)。他们当中有三四位是“大师”级的艺术家,有艺术家协会的主任,还有几位艺术家十分年轻。他们送给我一本配着典雅插图、装帧精美的《伊戈尔远征记》(这是配着彩色插图图书的首次尝试,其实,我倒更喜欢他们的漆器)。他们送给玛莎一个漆器盒子。帕列赫是弗拉基米尔地区的一个村庄,那里有70—80名艺术工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室。只是在1922—1923年来,那里的创作风格才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近几年来,妇女被接纳到创作室与男子一同创作。他们有一座漂亮的博物馆,还有一座艺术图书馆,但藏书明显不足。我们能感觉到团结一致的自豪感在激励着他们每一个人。他们恳请高尔基对最优秀的艺术家科林^②施加影响,让他不要再喝酒了。高尔基以诙谐的语气答复道,他会去向科林施加影响,但他的心情会十分紧张,因为他本人也有这个嗜好。年纪大的艺术家们微笑着,但帕列赫年轻的艺术家们似乎很严肃。他们的神态倒更像旧时弗兰德的艺术工匠。

① 帕列赫,俄罗斯伊万诺沃州的一个城镇,以民间手工艺帕列赫细密画出名。帕列赫细密画是用蛋彩画在马粪纸胎的漆器(小盒、小匣、烟盒)上的一种民间细密画。该画以日常生活、民俗、历史、文学为题材,在黑底上以鲜明的地方色彩作画,画色多用金色,画工细腻流畅,人物修长优美。

② 科林(П. Д. Корин, 1892—1967)苏联画家。作品有三联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肖像画《М. С. 萨里扬》等。他也是修复古画的专家。1932年曾为高尔基画像。

他们当中有一位工匠几年前曾给我寄来一个漆器盒子,上面镌刻的字体竟然用的是15世纪艺术家的文体:字形纤细,但刻得很深。

午饭后,下午时分,我突然感到心脏极不舒服,肠胃似乎窒息了。在这一天剩余的时光里,我不得不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我感到极为疲惫,身上仿佛压着千斤重担似的,可我始终不明白他们为何还要三番五次地来烦我,要我陪同高尔基到伏尔加河去旅游,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休息。

季米特洛夫来吃晚饭。我无法下楼到餐厅里用餐。但晚饭后,他偕夫人及高尔基来到我的房间。他的脸庞很宽,留着一头浓密的长发,很像法兰西剧院的演员西尔万。但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没有丝毫哗众取宠之意。他讲话时嗓音很低,句句话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极为谦逊,决无任何浮夸的痕迹。在回答我的问题时,他说在德国的监狱里他经受了种种折磨:在5个月当中,他的手一直被铐在一起,手铐上的螺钉和锁卡槽会压碎他的手腕,直到我出面干预,才把他从手铐中解脱出来。在狱中他根本无法入睡。他说,当他认清了托尔格列勒及另两个年轻的保加利亚战友那懦弱的本质之后,他的精神真是痛苦到了极点:他们对他在法庭上申辩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吓坏了,乞求他最好能变得通融些。在审判过程中,他注意到德国舆论的态度有了转变,戈林曾受到了指责。甚至有人说:“要是季米特洛夫能与戈培尔联手执政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但尽管如此,欧洲舆论的压力迫使德国政府及法官有所顾忌,即使法庭作出了无罪的判决,要是没有这些压力,德国人也照样会把他们弄死。季米特洛夫对我的干预评价过高了。



有两个问题始终在困扰着他，他向我提出来：

首先，世界舆论将他从狱中拯救出来，而且直至目前阻止了反动势力对台尔曼^①的迫害，但这个舆论似乎正在削弱，人们觉得它已不再关注斗争了。应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个舆论警觉起来以抗击日益强盛的法西斯主义呢？对此我作了很长的答复，通过玛莎（因为季米特洛夫也不会讲法语），向他解释道，人们总是从战场的四面八方不断地向舆论求救，而舆论疲于奔走呼号，这也是极为正常的，舆论的注意力被分散开来，因此也就被削弱了。我认为应当建立一项军事战略计划，集中最大的力量以攻击敌人的心脏部位。然而，今天法西斯的心脏就是希特勒的德国。它要是垮台的话，其他的法西斯制度就会跟着倒台。至于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它在阿比西尼亚^②的冒险行动就会把它拖垮了。说到这个话题，我从高尔基那儿得知，扎诺蒂-比扬柯^③曾转述过墨索里尼的一句话，而路易·皮柯普最近也曾向我讲过这段话：“他对自己的生活并不满意，他的事业并不会比他本人持续得更长久，只有一场获胜的战争才能给他带来不朽的盛名，而这正是他所期待

① 台尔曼（Ernst Thälmann，1886—1944）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码头工人出身。早年加入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反对右派沙文主义。1920年参加德国共产党。1923年领导汉堡工人起义。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和委员。1925年当选为德国共产党主席。主张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3年3月被捕，1944年8月被害于魏玛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② 阿比西尼亚 埃塞俄比亚。

③ 扎诺蒂-比扬柯（Zanotti-Bianco，1889—1963）意大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持反法西斯立场，任意大利“罗曼·罗兰朋友联合会主席”，自1913年起即与高尔基保持着联系。

的。”但这话(极不可信)起码说了有两年了。我向季米特洛夫和高尔基解释道,法苏建立军事同盟将法国的社会舆论置于极大的思想混乱之中,爱好和平的人士对此感到愤慨,甚至声称要与希特勒的德国言归于好,而不再顾忌其国内的高压政策及暴力行为。局势正变得极为错综复杂……

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我倒显得极为乐观:即到底采用什么方法,能让西方的知识分子走向共产主义之路。这项工作只能在目前社会及精神处于危机的局面下方能实施。马克思的思想虽然被介绍到法国已经很晚了,但最终它还是被译成法文,这对开展这项工作极有帮助。法国的年轻人不仅要学着了解马克思,而且还要学着了解当局对他们一贯采取的阶级镇压政策。

下午,玛莎与高尔基谈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上午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个可怜的小伙子写给我的,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由于他的家庭出身,各个大学及工厂都将其拒之门外。一种不宽容的社会制度迫使一大批无辜者陷入绝望,甚至将他们逼向死亡。玛莎满怀激情地起来反抗这种残酷的做法。高尔基显得十分窘迫,而且还很难过。他试图说明将家庭出身有疑点的人接纳到自己的队伍中来是有危险的。他问道,要是人们不得不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最好是牺牲哪一边呢?是牺牲大多数,还是牺牲少数呢?玛莎说:“好吧,就算是牺牲少数吧!但如果这样,我们凭什么能对希特勒的行为表示愤慨呢?他不就是想在德国人当中把犹太少数民族铲除掉吗?”她想说明,根据家长的地位来评判孩子们,这种方式是多么虚伪、多么荒谬。她说,她认识一些共产党人的孩子,他们享受着出身带给他们的种种特权,而实际上却干着反对共产主义的勾当,他们从家庭出身中捞取好处。评判每一个

人,应当看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看他父母曾经做过什么。况且,考虑家庭出身时,为何只考虑父亲而不考虑母亲呢?玛莎以她自己为例:她说我娶了她,就能让她儿子进大学里去读书,要是我不这样做的话,人们决不会让他进大学的。难道这公正吗,这合理吗?她还向高尔基回忆起他自己写的文章,她曾经将这些文章翻译给我看,特别是那篇为米尔斯基王子辩护的檄文。高尔基的眼中露出惶恐与痛苦的目光。他不知该如何解释。家中的女人(管家、护士)都悄声地赞扬玛莎。她们对她说,她能这样讲出来真是太好了,而实际上,高尔基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下不了决心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或采取行动。就在这座别墅里,也曾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有人要把花园的看门人撵走,起因也是这人的家庭出身不好。在高尔基的干预下,才把这人留了下来。但玛莎却说,针对某几个孤立的事例而采取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对这种局面进行改革。高尔基试图依赖更自由的新宪法来弥补这个缺陷,而这样一部宪法正在起草之中。但这不过是个托辞而已,好让自己安下心来。



7月6日 星期六

夜里,我发起烧来,感到四肢酸痛。列文医生诊断是患了轻微的感冒。我的继子谢尔盖也得了感冒。普列特涅夫医生前来吃早饭,与列文医生一起给我会诊。他认为我不是患了感冒,而是由于疲劳所致(他的诊断是对的:因为最近这几周,我一直都很疲劳,进而引起突发性肺炎)。普列特涅夫一边触诊我的腹部,一边对我说,只有瑞士的气候才能让我免遭一次手术,他完全同意海梅尔里医生的意见,要我尽快返回瑞士。但当他对我说:“幸好,今天的报纸都在说您很疲惫。我也恰好就势表达我的意见。”我这才发现这些医生做得多么谨慎呀。我的身体状况迫使我最终得休息一整天,海梅尔里医生曾明智地嘱咐我每隔5天就要休息一整天,而我3周来却没有休息过一天。我整天都躺在沙发或床上。

借此卧床之际,我来把这个家中的几个人物描述一番。高尔基家中的气氛有点像旧时俄国家庭的样子。在饭桌上,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坐下来,过一会儿走开了,然后又回到饭桌前。孩子们坐在饭桌的中间位置上,旁边是女管家,然后是客人。饭桌的一端留给高尔基。管家是奥林匹娅达,她同时又兼任护士一职,她身体很胖,年纪也很大了,但她总是面带微笑。她给我打针时,总给我讲有关那些不言不语坐下来吃饭的人物之逸事,仿佛这些人

物就出自果戈理或屠格涅夫的笔下。拉克茨基是个很有天赋的画家,但他搁笔已有多年了,他15年前曾在高尔基家住过半个月,从此便寸步不离高尔基。高尔基去哪儿,他便跟到哪儿。高尔基很宽容,说:“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只关注自己的身体。他总是臆想着自己已疾病缠身,仿佛着了魔似的。当高尔基或客人们在家中接受治疗或服用某种药物时,他若不去服那药或享受一下治疗,他决不罢休。他在甬道上拦住奥林匹娅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是什么药?行行好!匀给我一点吧!”高尔基有眼疾,眼睛受刺激时便会流泪,眼科医生为他开了眼药水和纱布。高尔基从来不用,拉克茨基便拿去享用。当他得知我在享用特殊食谱时,他也要分享。假如家中来访的客人不得不服用某些特殊药物,他也总想能分享一份这样的药物。而且还嫉妒那些客人,居然能吃到这么特殊的药。他把阿尔甘先生的灌肠药都吃了,硬说自己肚子里长了东西。医生说他们什么病都没有。他便大声哀叹起来。奥林匹娅达对他说:“如果您坚持认为肚子里有东西,那么您就让医生给您把肚子切开看看吧!”他果然让医生切开了肚皮,结果什么也未发现,他也就放心了,但只踏实了四五天。过后他又闹起来。高尔基说:“得每天从他身上割下一小块肉来,让他整天不得安宁。”但谁也未觉得他呆在这里招人讨厌,也未因他在这儿半个月而感到度日如年。不管他是来,还是走,或是呆下去,一切都随他的意。没有人挑剔他。

我收到来自“白令海峡在北极圈内过冬的人”发来的无线电报,他们向我致意,还收到位于阿尔切夫斯卡的伏罗希洛夫兵工厂的工人们发来的问候信。我给他们发了回电。我收到来自苏联各地大量的信函,许多普通民众的来信读来令人十分感动。有人告诉我,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各个办公室每天都有几百人前来询问,他们想见我,同我交谈。



7月7日 星期日

尽管我的体温已恢复到正常,但我今天依然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因为我还是觉得十分疲劳。况且,天气变得很凉,特别是周五周六两天整个欧洲遭受飓风的袭击,风雨交加。

下午,我们的朋友加尔托赫一家从列宁格勒赶来看我们。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他们一周了。但要想买到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必须得提前预定。有时则要等上五六天。

善良的尼娅^①显得特别高兴,她弟弟奥斯卡·加尔托赫博士也来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看上去比我要强壮得多,尽管

^① 艾尔莎·加尔托赫是罗兰在日内瓦最好的朋友,她在一所国际学校任幼儿教师主任,会说好几国语言,罗兰亲切地称她“尼娅”(含奶妈之意),因为她曾是库达切夫伯爵的奶妈。她弟弟奥斯卡·加尔托赫是生物学医生,1930年被捕,罗兰替他向彼什科娃求救。1937年,他再次被捕。——译注

两年来他的健康状况一直让他的姐妹们担心不已。他却突然变得强壮起来,精神面貌恐怕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几个月来,他的地位已得到巩固。列宁格勒城中的恐怖气氛(自基洛夫被暗杀以来)已烟消云散,一个审查委员会正把那些被流放到边疆的人召回到城里。但在几个月之内,人们一直生活在焦虑不安之中,虽然没有人被捕,但每时每刻都会接到即刻动身去边疆的命令。到了那边,既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安家置业的费用,连护照都没有。去年,我们在维里涅夫见到尼娅时,她的痛苦及恼怒之情便由此而来,她好像是遭遇猎手追捕的猎物。她说,她认识的人当中每天都有失踪的,再不然有的家庭连人都找不到了(但她可能夸张了)。我的出版商(《时代》出版社)勃洛克在二月份遭逮捕后,被流放到中亚地区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那儿,他得教人画画。他被流放到那儿,就因他的出身显贵,他父亲是个旧军官,此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借口。他真的很不幸。大家期望我能出面干预(我也确实这么做了)。但尼娅今天却显得平静多了,也更加自信了。自从我们上次见面后,她好像变得年轻了。

本来今天要会见一个由众多作家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想见我,并向我致意。由于我身体不适,便将这次会面推迟到7月9日。但作家们特意从列宁格勒赶过来,无论是再等几天,还是回去再折回来都十分困难。在他们与高尔基共进晚餐之后,我和他们会面了半个小时。在这些作家当中,我又见到了康斯坦丁·费定,几年前他曾来维里涅夫看望过我。其他人是马尔沙克,苏联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有他弟弟伊里因,后者写了许多科普读物,得到世人的好评。诗人普罗科菲耶夫看上去略显粗野;狄里亚诺夫面带伏尔泰式的微笑,是这个小组中最杰出的作家,

他写的小说带有浓郁的普希金和百科全书派的色彩。高尔基和他们一起聊起来,会谈的气氛很友好。除了费定能讲法语、马尔沙克兄弟会说一点点法语外,其他人都不讲法语,玛莎便给我们做翻译。马尔沙克向我描述了他们准备开办的儿童大学,以及对小诗人、小艺术家进行普通教育的方法。费定则谈了作家俱乐部的事情,这个俱乐部坐落在一个洛可可风格的建筑物里,里面还有一个木偶剧院,他们为这个剧院编写剧本。后来,大家又谈起了斯蒂芬·茨威格^①,他们对这位作家评价并不高,说到茨威格的名字时,高尔基表露出讥讽的笑意。他们觉得茨威格的所有作品都太业余化了,指责他在其《作家生涯》中利用前辈的创作成果,但却从来不提前辈的英名。但这些年轻人其实并不了解茨威格当时的思想状况,在战争初期^②,维尔哈伦^③的态度让他伤透了心。个人心灵的痛苦,个人思想意识对他而言仿佛不再存于人世似的。当他们告辞时,马尔沙克兄弟使劲握着我的手,说能与我见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

而普罗科菲耶夫在与我道别之后,又为高尔基朗诵了他的诗篇。玛莎后来告诉我说,所有在场的人听后都激动不已,真是美极了。这个相貌粗野、来自北极地区的农民竟然会有那么耐人寻

①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奥地利作家。著有心理短篇小说集《马来狂人》、《感觉的混乱》。还写有传记小说和关于文化巨匠(包括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论著。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③ 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戏剧家。诗集《黄昏》、《黑色的火炬》是象征主义对生活持悲观态度的作品。还写有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诗集《幻想的农村》、《触手般扩展的城市》等。

味的想像,那是从地下最深处发掘出的画面。这个天才的诗人颇有帕斯特纳克的遗风,但其田园般的气氛更浓烈。高尔基也很兴奋,普罗科菲耶夫对玛莎说,我的论文集《创建新世界》充满了战斗的气息,读来让他十分激动。他与妻子连续几夜一起拜读这本书,有些片断他都能背下来。他无法想像像我这种文化背景的人能同他们站在一起。玛莎则与费定谈起勃洛克被捕的遭遇,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悲伤的神态:因为他们都喜欢勃洛克,而且都在想方设法营救他。大家谈起“行政流放令”时心有余悸,而且非常气愤。自基洛夫遭暗杀后,这种流放行动便在列宁格勒蔓延开来。起初,从莫斯科调来一支国家政治保安部队,它在采取行动时还是很有节制的。后来又从明斯克调来另一支部队接替前一支部队,他们对这一地区和人员都不熟悉,因此十分粗暴,毫无节制。他们把可疑人员的旧名单统统拿出来,不分青红皂白把这些人马上驱赶到边远地区。勃洛克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在那儿的一个小村庄里什么也做不成,怀一身绝技,但却派不上用场,他感到十分痛心,于是便恳请人家把他至少派到一个城里去,哪怕是像撒马尔罕那样的小城,在那里,他起码还是个有用之才。到目前为止,作家们为他奔走呼号的努力一直没有成功,审查委员会未能核准作家们为他所做的辩解。有人要他们再试试别的方法。整个晚上,大家在一起还谈论了商人子女的问题,以及其他遭社会遗弃阶层子女的问题,出身的阴影压得他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费定和他的同事们像玛莎一样,对这种不公深感痛心,他们衷心希望这种不公能得到纠正。在苏联,一批共产党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在关注着现制度的人道主义观,知道他们在这么做真是令人欣慰。

在谈到“行政流放令”时,尼娅说道:“哪怕建几座集中营,搭一些木棚屋,把疑犯关在那地方,等待更彻底的审查,这样也行呀。但当局把他们往荒山野地里一轰,任凭风吹雨打,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下去。在亚洲地区的沙暴中,成百上千的孩子死掉了(也许有些夸张)。在这些大批被驱逐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在几个月后被披露出来,但结果已造成几千人死于非命。(数字恐怕被夸大了,但即使将数目缩小,那么这种野蛮的措施也是绝对不可原谅的)

俄罗斯的风俗:午夜时分,当作家们离开高尔基家之后,伊格纳吉耶夫(前两天腰还在痛)、克留契科夫及其他几位客人结伴去莫斯科河游泳,夜里下着雨,寒风习习,直到凌晨3点他们才回来。



7月8日 星期一

尼娅要一直待到星期二晚上才走。天气已经变得凉爽起来,就像我们那地方9月底的天气。这里最典型的特征是:天气变化无常。

和高尔基共进早餐,他讲述了俄罗斯农民对电话及电力那种近乎迷信的恐惧。有人带着留声机来到一个村庄,老人们便对操纵留声机的人说:“好了,让它出来叫我们瞧瞧!”“你们在说谁呀?”“就是鬼呀!”“可是这儿并没有鬼呀。”“它就在那里呢。”操

纵留声机的人很机灵,让留声机播放了几首宗教颂歌。既然它在咏诵上帝,那么它肯定不是魔鬼。这时一位老农民站起来,一声不响地走回家,对他老伴说:“给我准备寿衣吧!”说罢,便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一周后便死去了。在下诺夫哥罗德^①(高尔基的故乡),当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运营时,一名男子猛然扑倒在电车前,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为电车驱邪,并高声喊着:“压死我吧!”电车当然及时停住了,众人都觉得是十字架战胜了魔鬼。有一位出身贵族(王子)的道士,好像高尔基还认识他,被教会判处终身监禁,关在阴冷的地下室里。在狱中度过22个年头之后,教会赏赐给他一只火炉,让他取暖。他变得有些发疯了,成了火光的崇拜者。从狱中释放出来后,他见各家屋顶上都装着电灯,便说:“你们怎么竟敢把它锁在屋里,把它给关起来,快把它放了!”

下午5点,来了一个由20—30位苏联音乐家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来向我致意,其中有:尤·沙波林,涅恰乌斯教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阿·鲍·戈登伊维泽,他是托尔斯泰的老朋友,音乐学家伊凡诺夫·鲍列斯基,还有扎塔耶维奇,他采集了几千首土库曼民间歌曲,作曲家有:德·鲍·卡巴列夫斯基、谢·叶·弗因贝尔格、弗·亚·别雷、阿·米·维普里克、汉斯·艾斯列尔、弗·萨鲍、鲍·斯·什耶赫泰勒、符·亚·什耶巴林、维·涅·柯切托夫、阿·谢·奥格列维茨、阿·伊·恰恰图梁、列·康·克尼佩尔、米·列·斯塔罗卡多姆斯基等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将他们召集在一起,并将其一一介绍给我(由副主任波希托诺夫亲自安

^① 下诺夫哥罗德:下诺夫哥罗德州省会,位于莫斯科以东。高尔基曾在此生活和创作。1932年起称高尔基市,苏联解体后改为原名。

排)。著名的建筑师维斯林也随同代表团一起来访,他是玛莎的老朋友,他携妻子和妹妹一同前来。他拿了许多他所设计的主要作品的图片让我看,有的已经建好了,有的还只是草图。我觉得最出色的设计就是一座宫殿式的建筑,将建在红场上(位于列宁墓的对面),整个设计完美无缺,惟一细微的缺陷就是这座建筑没把克里姆林宫压下去!代表团成员中还有雕塑家科罗列夫,他当场画了几张速写。布拉津刚完成一部歌剧剧本(相当奇怪),该剧是以我的《哥拉·布勒尼翁》为脚本创作的,由卡巴列夫斯基谱曲。涅恰乌斯弹了几首肖斯塔科维奇的前奏曲及梅特涅尔的《葬礼进行曲》,他弹得很有才气。卡巴列夫斯基与别雷合作,演奏了他最近创作的交响曲的第2部分。什耶赫泰勒则演奏了他的《土库曼组曲》的第2部分,以及他的歌剧《1905年》的片断。柯切托夫则弹了他的芭蕾舞剧《蒂尔·乌伦什彼尔》中的两段乐曲。别雷演奏了《年轻的女游击队员玛露夏·邦达连柯之歌》。克尼佩尔则将歌曲《田野》奏给大家听。

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东西,只有几首诗尚能偶尔打动人的心弦,其他都与古典文化相差无几。许多作品倒更像法兰西—日耳曼昨日的风格,而未体现出俄罗斯的风格,而俄罗斯今日的风格就更少得可怜了。那些选用俄罗斯或亚洲民间题材的创作者在挖掘这类题材时缺乏想像力,而惟有想像力才能使那些题材更有生命力,更丰富多彩。诚然,新一代作曲家中两个重要人物:一个

是肖斯塔科维奇^①，他今天没来（涅恰乌斯演奏了他的前奏曲，这是在此我所听到的最优美的乐曲：颇有无调性肖邦的韵味，兼有理查德·斯特劳斯的风格）；另一位是沙波林，他并未将自己的作品带来让大家分享，只不过充当了一次二流的演奏家。同时，我非常想结识那位杰出的钢琴曲作家尼古拉·梅特涅尔，大家对我谈起他时都怀着崇敬之意。他的《葬礼进行曲》（由涅恰乌斯演奏）显得特别庄严，但依然拘泥于古典乐曲的风格，他虽然没有移民到国外，但他长期生活在苏联之外的地方，据说是住在巴黎附近，或旅居英国。戈尔登维泽对我谈起托尔斯泰，托翁称他在肖邦的乐曲中汲取了种种灵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我寄来一包新音乐的唱片。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了晚餐，这样能更好地休息一下。但吃过晚饭后，我还是下楼去看电影，影片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名剧本改编的，片名是《大雷雨》，演员演得很棒。但我所看过的苏联影片，除了个别场景之外，没有什么明显与西方影片不同的地方。直至今天我所感受的印象最新奇的影片当属《亚洲上空的风暴》。影片《大雷雨》中所展现的旧俄罗斯的画面令人窒息。我猜想这样一部影片依然是出于宣传目的，是要将人们的怀旧之情统统扼杀掉。

^① 肖斯塔科维奇(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Шостакович ,1906—1975) :苏联作曲家。生于圣彼得堡。1923 及 1925 年先后毕业于列宁格勒音乐学院钢琴、作曲专业。1939 年起任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1943 年后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65 年获艺术学博士学位。作品有《献给十月》、《五一》、《鼻子》、《第七交响曲》、《森林之歌》等歌剧及大型交响曲。



7月9日 星期二

天灰蒙蒙的,十分凉爽,偶尔露出一丝阳光。下午喝茶时,远东红军骑兵部队指挥官艾登曼来到这里,他两次被杀,一次被日本人枪杀,但都大难不死,据说他今天也成了作家。他很年轻,个子也很高,体格健壮,说话时神采飞扬。他大概曾在意大利见过高尔基,毫不拘谨地与他聊起了墨索里尼。

下午5点,驶来三四辆大轿车,从车上下来90位莫斯科的作家代表。特列吉亚科夫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特列吉亚科夫个子很高,十分年轻,但头已谢顶,人很可爱,显得极有教养)。这些作家当中有:杰米扬·别德内伊、伊里亚·谢尔文斯基、泽林斯基、玛丽艾塔·沙金年、莉吉娅·谢夫琳娜、米尔斯基王子、卡西尔、阿尼西姆夫、巴甫连柯、别泽明斯基、尼库林·利金、安东科斯基、斯克洛·柯、诺维柯夫-普尼波伊,后者在黑海舰队当过水兵;一位来自某厂的工人诗人,一位来自红军部队的诗人,亚美尼亚诗人恰伦兹,几位著名的剧作家,阿罗塞夫,德国皮斯卡托尔剧院院长斯蒂芬·普尼亚塞尔,匈牙利作家艾尔文·申柯,是我让他到苏联来的,共产党人、美国批评家费舍尔,意大利殖民地共产党的代表吉尔马耐托;一位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我没为他做什么事,可他却对我感激不尽,雅克·萨杜尔;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能撑得住这么多人来访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玛丽艾塔·沙金年是个年轻、可爱的姑娘,但她近乎失聪,她用法语为我朗读了一

篇致词,而我却什么也没听懂,我不敢确信她是否也真的理解她的致词(致词里主要谈了时代呀,光阴的流逝呀,时代的进程呀,等等)。一位乌克兰诗人用他本民族的语言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我猜想他是在赞美他的国家,他的话让所有在场的人感到厌烦。好几个诗人朗诵了他们的作品:其中有谢里文斯基、安托柯尔斯基等。我依次和他们每一个人谈了话,尤其是同米尔斯基、莉吉娅·谢芙琳娜、卡西尔和阿尼西莫夫谈了很长时间。我就米尔斯基所撰写的《列宁》这本书向他表示祝贺,他说目前他不再写这类书了,他已经超过那时的写作水平了,谢芙琳娜个子很矮,像个两栖类的爬行动物(但这丝毫无损于她那博大的才华);而卡西尔则瘦得仿佛只剩下一把骨头,他同我讲话时所抒发的感情令人感动,他说明天就满30岁了,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美好的日子:一是他出生那一天恰好是俄国1905年爆发革命的那一天,二是在他的30岁生日之际能同我会面;阿尼西莫夫正在撰写一本有关我的书,他向我证实了我所听到的传言:不仅我的《哥拉·布勒尼翁》,而且连《约翰·克利斯朵夫》及《欣悦的灵魂》都摆进了农民的家里,他们竟然还能读得懂(他本人对此颇为惊讶),而且尤其喜欢我最新的这部小说(我猜想大概是《欣悦的灵魂》之最后几卷).....

克留契科夫终于在晚上7点钟之前把这帮人打发走了。他说,许多人都在记恨他,等我走了之后,他所能得到的只有记恨。(高尔基一直十分好客,可对这90位同仁他却没有让下属准备一些茶点,甚至连一杯水都没拿给他们喝,而他们却是从50公里远的地方特意赶来看我们,我对此颇感惊讶。长餐桌上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摆,这也是惟一的一次。我至今还在琢磨这究竟是何原

因。)

我曾说过高尔基吃得特别少。那么一点点食物就够他用的，真让人难以理解。他说他一直是这样，即使他年轻时在伏尔加河上当搬运工时也同样如此，那时，人们强迫搬运工要多吃肉，多吃面包，他却一直不能吃得太多。那时搬运工弓着腰，背上扛着两袋面粉，还要一路小跑；现在，机械起重机取代了搬运工，高尔基说他倒反而觉得这机器招人厌烦！他怀念过去的时光，怀念当年一边劳动一边哼唱的动听的歌曲。

高尔基总有讲不完的逸闻趣事，可惜经翻译转达之后，我听到的只是支离破碎的东西。在下诺夫哥罗德，有一位貌美绝伦的女人，她生着一头棕红色的长发，家境也十分优越；一次，一位阔商喝醉了酒，扬言要出3万卢布，就为看她那赤裸的胴体。她闻此言之后，与他定下约会地点，但只让他通过门锁孔来看。有一位王子（高尔基认识他），一天午饭后，告别家人，说几个小时后回来，结果这一去，直到一年多后才露面，他袒露了真情：他在街上散步时，看见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于是他便跟着她，原来这位美女是土耳其大使的夫人，他起先跟她到了巴黎，后来又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儿，美女进了后宫就不再露面了。他也想混进去，结果被抓住投进监狱；要不是一个偶然的机机会使他联系上俄国大使，恐怕他得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在狱中枉度一生。高尔基还讲起下诺夫哥罗德城旧时的庙会和丰盛的酒席以及富贾阔佬们的疯狂之举。有这么一位商人，一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信口将装满干鱼的一艘货船送给陪伴他的美人。第二天早晨，酒醒过来了，才意识到他的馈赠太冒失了，于是出价5千卢布要收回这礼

物。但美人颇有心计，找人估算了货船和干鱼的价值，竟然索要3万5千卢布。高尔基流浪时的一位伙伴，服兵役时曾从惩戒营里逃出来，此前曾为教会的弥撒仪式服务过，他会唱很多颂歌，但不分场合，想唱便唱；然而当他意识到不合适时，便戛然而止，随口说出许多诅咒他人的话语。有一次他想躺在草地上，却故意猛然倒在地上。高尔基说这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看到一个人倒下去又猛然蹦起来，像一根弹簧似的：原来他倒下时，脸恰好对着一窝蛇，那里卧着十几条蛇咬……



7月10日 星期三

天气灰蒙蒙的，有点冷。做了三次灌肠。我在和已故的路易十三叫板呀！我感到极度疲劳。这一天的日程安排得很满。

上午，画家吉布里克向我展示了他为《哥拉·布勒尼翁》插图版图书所画的图样。这些图样透出一种粗犷的格调，但还是很有趣，像是出自有才华的画家之手。吉布里克要在高耳奇待上一整天，为我作肖像素描。（一个月以前，这位身体壮实的年轻人经受了腰痛和痛风病的打击，下肢曾局部瘫痪。他现已痊愈，但他总担心还会病倒。）陪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国立文学出版社社长纳科尼亚柯夫，他是西伯利亚人，长着一副宽大的胖脸庞。他给我带来售书的账目：我的版权收益，向莫斯科大学的捐款（3—4万卢

布)我账下的数额,今年及明年出版我的作品所获得的收益等。这是印数很大的出版计划。当他得知我正在写一卷文学随笔时,便催我快点完成:因为目前在苏联,读者更青睐文学作品,反而对政治读物不太感兴趣了(时代的标志)。在高尔基的餐桌上,与吉布里克、纳科尼亚科夫共进了早餐。

下午4点30分,几个代表团同时来看高尔基,恐怕也是为我而来的。40多个客人围着长餐桌享用茶点。有从年轻的女跳伞员中挑选出最勇敢的战士,有一个地铁建筑工人代表团,一个共青团代表团,一个途经莫斯科的亚美尼亚少先队员代表团。有一位胖乎乎的小子女跳伞员,行为举止倒更像个农民,虽然矮胖,但轮廓却还清晰;应高尔基的要求,她镇定自若地讲着从高空跳伞的感受:她们先在地面上接受训练,逐渐减少氧气的供给量;到达6000米的高度时,人的大脑就会受影响,你会想不起字词该怎么拼写。医生警告她们不要超过6000米,否则会有生命危险。但她们决定继续向高处攀升,一直往高处飞。她们从7000多米的高度往下跳。“就像撒豌豆一样。”她们十几个人一组,接二连三地跳下去。运载她们的飞机必要时可实施救助,机长对她们喊道:“你们还活着吗?如果活着,就挥挥手臂!”我们问道:“难道跳伞的时候还可以聊天?”跳伞的时候,”她答道:“我们总是不停地聊天。”有时在薄薄的云雾中,飞机看不见跳伞员们的白色降落伞,她们被云雾遮挡住了。有时她们会落入气流之中,气流会将她们横向卷到别处去,她们便无法朝目标落去。她们可能会落入危险的地域。这时,飞机便放下一名男跳伞员来帮助她们。(她

补充道：“他们总是这么说。”)她给我们讲了一段趣闻,那口吻简直自豪极了,她说有一次,为了营救一位落入森林的女跳伞员,一位男跳伞员也跳下来,这位姑娘独自摆脱了困境,倒是她反过来把男跳伞员搭救了出来(她把这姑娘指给我们看,这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正用一双笑眼瞧着我,脸上露出羞涩的红晕)。但有时一阵强风会将跳伞员猛然刮倒在地,她会因此而受伤。她把其中的一位跳伞员指给我们,说她的双腿被摔断了,她不得不卧在病床上休养一年。但腿伤痊愈后,她又开始跳伞。“我们并不是职业伞兵,”她说道;“我在工厂里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如果它一旦遭到进攻的话。”她还谈起这几千名伞兵就像活生生的弹药,从天空上神不知鬼不觉地落下来,这将对国防带来多么大的帮助。她同时还描述了在农村几百位老人见到她们时那种惊奇和恐怖的神情。在图拉^①附近,一位老农妇从远处对她喊道:“你是从魔鬼那儿来的吗?”“我就来自这个世界呀。”“你是不是长着和我们一样的肉身?我想摸摸看。”“老妈妈,您要愿意,就摸摸看!”老农妇走过来:“不,我一个人可不敢,你会吃我的。”她们又来了五六个人,一起上前来摸,把她从头到脚摸了个遍:“是的,她和我们一样呀。”

高尔基听罢高兴极了,要她们把这些感想写下来。

接着,一个女地铁建筑工人开始讲话,她很年轻,长得又矮又瘦,然而她的举止、言谈、目光却透出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她们每

^① 图拉,俄罗斯南部图拉州的省会,离莫斯科不远。

个人看你时都会直视着你！)。她用快乐自豪的神情描述她们艰苦的工作,在地下深处碰到的水洼,所面临的种种险境,女工们所表现出的镇静,她们如何向工程的指挥者请战(因为最初工地上并不想要她们),她蔑视那些美国和英国工程师,这些人不相信她们能完成任务,不相信她们会使用机器,她们不但学会了使用机器,而且还学会了制造机器。她说,在工作中领导常亲临现场,卡冈诺维奇也日夜和她们一起在巷道里摸爬,这是对她们的极大鼓舞,领导会突然出现在她们面前,给她们鼓励,向她们提建议。她讲话结束时,如同那位女跳伞员一样,必然要唱赞美国王的颂歌,要赞美“伟大的同志们”,赞美斯大林,在她所有的描述中,这一段我觉得最没意思,因为这里有股官方强制的味道……

然而,看着这些女孩子们讲述得兴致勃勃的样子,你很难能在那些赞美之辞中分辨出哪些是肺腑之言,哪些是官方强制的话语。也许这已成为一种惯例,她们真诚地重复这些赞美之辞,因为习惯就是这样,就得这么说。可我并没忽略男女之间的竞争关系,竞争激励着这些勇敢的小女子向男同胞们挑战!那位地铁的建筑女工斗胆指明女人在工地上的好处,她们用其良好的品行来教育男人;因为有她们在工地上,男人说话时就不敢那么放肆。我见几位共青团的领导听罢此言在冷笑,眼中露出生气的样子。

还有其他几位女子也谈了她们的感想。接着,共青团年轻的主席也作了简短的发言,无非是对苏联、对高尔基、对我作了一番颂扬。我应当说明一点,当他们说到自己的工作,说到自己的成绩时,他们总是表现得很谦虚,有时甚至好像是在贬低自己。

碰巧,作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和他妻子也一同前来,他在巴黎参加了国际作家大会,刚刚返回苏联,他为大家介绍了大会的情况。

最后,来自亚美尼亚的少先队员们天真地描述了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的缺点,他们试图改正这些缺点的努力。演讲之后,他们表演了亚美尼亚的民族歌舞,有两三个小姑娘,身穿民族服装,上着红色外衣,下着彩色短裤,舞姿婀娜,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当然,摄影师为我们在花园里照了合影。高尔基在回答少先队员们时说,在他身边能见到这么多血气方刚的青少年,这么多准备消灭一切敌人的青年人,他感到非常高兴。“我们要把所有的敌人都消灭掉,因为他们都是坏蛋!”说到这儿,他蹙起眉头,用拳头敲打着桌面,他平时一直都很平静,但偶尔也会有粗暴的言行。

晚上,晚饭后(我在自己房间里用的晚餐),我看了几部电影,都是文献记录片:有6月30日的庆典活动,我看见自己从人群中走过,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有对亚洲荒无人烟地区的征服行动,包括对塔吉克斯坦境内泰加森林的征服;还有比鲁比疆地区的景况,该地区已被改造成犹太人聚集区。我在广播中听了根据我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改编的广播剧的前几幕,瓦吉姆·科切托夫为该剧所谱的乐曲相当不错,演员也很出色。我听见自己在念导言(向苏联听众敬意的致辞),我一点都辨不出自己的声音。

接下来,我和雅戈达^①谈了一次话,他是前格勃乌^②的首脑,是位人见人怕的铁腕人物,现任内务部人民委员,这次谈话很重要,我们谈了维克多·塞尔什、加尔托赫博士及《时代》出版社社长勃洛克的案例。加尔托赫的事很快就了结了:他已完全被平反了(他涉嫌卷入细菌学家的案件,这些细菌学家毒死了许多匹马,但人们很快就排除了对他的怀疑,现在他又得到绝对的信任)。说到勃洛克,雅戈达似乎松了口气,答应明天就叫人把他调到撒马尔罕去。至于维克多·塞尔什,这里的人对他的评价充满了鄙夷之意,大家视他为冒险家、流氓、不讲信誉的人、骗子。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就他的境况向我们抗议,不论他到国外以后可能会或试图为苏联制造何种麻烦,我们都准备把他放了。他这种人根本就不值得我们敬重,我们不会感到不安的。我到底究竟相信谁呢?是相信善



内务人民委员雅戈达

① 雅戈达(Г. Г. Ягода, 1891—1938): 全名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雅戈达, 苏联政治家。1920年起为“契卡”主席团成员。1934年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34—1936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 1934年12月基洛夫遇刺事件后直接领导了“肃反运动”, 在全国开展大清洗。1936年9月因“领导不力”被免除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 由叶若夫接任, 转任邮电人民委员。1938年被处决。

② 1922—1934年前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

良的雅克·梅尼尔^①及玛德兰·马科斯^②呢？还是相信这里的人？前者将塞尔什描绘成神圣的殉道者，而这里所有向我谈起他的人都在蔑视他。至于那位“可怕”的雅戈达，他的脸庞长得很秀气，显得雍容华贵，但却透出疲惫的样子，虽然他的灰白头发逐渐稀疏起来，但他依然很年轻（他让我想起莫洛亚，但他比莫洛亚更精明），他那身深棕色的制服十分得体，他讲话时很轻柔，他的全身都透着温情柔意。他抱怨在苏联的司法制度里没有强调复仇的观念，抱怨对犯人的卫生条件关心得不够，这事他自己在亲自管。他附带着说起在莫斯科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关押着 20 万名犯人（！），然而却没有一个犯人生病倒下。他似乎觉得列宁格勒的流放制度很自然，但他只是说，如果人们后来发现搞错了，那么会把被流放的人调回来，被流放者其间所遭受的痛苦或更悲惨的境遇，他连提都未提。我问他，为何不在列宁格勒附近设一个集中营，让那些要被流放的人住进去，以待进一步的审查呢？他申辩说，人们可无权关押要被流放的人，他们是自由的（可随便走动），在那个指定的逗留地区，他们是自由的，被流放真好像是一种恩赐似的，再不然，好像人们有意在维护他们的尊严。像维克多·塞尔什这类的被流放者，政府肯定要给他们提供工作和生活来源，雅戈达补充道。当对他们的处罚期满后（对塞尔什的处罚是三年），他们可以在全苏境内自由往来，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除外，他们可到这两座城市来观光，但不能定居。雅戈达答应交给

① 雅克·梅尼尔（1866—？）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的朋友。

② 玛德兰·马科斯 这位女士是《克拉尔特》团体成员之一，属于反对巴比塞那一派，接近托洛茨基主义。

我一份有关塞尔什自被捕后的工作和生活状况的正式报告。他不断地重复说：“他就是个冒险家。”高尔基还提起伊斯特拉蒂事件，以伊斯特拉蒂的名字发表的作品，其实就是塞尔什授意或亲自执笔写成的。雅戈达说他了解这个事件，但塞尔什并非为这事而被判有罪的。其实，第一次被捕时，他便否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党派分子，断言自己与托党没有任何关联。然而，当警方再次抓捕他时，人赃俱获，他正与托党分子密谋并参与他们的活动。

我不断琢磨着：“到底相信谁呢？”雅戈达似乎给人以好感。他重申的话我们不好再怀疑。但当他断言苏联已不再对信件进行检查时，甚至连白军的信件也予放行（他甚至温和地抱怨说现制度太自由了！）人们琢磨着，他那部门发生的事他是否真的不知道，还是拿我们当傻瓜^①。好像我们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似的，其实寄给我们的或给我们朋友的信总是被截住，或到我们手里时，信已被拆过了，但上面却盖着印章，书写的说明却是既肆无忌惮又粗俗不堪：从邮箱取出时，信已破损，信封粘得极不牢固！（我以为富歇^②的警察大概还是比他们更细心，起码将信件放回原信封时不会搞错，然而我们竟然发现过这样的错误……）所有这一切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对雅戈达那双正直而又温柔的眼睛表示怀疑时，我们又在责备自己。

^① 这种话被其他政要道破实情，阿罗塞夫总是十分轻率，而又特别容易情绪化，他曾告诉我们：“在苏联所有的信件都被拆开过。”——原注

^② 富歇（Joseph Fouche，1759—1820）：1799—1802、1804—1810、1815年担任法国警务大臣，建立起侦讯和谍报网。是一个不择手段的钻营家：曾极力主张共和制并为之服务，也为拿破仑一世效忠，还为波旁王朝复辟出力，但是又一个个地全都背叛了他们。1816年1月后流亡奥地利。

现在是否又在形成一个无产阶级贵族呢？当局对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或家庭授予“高贵”的称号！我就收到一封来信，信中署名“高贵的舒尔金一家”，他们住在“北高加索阿佐夫地区‘世界十月革命’集体农庄里”（大概是顿河的哥萨克）。



7月11日 星期四

一整天都是在莫斯科度过的。上午11点30分乘车（50公里的路程）。在高尔基城里的寓所吃早饭。我前面说过这栋房原本归一个富商所有，室内的装饰豪华奢侈：楼梯扶手的起点处镶着用乳粉色大理石制作的巨大的波浪图案，在波浪的最高处，装饰着一只金属制成的章鱼，这章鱼竟是一盏落地灯！在这样的背景里是看不到高尔基的！大家知道他对此极为反感。但在展示窗里，他摆放了无数尊中国的小雕像，有象牙制的，也有石刻的。

下午，我们参观了几家商店，这些商店并不出色，外表看起来有些惨兮兮的，尽管摆放的那些农民艺术品尚能引起顾客的兴趣。

接着，我试图与法国大使阿尔凡取得联系，但都未联系上；先联系使馆，后又联系他的官邸。两个地方他都可能在，或干脆让人说他不在。或许我们俩都在路上，因为他知道我要来访。但这个蠢货在和我赌气也是有可能的。法国官员们对我在莫斯科所扮演的角色感到十分吃惊，而他们却连边也沾不着……

最后,就是我今日来莫斯科的主要安排,去参观文化及疗养公园。这是一片堪称为人民建造的布洛涅林苑^①,这片森林是7年前种下的,沿莫斯科河岸种植了大片的树林,过去这片地是积水地带,与叶卡捷林娜二世及其宠臣奥尔洛夫的花园相连。公园的面积特别大,有一座座姹紫嫣红的花园,有错落有致的树林和小山岗。人们为了照顾我,特意给我安排了一辆车在公园里参观,公园的负责人陪着我们,并亲自担任讲解员,这是一位年轻聪明的女性,只有29岁,她名叫格兰。下午的最初时刻天下起了雨,显得脏兮兮的。但4点钟时,天空放晴了,空中有一层薄薄的水雾,阳光透过水雾煞是好看。在公园里行走的这一路,人们纷纷挤过来向我们致意。当我走下车去参观儿童乐园时(这是公园里诸多儿童乐园中的一个,格兰特意挑选这个地方而不选成人娱乐场所,那是为了让我免遭对公众讲话之苦),我差点被想见我、抚摸我的人挤得喘不过气来。但所有的人都十分善良,一点也不唐突,他们试图在我周围围成一圈来保护我。他们高声喊着:“我们的朋友,我们最好的朋友罗曼·罗兰!”儿童乐园里有许多游戏和从事制作的场所,这种制作场所本身就是一种娱乐:这儿有喜爱飞机的孩子们,那儿有钟情汽车的小伙伴,还有喜欢其他各类机械制造的少年。这样,孩子们便能发现自己的秉性和才能,并亲自去体验。一个心理技术实验室为他们提供帮助,核实他们的数据,观察他们是否对自己的能力作出错误的评判。当我进到每一个制作间时,孩子们不论大小都向我鼓掌、欢呼致意,还向我献

^① 巴黎西郊的一所公园,以大片森林为基础建成(1815—1854),是巴黎人的传统休息地。

上鲜花,将他们描绘的图画、制作的飞机或机器模型送给我。一位小姑娘将少先队的红领巾系在我的脖子上,这样我也就成了荣誉队员。此外,还有舞蹈,少儿乐队,少年合唱团,稍远的地方,人们围成一圈在看民间化装表演,据说这是一种类似“艺术喜剧”的传统节目;在几部乐器在伴奏下(一把吉他,一架手风琴),有人跳着踢踏舞,滑稽舞;一只大黑熊走到车窗前向我致意。在更远的地方,在叶卡捷琳娜公园那郁郁葱葱的小山上的僻静之处,是工程师乐园,他们来到这地方可以休息一整天。我看见很多人在公园里下象棋(在苏联,人们热中于下象棋)。公园还专为棋手们开辟了对弈的场所。在公园的入口处还设立了跳伞塔。我看很多人都在跃跃欲试,虽然是第一次跳,但从塔顶跳下来也没有什么危险。还有一座绿阴环绕的剧场,能容纳2—3千人,最近刚刚在这儿上演过《卡门》,有30—40名骑马斗牛士登台表演。公园里还有池塘,像布洛涅林苑里的小湖。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而且公园还在扩展,一年前来过公园的人也认不出它的原样了。况且,这正是目前莫斯科的特征,莫斯科城总是处于变化之中。有些老房子被拆掉了,又有一些新房子建起来。建筑工程已把高尔基家这条街彻底地变了模样,而我10天前来时,还不是这样。

回到高耳奇时已经快到晚上7点钟了,夕阳的余晖真是美极了,阳光透过树林里林阴道边的树枝,生出无限的变化。

我独自一人用了晚餐。饭后下楼待了一小时,是为了看电影,影片是《列宁三颂》,拍摄得不太好,但片中有些历史文献记录倒还十分感人。



罗曼·罗兰夫妇访问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及疗养公园的儿童乐园”



7月12日 星期五

中午时分,吃早饭前,我在漂亮的花园里散步。雷雨正从天际的两个方向袭来。呼呼的大风吹得树林直抖动,而在花园的小径处却感觉不到那么大的风。空中弥漫着天芥菜那强烈的味道。花园与河岸的陡坡处,放置着一只10个踏步的木梯子,在梯子脚下处,我的继子谢尔盖正在河中游泳,他那年轻的妻子塔尼娅在河面上划着船。

吃饭时,高尔基讲述了当年他在美国的遭遇,因为他的婚姻是不合法的。从纽约城里散步归来时,在饭店里,他发现自己的几只箱子被从房间里扔了出来,扔到一楼的一个角落里;他妻子的裙子、内衣乱糟糟地撒了一地,他的手表也被偷走了。所有的饭店都不接纳他们。他呆在街上,坐在箱子上,身边围着一大群记者。这些记者们倒还不错。他今天在这人家住一夜,明天又到那人家卧一宿。他这样一直坚持了8个月。报刊开始狂怒地对他进行攻击,有人要求政府将他驱逐出境。其中有一位谩骂者历

数离开美国后说美国坏话的人,包括狄更斯^①等人,最后他补充道:

“但这个人最坏。他还没离开这儿呢,就开始说坏话了!”

后来,还是在警方将秘密披露出来之后人们才知道,整个这场对他的攻击运动是奉沙皇尼古拉二世之命炮制出来的。高尔基此时结识了马克·吐温,对他极为赞赏。此后他便得知(他当时已预感到)马克·吐温在家中极不幸福,他妻子及女儿粗暴地虐待他,检查他所写的文章。高尔基还谈起了艾普顿·辛克莱^②,但他对辛克莱的评价并不高;高尔基所熟识的戴布斯^③对辛克莱的评判也很严厉。他承认战前曾加入过国际友谊联谊会(这个名字显得有些自命不凡,因为它的宗旨是要引导世界的道德观),这个联谊会是由辛克莱、弗德里克·凡·艾登^④以及“您的仆人”组织的,说到这句话时,他谦恭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他还结识了马萨里克^⑤,后者常从索伦托赶到卡布里来看他,向他借一些有关俄国的书籍。高尔基对他的评价近似于我的观点,他只是个教书匠,他那一成不变的思想要远高于他的经验,而且怎么合适就怎么想(他对俄国作家的分类就是错误的,特别

① 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 1812—1870):英国作家。早年生活艰苦,未受过正规教育。1842年到美国旅行,发表《美国札记》。1844—1847年曾先后旅居意大利、瑞士和法国。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品有《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等。

② 辛克莱(1878—1968)美国作家,他的小说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③ 戴布斯(1855—1926)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

④ 弗德里克·凡·艾登(1861—1932)诗人、和平主义者。

⑤ 马萨里克(1850—1937)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家,第一任共和国总统。

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划分就更是错上加错,这种分类与现实决然不符);但他是一个心地善良、值得尊敬的好人。

高尔基依然对南森^①怀着钦佩及动人之情,在那个饥馑的年代里,他曾特意赶到皇村看望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身患重病,心情极为忧郁。南森冒着严寒,走了很远的路来看他;而他自己却将大衣让给了一位旅途的同伴。高尔基同意我对南森的评价:“这是一位骑士。”

下午4点时,外面响起一片喧闹声,布尔什沃公社(或两个劳教公社)的150名青年男女乘车来到这里。所有这些人都是“被改造好”的罪犯。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偷盗犯。公社的副主任蓄着红棕色的山羊胡子,大约50岁,高声宣布要表演的音乐节目;他本人过去曾是危险的跨国犯罪集团的成员,专撬保险柜:酬金定下来之后,他们便被派到欧洲各地去盗窃。这个团伙的11名成员已被枪决。他本人也被判处死刑,但苏联的某位高官为他求情,他才免遭一死,那位高官是雅戈达的朋友(雅戈达也来参加这个活动,是他把这事讲给我们听的)。乐队指挥过去曾是制造假币的罪犯,是一位旧时的王子(恰加达耶夫)。他们为我们奉上一场音乐会,我在前排就座,身边是高尔基和雅戈达。这支由巴拉莱卡琴、吉他和低音号组成的乐队真是棒极了。乐队成功地演奏了所有交响曲的片断,其音色之饱满令人钦佩不已,这是一支配合默契的乐队,特别是渐强音和渐弱音的效果非常出色。男女声合唱团表演得不好,歌声不悦耳,或显得有些刺耳。他们把并不

^① 南森(1861—1930)挪威探险家,一次大战后开始关注难民问题,并担负遣返战俘的工作。

适合合唱的乐曲拿来演唱：如《塞维利亚理发师》中表现恶意中伤的那段曲子。但舞蹈堪称是杰作。舞姿活泼狂热，当舞蹈快要结束时，演员已跳得近乎疯狂，每个人都轮流投身到群舞之中，舞着手，踩着脚，舞姿一个胜似一个疯狂；那位撬保险柜的老人在旋转中跳得喘不过气来：我见他跳到最后脸色苍白，直用手捂着心脏部位。他们跳起了乌克兰和高加索舞蹈，表演了爱情题材的滑稽哑剧和芬兰舞蹈。观众们随着舞曲的节奏鼓着掌，激励着演员们起劲地跳着。我听见雅戈达高声喊着：“戈帕克……”（这是地道的圣吉舞，舞蹈演员手里弹着巴拉莱卡琴，脚下发出踢踏声，这是狂热、持久的震颤声响，给舞蹈演员及观众某种神经质、近似于歇斯底里的影响。）

这场节目令我感慨万千，要是在法国，那会是另一种场景：男女囚犯们一边跳跃着，唱着歌，一边在向警察头子求情，而这警察头子嘴里却喊着：“乌拉！”就像是罗伯特·德·弗列尔的轻歌剧。然而，正直的人也许会对这种受人摆布的游艺会式的杂耍感到愤慨。但在这儿，所有的价值都应重新评判。每个人都显得十分活泼、快乐。

音乐会结束后，他们还在继续唱歌，纯粹是出于乐趣，而且一唱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快把我烦死了。这些俄罗斯人真不知何为“节制”，他们从来不会满足。后来我和乐队指挥、那位过去曾造过假币的人聊了一会儿，他读过我的书。我四周很快便围过来一群青年男女（他们都在15—25岁左右），有时他们会露出凶神恶煞般的面孔，但他们都很幸福，显得十分好奇，用善良的目光看着我。

晚饭后（我独自一人用餐），雅戈达来到我的房间，就我针对

维克多·塞尔什事件所提的问题作出答复。当天我还收到雅克·梅尼尔写给我的一封信,也是谈论这个问题。在长沙发上,雅戈达坐在我身边,将他在当天收到的一封电报拿给我看,电报是奥伦堡市政治保安局发过来的,概括性地描述了塞尔什自1933年夏抵达奥伦堡市后的状况。后来,当局为他在市计划委员会内安排了工作,但遭到他的拒绝:他好像说过不想为苏维埃政府工作。最近,当局似乎又给他安排了教书的职位,却依然被他给拒绝了。今年五六月间,他从国外(他的法国朋友处)得到一笔捐款,总额超过1200金法郎,这笔捐款数额相当可观,于是他就更不想工作了,现在他手中仍然有700多金法郎。雅戈达极力否认塞尔什的儿子在学校因出身问题而受人欺负。至于说他去年寄给我的那部法文小说的手稿,雅戈达让人在莫斯科的政府机关内查找,但一无所获,可能是被奥伦堡的警方扣了下来。雅戈达向奥伦堡政治保安局下达命令,一旦发现手稿扣在他们那里,要他们马上寄出去;他说,他本人甚至会请求塞尔什将小说手稿再寄给我。说到塞尔什本人,雅戈达允诺会和人民委员会协调解决此事,看是否有可能将其驱逐出境。当局清楚地意识到,他一旦获释,便会在巴黎形成反苏活动中心,因为他对苏联抱有敌意,而且从本质上讲,他这个人也很坏。但当局琢磨着,三个月以后,在巴黎人们就会厌烦他,再说他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目前不过是有谁想利用他那点声誉罢了。托洛茨基在国外都没有什么影响,塞尔什又怎能做到这一步呢?当局过高地估计了他的智力与文学价值。

接着,雅戈达还谈到了他那改造罪犯的业绩,这时,他的眼里闪着炯炯的亮光。他那副面孔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他的表情极为

温柔,话语、眼神透出丝丝柔情……这种内心的反差让人如何理解呢?他是残酷无情的政治保安局的头目,是俗界中的圣人;待人接物始终抱着满腔的热情……起初,他把一帮无赖安置在自己家里,让他们自行支配自己,对他们说:“你们自己管自己吧!”当他们向他索要舒适的条件时,他说:“这儿可没人给你们施舍。你们还是自己动手干吧!”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自尊,则为他们带来一切。这对当时所有刑法学家的理论是一种挑战:包括龙布罗索、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如祖传意识,旧有习惯等;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便对自己的公社感到自豪,小心翼翼地关心着公社的成长。在布尔什沃,他们目前有两三千人,他们正在筹备庆祝公社成立10周年的活动。参照这个模式,雅戈达在各地设立了其他公社,共接纳了三四万人。我询问其中不可救药者大概占多大比例,按雅戈达所说,这个比例很低;“那只是极个别人”。当有人旧习复发时,其他人都觉得很伤心。最近有一个女孩子,在布尔什沃经过改造之后,被释放出去,但时隔不久,她又因偷东西而被抓获。她过去的社友们觉得很丢面子,都来训斥她。雅戈达说,这种事之所以发生,那是因为大家对他们不信任,总是将其不法行为看作是个不光彩的历史,于是他们便失去了自尊心,重操旧业。雅戈达情绪激昂地说着,预言在两三年内流浪在街头的少年犯罪现象将在苏联销声匿迹。然而,这些少年犯正是犯罪行为的根基,雅戈达设想再过10—20年,犯罪行为在苏联将被完全铲除掉。按他的说法,目前莫斯科已是世界大都市中犯罪率最低的城市(纽约是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这真是梦幻般的理想主义思想!一位政治首脑身上竟然生出这种思想实在令人吃惊,而他所从事的职业是残酷无情的,与

卢梭式的情感乐观主义极不相容。这样,一个人如果本质是善良的,那么他总有一天会再次成为好人,只要他有当好人的意愿!仿佛他甩一下肩膀就能卸去压在他身上的重负,不论这种重负是先天承继而来,还是后天由习惯培育而生!……我担心,今后这几年之内,这位罪犯改造大师总有失算的时候;其实,今天这一天尚未结束,就已经让雅戈达尝到了这种苦头。

但他所付出的努力仍然不失其价值及迷人之处。他对刑事犯如此关切,那么为何不以同样的态度去关心政治犯呢?我再次提到列宁格勒下达流放令一事,将那么多人流放到边远地区,给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我还提起将他们关在监狱或集中营的设想,这样,他们至少能有地方居住,能享受起码的卫生设施。雅戈达再次严肃地回答道:“我们无权对他们施行侮辱性的惩罚。”拘留所是用来关押刑事犯的,如我前面所提到在莫斯科附近关押着20万犯人的大型拘留所就是用于此目的。当局把罪犯关押在一起,是让他们去参加大型工程建设(凿通莫斯科河至伏尔加河的运河工程),这是治安型理想主义的又一奇特效果,他关注的只是精神及社会的疾苦,而对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却不闻不问!

雅戈达对我说:“15年来,我从未有机会、也未获许能同一位外国作家交谈。您是与我交谈的第一位外国作家。以前,我所承担的职务也不允许我这样做。凡有外国作家参加的会议我都尽量回避。”

他再次向我表明,我的名字及我本人在苏联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



7月13日 星期六

全天休息。天空依旧阴沉沉的。暴风雨过后,天气更凉爽了。我讨厌这种没有阳光的夏日,尤其是当阳光对我极为有益时更是如此。

上午,我和玛莎的婆婆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库达舍娃单独谈了一次话,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她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性,她讲话时字斟句酌,不但善于把握话语的分寸,而且说出话来意味深长,这对我颇有教益。她向我吐露的真心话对于我所观察及感受到的事物是某种补充。我们谈起有关苏联青年人的话题,他们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但他们那冷酷、甚至有些残暴的举止正是过早地经历了死亡与绝望而付出的代价。这些年轻人得知他们所熟识的这个或那个人死去了,可到了晚上他们照样去看电影。同时他们已养成不轻易吐露真情的习惯,这也是事出有因。开诚布公地表白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吐露真心就是在出卖自己。

年轻人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感。有些事与昨晚雅戈达所讲述的情形很难融合在一起。集中营关押的并不仅仅是刑事犯,那些持独特见解又不善于谨慎地保持缄默的人士则失踪了,官方将其思想意识强加给老百姓。我们还谈到了当前的种种政治运动。然而,现在所有的人都认可(难道与我谈话的这位女性也是出言谨慎吗?)革命的指导思想;他们意识到伟大的未来正在建设之中。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与我辞别时说的最后这句话可

谓意味深长。

下午喝茶时,军事指挥官费林也在场,他正指挥着运河开凿工程:在涅瓦河至白令海峡的运河完工之后,他们又在开凿莫斯科河至伏尔加河的运河。他就像古埃及伟大的建造者那样,带领着成千上万的劳动者,以钢铁般的毅力劳作着,但他也关注着思想改造,而这种改造决不是装装样子,这真让人吃惊不已。他和雅戈达一样,也是一个卢梭式的专横的理想主义者,可他的性格与雅戈达的完全不同。他是西伯利亚人,体格强壮,相当年轻,国内战争期间曾当过游击队员。他将自己内心的顾虑坦诚地告诉高尔基,征求他的意见,因为他所关注的一个歹徒旧习复发,可他为这人付出了多少心血呀!这人手里还有共产党党证,因四处行骗而被捕,费林将其安排在自己的机关里干点杂活。最近他负责收集伙伴们的捐款以建造一架飞机,募集到的这笔钱共100多卢布,可竟然被他卷跑了,他本人也没了踪影。费林非常气愤。“他要偷了一大笔钱,”费林说;“我反而倒会宽恕他,但被他侵吞的却是伙伴们一分一分挣来的血汗钱。”旧习复发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是最可耻的。费林始终无法理解一位有着辉煌过去的共产党员怎能堕落到这种地步。这次,他要狠狠地惩罚他。时隔不久,这位劳改犯请求放他出去,他要去看望生病的儿子。尽管费林对他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怨,但还是放他出去了;他以为这家伙不会回来了。没想到他回来后,就找他报到,并且对他说:“指挥官同志,现在我想把过去隐瞒的一切都说出来,我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我手里的党证是偷来的,我还编了一套假身份证明。您对我太好了,我得把这一切都告诉您。随您怎么处置我都行!”他本来应被判处死刑的。费林当然还让他干原来那份工作,仿佛什

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但他知道这家伙旧习难改,还会犯错;他为此而感到焦虑不安:到底怎样才能控制住他呢?高尔基建议道:“就利用他对儿子的爱心吧。”我们后来还谈到两名女犯人,费林一直在关注着她们,说她们是“两位极善良的女人”;她们过去曾是政治恐怖分子(罪犯集中营内关押的并不仅仅是刑事犯,这便是明证!可雅戈达却死活不肯承认)。费林称其为“虚无主义者”,高尔基对此深感震惊;我之所以叫她们‘虚无主义者’,”费林说;“那是因为她们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服饰,她们的穿着倒更像男人。”他自称十分信任她们。在基洛夫被暗杀之后,他在劳改犯大会上用威胁的口吻讲了一番措辞强硬的话,他说今后会留意那些历史有疑点的人物。在这番讲话之后,两位“虚无主义者”来到他面前,对他说:“我们明白您那番话的意思,那是在说我们。同志,请您把我们派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派到有去无回的地方。我们想洗清对我们的怀疑,向您表明我们的忠诚之心。”费林还谈到了坏天气,最近这几天连绵的阴雨并未阻断运河工程。工地上没有人生病,有一位劳改犯是工程师,发明了一种预防痢疾的疫苗,现在已将这种药物推广开来,而且效果不错。

芬兰族女歌唱家伊尔玛·雅乌恩森是民俗学家,她走遍了从乌克兰到中国边境的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晚上,她给我们演唱了许多美妙动听的民歌,这些民歌都是她本人采集的。她的嗓音热烈、清脆,善于把握所要表达的每个民族及人物的声调、音色和表现力(当我后来看到这些歌曲的曲谱时,我竟然认不出来了:歌曲中的灵气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众多的歌曲中,我辨别出一首遒劲的鞑靼歌曲,这是一首16世纪的古曲,它那悲怆的夸张曲调与我们的《雷诺国王》有异曲同工之妙,我还辨认出一首亚

美尼亚的似热恋中的夜莺之曲 ,亚美尼亚堪称是苏联境内的意大利——闻名遐迩的音乐之邦。

高尔基在其情趣与话语中总是流露出无政府主义意识 ,他过去曾是无政府主义分子 ,将来也不会改头换面 ,除了流浪汉、冒险的生活及流浪汉的歌曲外 ,他什么也不喜欢。



7月14日 星期日

早晨盥洗时 ,腰疼得要命 ,仿佛整个身子像折了一样。白天所有的计划都受到影响(我们本来安排到莫斯科去听现代交响乐 ,这场交响乐会是苏联年轻的作曲家特意为我组织的。我还应该去参加一次弥撒活动 ,这样在返回瑞士时 ,便可向世人表明在苏联人们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家庭的保护神 ,善良的奥琳匹娅达用孟加拉香膏为我按摩 ,为我做电疗、理疗、拔火罐。一整天我都待在房间里。

只是到了晚上 ,吃过晚饭后 ,我才下楼来到大厅里 ,向两位彼什科娃女性致意——一位是高尔基的儿媳 ,一位是他太太 ;她们俩刚从欧洲旅行归来 ,走访了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威尼斯参观了提香的画展)。大概人们是想让年轻的女人散散心 ,摆脱丧夫的悲痛(我觉得这一举措还是挺有成效的……她显得很高兴 ,也

更“年轻了”)。^①两位女性和蔼可亲,人也显得雍容华贵,年轻的女性十分漂亮,面露笑容,纯朴、迷人;另一位女性微笑中暗含着丝丝悲痛(这悲痛也不总是含而不露:不久我便知道到底是何缘故)。

晚间,人们为我们放映了两部电影:《露底的皮鞋》,影片里的大部分人物都是孩子,他们表演得纯朴自然,堪与弗拉比耶的《幼儿园》中的人物相媲美,只不过影片中的故事背景更惨烈(描写柏林及汉堡的罢工及起义);《金色的湖泊》,影片展现了阿尔泰地区的优美风景,原始森林及动物王国(熊、狐狸、飞鸟、毒蛇等)还展现了蓝天碧水,但影片的情节极为幼稚(不乏



高尔基和儿子

淘金者,匪徒,凶恶的“沙曼”)让人不禁想起曼雷德的作品,但其历险过程要缓和得多。影片结尾时,原始森林燃起了熊熊大火,三架灭火飞机向那里投放灭火弹。

^① 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1878—1965):高尔基的第一任夫人,是他儿子马克西姆和女儿喀丘莎的母亲,1937年前一直在红十字会担任领导职务。娜德伊达·彼什科娃(1902—1971),画家,高尔基之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1897—1934)的妻子。

(前几天我看了一部题材欢快的影片,描写苏联飞行员的生活,还看了几部有关中亚地区的记录片,我忘了将其记录下来。)

高尔基身体又不舒服了,咳嗽得很厉害,起码要到凌晨两点才能睡着(他要按摩师用草编工具给他按摩,害得按摩师得同他一起守夜)。这时,克留契科夫便利用这段时间,带着他那年轻的妻子开车到莫斯科城里去看朋友。直到凌晨四五点,他们才赶回来上床就寝。他们在这儿过的这种夜游神般的生活,对于西方劳动者而言,是决不可能的。



7月15日 星期一

腰部依然感到十分疼痛。下午,用完茶点之后,看了几部记录片以及《圣彼得堡之夜》,影片导演得很出色,摄像也很美,故事情节颇为荒诞,描述的传奇故事令人难以置信,当然是为了迎合这里人的口味。

晚餐时,拉狄克^①坐在我身边,他喋喋不休、一刻也不停,从某一话题跳到另一话题。然而,他那餐盘里的东西总是很快就被吃

① 拉狄克(К. Б. Радек, 1885—1939) 联共(布)中央委员。生于波兰。早年参加过波兰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逐出德国,流亡瑞士。1917年到俄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27年因参加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被开除出党。1929年恢复党籍。1936年在大清洗运动中再次被开除,1939年被处决。

光了(但他嘴里的话却没有说完的时候)。他是党内很厉害的一张嘴。他什么都说,而且有些肆无忌惮。他是个危险人物。我听他宣称战争肯定会爆发,而且会是一场全面性的、令人生畏的战争,也许明天,也许明年战争就会降临在人们头上,当务之急是要赢得两三年的喘息时间,以便我们(苏联)能够掌握主动权。”到那时,农民便能获得足够的财富,或无论如何也要让他们相信现制度乐于给他们带来财富,这样他们便会拼命保卫现制度。战争爆发时,最初几个月的损失将高达80%。轰炸像柏林及东京这样的城市不免令人感到惋惜(他说这话时,也许是真诚的,但他似乎总是在开玩笑)最近他走访这两座城市时曾这样想过。诚然(在此他回答了我提给布哈林的问题,布哈林肯定将此转达给他),苏联绝大部分农民还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人所共知的,尽管富农阶级被消灭了,但富农阶级的思想并未被消灭。将他们团结在党的核心周围,他们将来一定会打得很不错。敌人暗杀了基洛夫,以此攻击我们的领导班子,此后,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这类事情不再发生;当局给国家保安局赋予新的使命,要他们实施检查、清洗、流放;天哪!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有失误及不公平现象,不过是某个阵营里少了或多了几个人而已!当涉及到公共安全时,这些小节算不了什么。至于说法国共产党的义务,它应该支持法国政府反对希特勒德国,共同抗击德国,在获取胜利后再反过来向政府作斗争。假如托洛茨基继续在其报刊上叫嚣反对法西斯军事联盟,那么我们会把他亲手签署的文件公布出来,证明他在1918年参加了同涅塞尔将军的谈判,以建立反德军事同盟,何况,几年之后(1921或1922年)他曾考虑与德国结盟来抗击来势凶猛的英国人。谈到这个话题时,拉狄克回想起他和布

哈林曾反对签署《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①，他们俩一起到克里姆林宫去责备列宁。他们对他说：“签署这样一个和约您会问心有愧的，向人民解释不清您还会有愧。”“为什么不能签呢？”列宁说道：“我肯定会签署这份文件，我会把一切讲给人民听。人民会理解的，因为人民可不是你们这样的傻瓜。”说完便将他俩轰出门外。

拉狄克说了许多有关托洛茨基及反托派的话，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仿佛过去从未与托洛茨基共过事。他太谨慎了。

他个子不高，宽脸膛，戴着一副舒伯特式的眼镜，脖间蓄着一圈络腮胡子（像犹太人那样，后来我在华沙犹太人聚集区见许多犹太人都蓄这种款式的胡子），他的头顶已谢光了，而周边的头发则显得乱蓬蓬的，他不停地打着手势，甚至连吃饭时都比划着。高尔基听他说着，不时插上一句话，几乎只有拉狄克一个人在说话。

他是和妻子一起来的，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妻子如何有眼光，如何会评判人（她对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的评价着实不太

^① 《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及其盟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今布列斯特）签订的条约。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发布《和平法令》，倡议一切交战国举行和谈，遭拒绝后于1917年12月5日同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即开始和平谈判。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托洛茨基违抗列宁指示，奉行“不战不和”策略，拒绝签定和约。德军借机破坏和谈，大举进逼列宁格勒。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政府，为保障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国家的安全、独立，决定于1918年3月3日在德国提出的苛刻条约上签字。根据和约，苏俄丧失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给付巨额赔款。但苏俄据此也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喘息时机。1918年11月13日苏俄政府利用德国在大战中的失败宣布废除此约。

善良)。

同我们一起用餐的还有乌里茨基,他负责全苏农民的主要报刊(约有几百万读者)。他过去待玛莎很友善,高尔基和他一起帮助玛莎获得赴瑞士的签证,起初有关人员就是不肯给玛莎办签证。

谈到肖像时,大家说起了列宁,说他见满街都挂着他的肖像十分恼怒:“这让我感到恶心。我到处都能看见自己那丑陋的相貌。”这种恶心的感受斯大林绝对感觉不到。



7月16日 星期二

彼甫兹涅尔医生是肠胃病科专家,前来为我作体检,他是欧洲医学界的权威人物。他人很瘦小,肤色发黄,相貌长得很难看,对工作却极为专心,神情虽有些阴郁,却为人善良。他显得极其悲观(太悲观了),总让人感到不安。我的瑞士医生认为我身上肠梗阻的危险已排除了,但他却不同意这一诊断。他并未说近期内会有危险,但嘱咐要时时给予关注,他精心地为我开出一系列处方,要我严格遵照执行,我要真是按他的医嘱去做,我的生活会变得很复杂。我返回苏黎世时,将其讲给海梅尔里医生:采用石英光理疗,每隔两三天灌一次肠,甚至如有必要,可用虹吸管灌肠,每天要按摩胳膊和双腿,还要严格执行复杂的特定食谱——这几

天戒盐、那几天戒糖，每天喝两杯不同的果汁，严格控制饮料的摄入量，等等。总之，这不过是给那些老朽的器官过多的关注罢了。

下午，莫斯科及列宁格勒的电影导演及制片主任集体来访，共有 20 余人，其中有普陀甫金，他是《亚洲上空的风暴》的导演（不巧的是，爱森斯坦不在苏联）。我所看过的重要影片的导演都来了，如《国境线》、《露底的皮鞋》（两位导演都是女性）、《羊脂球》、《圣彼得堡之夜》、《快乐的伙伴们》等。导演及制片主任有男有女，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与文学家们相比，我对他们更有好感，因为他们的思想很开放，衷心希望能提高自己的水平。他们给我提了很多问题，我和高尔基一起给他们解答。我们谈论得很友好，也很热烈，我们坦诚地指明我们所注意到的缺陷，他们聚精会神地倾听我们的评论，因为他们真诚地希望这些批评意见能敦促他们进步。我们探讨了有声电影的主要问题，对无声电影遭受遗弃的厄运，我向普陀甫金表达了惋惜之情：无声电影应当保留它应有的位置，它所具有的暗示能力是有声电影所不具备的。不管怎么说，有声电影尚未找到自己的语言，因为得创造出一种与其相适应的风格，甚至是一种简洁有力、富有诗意的风格，采用强烈的简约手法。他们要我写一部电影剧本。而恰好我所想到的那个题材（有关巴黎公社）目前正在拍摄之中。我们当然也谈到了我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他们想把它搬上银幕，但有必要到勃良第拍摄外景（我坚持要到那儿去拍摄外景，但还要继续商谈）。

晚上，吃晚饭时，实验医学院的三位医生同我们一起用餐；两

年前,该院从列宁格勒迁到莫斯科,并且进行了重组。高尔基似乎为医学院的改组提供了一笔捐款。在科研领域,医学院将同一课题下的不同学科汇集在一起,如:实验医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学等,他们可同时从各个方面对同样的问题进行研究。他们培养出的医生视野开阔,综合能力强,过去培养出的医生是不具备这种能力的。大家似乎相信在几年内将对医学界来一番革命。在医学界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大家对革新和创造怀着极大的热情。医学院最著名的斯彼朗斯基医生也在场(还有院长费多罗夫),今晚的交谈是他在唱主角;他所做的实验让公众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对“控制”病情发展的实验(比如,认为伤寒的发烧症状只能持续两三天,此后,其他并发症便会取代发烧症状,但将首个病症“控制”住之后,随后的并发症就不会出现了)。他将大部分病因归咎于神经中枢(斯彼朗斯基还谈到科学发现的同步性,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人们可在同一时刻作出同样的发现)。我们的朋友加尔托赫医生也隶属于这家医学院,但他在列宁格勒分院工作,分院是先于总院成立的,目前尚未开始这类新的实验。他安心于传统的研究,对新实验持怀疑态度,我看他对此颇为心满意足。

晚饭后及饭后,我同坐在我旁边的叶卡捷琳娜·彼什科娃聊了很长时间。她和所有这一阶层的人意见相左(但她掩饰这一点)。她在红十字会担任领导职务,据她讲,她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她对此感到极为痛苦。她对雅戈达抱着深深的敌意,对他的评价极为苛刻。我言简意赅地谈起维克多·塞尔什的遭遇,特

别谈起手稿遗失一事。她的判断与我从雅戈达那儿所听到的截然不同。

可是,人们都在向我称赞雅戈达,说他在几年内衰老了许多,也累瘦了,说他常常焦虑不安,他为人善良,还有心脏病。

我不偏不倚地将这些截然相反的印象及评价记录下来。也许两边讲的都是实情。

高尔基为人非常善良,但常常忽略某些小节,他其实依然是个老流浪汉。在他家里我还注意到,过度使用仆人的陋习依然存在,而且无人关注此事。等所有的客人离开以后,仆人要到凌晨2点才能就寝,而且早晨7点就得起床了。

在一次聊天时,高尔基无意中提到格兰女士(文化及娱乐公园的那位女士)曾向他索要9400万,以用于她的工程。他说:“我可没有9400万,我只有400万。”他是在开玩笑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攒不下钱。



7月17日 星期三

在莫斯科度过一天。我的腰依然很疼,但却勇敢地经受了那100公里的汽车旅程。天空终于放晴了。

我们先去参观了“国际工人互助”电影制片厂,在这儿,他们为我拍摄了一组镜头,是为一部描写季米特洛夫的影片所用。但我拒绝在影片中扮演角色,哪怕只是装装样子。我坐在一张桌子前,同他人聊着天。借此机会,他们给我们演示了彩色影片的首次试拍的效果。影片的题材是一家陶瓷厂的工人在举行罢工,工厂主为骗取保险金而纵火烧毁了工厂,结果造成42名工人死亡(确有其事)。影片的画面就像一幅幅漂亮的水彩画,拍摄得非常成功,但格调有点像恩耐尔的陶瓷画。我并不认为电影由于有了色彩和声响就变得丰富多彩、好看起来。

在高尔基位于莫斯科城里的家中,我接待了费多尔·革拉特科夫^①及阿尼西莫夫。革拉特科夫个子不高,50多岁,脸庞很大,相貌平平,头发乱蓬蓬的,看上去远远落后于新时代,对种种新尝试已无能为力了,很难再去吸收那些新探索的精髓并将其和谐地

^① 革拉特科夫(Ф. В. Гладков, 1883—1958):全名为费多尔·瓦西里耶维奇·革拉特科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水泥》、《原动力》以及自传体三部曲《童年的故事》、《自由人》、《荒乱年代》。

运用到艺术之中。他以其成名之作《水泥》而成为苏联长篇小说之路的拓荒者,但人们感觉到他已没有力气继续开拓了,他对此感到十分痛苦。言谈话语之中,他显得很谦逊,也很庄重。阿尼西莫夫正在撰写一部有关我作品的书籍,他向我提了许多问题。他很友善、开朗、直率,对任何事情都不怀疑。

早餐后,我参观了一家工人俱乐部,莫斯科文化局的负责人带我前去参观。他很年轻,个子很高,曾在顿涅斯煤矿当过矿工,也参加过国内战争(从工人阶层脱颖而出的人物精力旺盛,可以晋升到很高的职位,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说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我们参观的这家俱乐部正在建设之中,原址是一座修道院,后来它被炸掉了^①(高尔基为保留修道院的两座古塔而四处求情)。新建筑的设计图很漂亮,已竣工的只有一座可容纳1100名观众的剧院,由维思宁兄弟^②所主持的设计很出色,剧院内过道很宽,演员休息室也十分宽敞,通风效果亦很好,舞台是旋转式的,划分出三个演出区域,剧院里装备着最现代化的设施。在苏联有一种有趣的现象:一项工程开始时,人们总是先建剧院,然后再去建图书馆。接着,我们参观了一所小学校,该校的原址是一座大垃圾场,除此之外,它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带我们参

① 顺便指出:在莫斯科,当局确实拆了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② 维思宁兄弟:苏联建筑师,有三兄弟——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维思宁(1880—1933)、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维思宁(1882—1950)、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维思宁(1883—1959)。1925年起,三兄弟成为建筑学中构成主义派的首要代表。他们在集体设计时,注重建筑物的实用效果,在建筑中采用新式的结构和材料。代表作有第聂伯河水电站(1927—1932)、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文化宫(第一期工程1930—1934)等建筑。

观这所学校的人似乎以为,在西方我们没有这么明亮、规划得这么好的学校!斯大林的新计划要求今年在莫斯科开办70所学校,明年要开办150所学校。然而,打个比方,到哪儿去找这些学校所需的500名地理老师呢?文化局长说,要是5000名教员到他这儿来求职,他肯定会把他们派上用场。我询问了一些详细情况,教师的平均工资为每月三四百卢布。(陪同我参观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任波希顿诺夫说:“差不多和我们挣得一样多^①。”)学校校长的工资是每月五六百卢布。额定的工作时间是每天四五小时,但他们实际的工作时间要长得多,因为还要补空额,替别人代课。他们肯接纳外籍教员吗?原则上是可以的,但他们似乎并不想雇用外教。况且,外教除了要掌握俄语,还要在思想意识上“合乎要求”。

我还参观了特列吉亚科夫画廊中的古圣像馆,画廊的负责人是克利斯蒂(一次大战时,我曾在圣雷热叶·维维叶的卢纳察尔斯基家与他见过面),马泽雷尔曾用赞叹的口吻对我提起过这些古圣像。这里收藏着12—15世纪的古圣像,其流派之多,风格之繁令人惊讶不已(有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特维尔等地的作品)。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拜占庭式的刻板风格。其色彩、表现力及节奏感都十分鲜明(在那个时代是出乎意料的)。从14世纪起,有些作品对色彩的要求极为考究,极为精细,仿佛就是现代主义的作品。馆藏当中的一件瑰宝是15世纪初叶著名画家鲁勃廖夫的一幅油画,题材是天使

^① 这种话是不实之词。—原注

三位一体忌日,这是一件孤品,画面柔美和谐,完美无缺,堪与拉斐尔的作品相媲美。这是绘画史上的奇迹,那个时代与他同样令人称奇的画家还有凡艾克,及著名的三折画家克斯汀梅特西斯。这座大型博物馆的其它部分就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展品了,但展示列宁半身雕像的那间展室除外:雕像的作者曾长时间观察过列宁,将他各种不同的情感都表现出来,这对心理学及历史而言是极宝贵的资源。

落日的余晖漂亮极了,我们穿过片片草地和森林,于7点半左右返回家中。吃过晚饭后,与高尔基亲热地聊了一会儿。



7月18日 星期四

(玛莎白天大部分时间在莫斯科)

上午,我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土地》,这部影片从总体上看十分平庸,但画面拍得很美:乌克兰的风土人情、自然景观都拍得美极了,这是一部无声影片,映出乌克兰语字幕;另一部是记录片《莫斯科河至伏尔加河之运河》:影片展现了工程的初始阶段,大型挖掘机就像史前的怪物;人们用粗大的水管冲开障碍物。影片结尾处还介绍了犯人的营地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雅戈达和高尔基都出现在记录片中。今天雅戈达也和我们一起看电影,不论是他还是高尔基都不喜欢《土地》这部影片。我听见坐在我身后的雅戈达说:“这部片子真是糟糕透了,而且还有点下流。”(片



中有一个失恋女人的裸体镜头。我们在这儿看的影片都是未经删节的全版片)

我们又谈起了维克多·塞尔什。早晨,我曾给雅戈达写了一封信,坚持要他设法找到手稿,并将手稿交给我,这次他告诉我,手稿已经找到了,现在莫斯科书报检查署处^①;他说,这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部有关战前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性及文献性的著作;但扣下手稿的书报检查署又不归他管,我们谈话时,彼什科娃女士也在场,对雅戈达后一段话表示怀疑。雅戈达突然对我友好起来,颇出乎我的意料。他给我带来一束漂亮的红色和白色的百合花,是从他家的花园里采摘下来的(雅戈达也有乡间别墅,也在高尔基别墅所在的那个划定的禁区内)。

我和雅戈达及彼什科娃女士共进早餐,两个仇敌面对面地坐着,相互微笑着。

下午在花园里散散步,同继子谢尔盖聊了聊。

用毕茶点之后,30多位格鲁吉亚的音乐家来拜访我们,他们将同乡艾里亚瓦介绍给高尔基,艾里亚瓦现任苏联重工业委员会副主任。他们都不是职业音乐家,而是工人或农民。他们身穿格鲁吉亚民族服装,腰间佩带短剑,剑柄都是象牙制成的。最别

^① 因此,雅戈达好像并不了解情况,因为几天前他告诉我,手稿并不在莫斯科。作为一名内政部长,一名格勃乌的前首脑,竟然不知道自己部门里发生的事情?阿罗塞夫曾告诉我,马泽列耶尔最近在苏联旅行时遭到歹徒的抢劫,歹徒将他及几名旅伴麻倒之后将他们的财物洗劫一空。我把这事告诉了雅戈达,但他却矢口否认,说从未听说过这事,这是在造谣!我返回瑞士后,同马泽列耶尔谈起这事,他证实,他和翻译及几个英国同伴在熟睡时(可能被氯仿药麻醉了),东西被洗劫一空。他身上带的钱,证件夹及素描画册都被偷走了。难道雅戈达真的不知道吗?——原注

致的当属“古里人”，他们是梯比利斯的装卸工，头戴查理六世式的风帽，身穿绣着领饰的马甲，外套一件深蓝色的外衣，像其他人一样，足蹬一双长筒靴。带队者是一位70岁的老农，穿着一身金黄色的服装。他们唱起一首奇特的三重唱，这种对位的重唱风格就像他们头顶上风帽式样那么悠久，或至少像法兰西斯一世^①的帽子那么古老；在各个独立声部雄壮的进行曲之中，有模仿喊声及嘈杂声的曲调。最奇特的还是古里人，在每个独立的声部之中，他们所唱的复调歌曲有某种闻所未闻的坚定气概，歌曲的声调十分丰富，在通奏低音的陪衬下，高声清晰可辨。这是15世纪的对位唱法，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有些用假声唱出的曲调带着明显的山区烙印。几个卡巴尔达地区的高加索人穿着紧身的长袖外套，手持马刀，脚踏无跟长筒软靴，头戴宽下窄的传统民族帽，跳起了奇妙、粗犷的阿布哈兹舞，还跳起了舞姿柔美的列兹金卡传统舞蹈。格鲁吉亚合唱队围成一圈边唱边跳。乡村芦笛、铃鼓及击掌声为舞蹈者助兴。此后，高尔基设宴招待了客人。大家先选出一位酒宴的“司仪”，由他来安排祝酒辞，祝酒辞冗长华丽，但却有一言九鼎之势，第一个祝酒辞献给高尔基，第二个是给我；第三个是给艺术及为艺术带来灵感的女人；接下来是献给组织者，献给斯大林，等等。每次碰杯之后，所有的人都应将杯中酒喝尽。每次敬毕祝酒辞，“司仪”（艾里亚瓦）便安排一次合唱或独唱。牧羊人在笛子上即兴奏出各种飞鸟的啁啾啼鸣，使人仿佛置身于一座大森林之中。宴会结束时，大家用格鲁吉亚语唱起了

^① 法兰西斯一世（Francois I, 1494 - 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

《国际歌》歌曲结尾的节奏已被格鲁吉亚化了)。但我注意到古里人却没有唱这首歌,他们紧闭着嘴唇,面无表情。宴会结束后,大家又开始唱呀、跳呀,活跃起来。那个神情忧郁的小伙子刚才还在一个接一个吃着奶油炸糕,把一盘子都吃光了,这会儿又跳起粗犷的舞蹈,他嘴里还发出阵阵喊声,好让自己亢奋起来。由于乐队还得乘车到人民公园里上演两场音乐会,要不然,他们能在这儿连续跳上一宿。

晚饭时,雅戈达和彼什科娃女士再次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斯大林的女秘书给我们带来我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时谈话的记录副本,这个记录稿斯大林本人已经修改过了,她要我也审核一遍。一位年轻的女子,颧骨很高,脸平平的,塌鼻梁,颇像蒙古人,是来自阿尔泰地区的教师(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是机枪手);她为我们清唱了几首美妙动听的布里亚特歌曲,有些曲子可上溯到公元10世纪。

在场的主人们都向我们表达了真挚的友爱:包括高尔基、克留契科夫、雅戈达等人。他们对我们说:“别走了,留下来吧!……如果你们一定要走,那就一个月以后再回来!……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一座房子,你们愿意在哪儿都可以,无论是克里米亚,还是在莫斯科郊外……到哪儿你们都不会像在这里似的,生活、工作得那么惬意,周围有那么多人照顾你们,对你们充满爱意。别走了!……”



7月19日 星期五

我在审阅斯大林派人交给我的会谈记录的副本。

人们为我们放映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高加索影片《裴珀》，展现出梯比利斯城 1870 年时的状况，影片反映出高加索地区优美的风景及秀丽的景观；另一部是记录片《从莫斯科到卡拉库姆》，记录人们是如何穿越比撒哈拉还要大的沙漠的。

有关我继子与其妻子的住房问题同克留契科夫谈了谈（在莫斯科住房依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对于学生、教员及小职员而言，莫斯科的生活还是非常艰苦的。莉吉娅·帕甫洛夫娜对玛莎坦言，那天她请玛莎及几位朋友吃早餐，一餐简单的冷食竟然花了 86 卢布。一大块巧克力要卖 25—30 卢布。当我们在高尔基家或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招待会上看到各种食品浪费严重，我们感到很不自在。种种怨恨不积聚起来那才怪呢。

传言说肖斯塔科维奇拒绝来见我，就因为我是“共产主义者”。大概这只是谣言而已。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有某种藏而不露的敌对情绪，对此我毫不怀疑，更不要说作家之间的嫉妒甚至相互倾轧了，这是常有的事。



7月20日 星期六

我将一封道别信寄给斯大林,信文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在我行将离开莫斯科之际,我谨向您表示最诚挚的敬意。我在苏联度过短暂的时日,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逗留更长的时间,在此期间,我接触到伟大的人民,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斗争,以冲破重重阻碍,去建设一个新世界。我对他们那健壮的活力、生活的乐趣、豪放的热情感到由衷的钦佩,尽管物质还不是很丰富,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但他们逐渐克服了这些困难,这正体现出他们所从事的宏伟工程的价值。

这次来访印证了我来之前的预感,我将带着坚定的信念离开这里:世界真正的进步与苏联的命运紧密相连;苏联是全世界无产者的温暖之家;无产者应当是而且必将是人类的主人;保卫苏联,反对所有威胁苏联发展的敌人是所有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亲爱的同志,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我一直在履行这一责任,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继续履行这一责任。

我紧握您的手,通过您,我紧握着伟大人民的无数双手,我觉得与他们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

罗曼·罗兰

克留契科夫马上把这封信带走了,带到克里姆林宫,转交给斯大林。斯大林很快派人询问是否可将此信在报上发表。这封

信得到了克留契科夫和高尔基的热情称赞。

雅戈达悄悄地将维克多·塞尔什的手稿交给我,它是被文学审查机构扣下的。他要我在动身之前还给他。夜深人静时,我读着这部手稿。书中描写了1909—1914年西方绝对自由主义者的生活,特别是描述了鲍诺事件,故事相当悲惨,该书并未去颂扬绝对自由主义者(况且他们决不接受无政府主义者的称谓),而是在结尾处承认他们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预感到革命会到来,没有为革命去献身。将这部书的手稿扣下来是没有道理的;我让人把我的看法转达给雅戈达。

上午,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马克西姆的青年时代》,描述革命者在1900年间的成长过程,故事很感人;另一部是《活佛》,描写了塔吉克斯坦的阿迦汗^①一世。

晚上,我又看了一遍《恰巴耶夫》,其朴实无华、准确的表现手法令我深感震惊,比前一次看这部影片时的感受还要强烈。

帕斯捷尔纳克在经受着神经衰弱症的折磨,这样他在路过柏林时便无法去探望他父母了,他已有12年未见过父母亲了,他现在把自己关在离莫斯科不远的房子里,不想也不能见任何人。他申明非常想见我,但他说,假如他真的见了我,他只能是痛哭一场。

在我们离别的前夜,高尔基心情忧郁。他作了很多努力要让我们留在苏联。他梦想着让我在苏联定居下来。

^① 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伊玛目的封衔。



7月21日 星期日

动身的日子。晴天。(早就该晴天了!)

雅戈达给我寄来几束鲜花。

我写给斯大林的道别信刊登在《真理报》上。在高尔基的书房里与他谈了很长时间。他对我谈起托尔斯泰,在俄国他的影响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么大。这个影响是托翁的追随者制造出来的,他们与托翁的思想没有任何关联,甚至歪曲了托翁的思想,倘若他们没有背叛或否定托翁的思想,这种事时常会发生。高尔基向我叙述了这些小团体的事,他本人也了解这些团体;有些团体的首领在利用完托翁之后,最终又反过来恶毒地诽谤他。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其实并非源于他本人,他取之于几个虔诚的农民;高尔基详细地描绘了这几个人。作为作家,托尔斯泰常常显得十分笨拙,有些表达方式和句子很粗俗,有时甚至会令人难堪(即使有人给他指出时,他也照样不去修改,以表现出他对外在形式那傲慢的蔑视之意,再不就是出于固执的性格)。但他观察、刻画人物及景物的才气是无人能比的,几乎是举世无双的。高尔基非常钦佩托尔斯泰,尤其钦佩普希金,但这并不妨碍他严厉地批评他的思想,甚至他性格上的某些弱点,他的思想超前于观察。高尔基以艺术家深切的赞叹之情回忆起《哈泽—穆拉特》中对风景(山

中隘道)的描写。高尔基厌恶(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虚伪,最近发现的他写给波别多诺斯采夫^①的信件将其虚伪展现在世人面前。但他还是承认陀氏不失为伟大的作家。在依然在世的作家中,他似乎对阿列克赛·托尔斯泰^②的天生的才气十分钦佩,而后者却在滥用自己的才气。

高尔基似乎与他的读者从未有过密切的联系。也许他现已被保护性的栅栏与读者们隔开了,矗立这个栅栏的正是虔诚的秘书克留契科夫以及他本人那过分官方化的地位。

我问他,苏联政治家是否对文学感兴趣。他答道:是的。当前的危险是,太多的作家傍上了政治家,不择手段地利用政治家,让人感到恶心。在喜欢读书的领导人中,他特别提到雷科夫和斯大林。但斯大林读书时总想在书中找出讨论的主题,他可以连续讨论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读完一页后,他可把这一页全背下来,几乎一字不差。他要到高尔基家来时预先通知他,并问他:“我们可以请这位吗?可以请那位吗?”

几代作家都已过时了。革拉特科夫那一代作家已远远地被

^① 波别多诺斯采夫(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1827—1907):全名为康斯坦丁·彼得洛维奇·波别多诺斯采夫,沙皇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律家。1880—1905年任正教院总监,在亚历山大三世王朝颇有影响,主张维护沙皇专制统治。撰有法律史方面的著作。

^② 阿列克赛·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 1883—1945)指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苏联作家。作品有描写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时期所走的道路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以及历史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未写完)。此外,还著有科幻小说、短篇小说、儿童文学、戏剧剧本等。

抛在后面,潘菲诺夫^①这一代也将会遭此厄运。这里与西方有所不同,在西方,艺术家都走在公众的前面。这里却恰恰相反:公众走在艺术家的前面,催促着艺术家。

下午4点钟左右,我们离开高尔基在郊外的别墅。高尔基十分激动,说他随后就到莫斯科,去车站送我们。我们尽量说服他不要去,因为这对他的身体没有好处。但他的意愿非常坚决,我们相互拥抱告别。在我们离开高耳奇之际,雅戈达又派人送来几束鲜花!但未将我索要的维克多·塞尔什的手稿送来。

我独自一人和彼什科娃女士同乘一辆车。她不无辛酸地说起高尔基就她在红十字会工作所采取的态度,她想以红十字会的名义为政治犯办点实事。可高尔基却说大概不会有什么实事可办吧,那是在干预国家政务呀。事实上,彼什科娃女士的手脚完全被束缚住了,她几乎什么事情也做不成。雅戈达^②可以破例为某人作出减刑的决定,来满足彼什科娃女士的要求或满足我的要求,但彼什科娃女士无法容忍靠求情来争取破例,尤其是她在履行人的最基本的责任。她说,雅戈达表面看上去很温和,但他决不允许自己出差错,即使和他商谈也得不到什么结果。彼什科娃女士已经注意到为刑事犯所做的善举与政治犯的命运有所不同:

^① 潘菲洛夫(Ф. И. Панфилов, 1896—1960)全名为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潘菲洛夫,苏联作家,曾长期担任《十月》杂志主编(1931—1960)。著有长篇小说《磨房石农庄》(1—4卷)、三部曲《伏尔加河——母亲》。

^② 雅戈达和高尔基一样都是下诺夫哥罗德人。高尔基结识雅戈达时,他才14岁。他们俩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是很自然的。

当局正在对刑事犯进行改造 ,而对政治犯却什么事情也不做^①。

在高尔基位于莫斯科城中的寓所 ,我们要从 5 点钟一直等到列车出发(晚间 10 点左右)。哈拉托夫前来拜访 ,他现任科学发明委员会主任。他对我谈起发明的热潮 ,常常是普通工人的热情特别高。轰动全国的最新发明是让死人静脉中的血液再流动起来 ,这项发明目前正处于试验阶段。在担任现职务之前 ,哈拉托夫在交通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此前则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任 (他任此职时我与他相识)。国家让干部们轮流在国家机构的各部门任职来培养他们。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罗曼语民族部新任负责人来访。

我和继子谢尔盖亲密地交谈着 ,他向我披露了学生们(一部分学生)的痛苦和恼怒。他说 ,许多社会类的课程每周要上好几个小时 ,而总课程都已安排得很满了 ,但愚蠢的是授课人都是平庸之辈 ,答案都是预先设定好的。根本不可能在一起讨论。这些蠢货无疑是在培养反对派 ,但反对派又不敢相互交流。这事并不是才刚刚发生的 ,与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所有的社会制度都会犯同样的错误。我在青年时代不也因大学里强迫性的教义而起来造反吗(我在高等师范学院上学时 ,因憎恨官方的唯灵论而拒绝学习哲学 ,唯灵论是考试时强加在学生头上的试题 ! 风水轮流转 ,但总是同样的风水)。谢尔盖向我解释为何不愿做法国大学生和他本校学生之间的联络人 ,我和他母亲曾建议他能起一个桥梁的作用 ,这样 ,与法国学生交流时就不能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① 彼什科娃女士在红十字会里的主要助手是资深革命家薇拉·费格涅尔。—

他对社会工作糟糕的组织状况极为恼怒：费了很多时间，却没有什么收效。各个学科也不是自由的，因为有些结论已用形而上学的手法作好了（在我们谈话时，后勤总管打开房门，没有任何借口便闯进房间里来，我只好把门又关上）。（参阅我前面描述的在高尔基家花园附近树林里的场景）

我将他的抱怨记录下来。他所说的是很严肃的。但还应考虑到这孩子的思想状况。他幼年是在祖母家长大的，祖母曾是一位公主，人很聪慧，视野开阔，但显然与革命格格不入；他周围的亲戚都是属于没落的贵族阶层。尽管他很聪明，能分辨出（虽有些遗憾，但这是事实）共产主义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合乎情理的，但他身上有某种本能及偏见，使他不能与共产主义青年融合在一起；他们那快乐的信念及希望也不能使他振作起来；有些人置身于伟大潮流之外，赌着气、不无遗憾地看着潮流从身边涌过，或不情愿地随着潮流奔走，他正在扮演这么一位徒劳无获的人物的角色。我为他而感到遗憾，他本应发挥更完美、更出众的作用。如果我能经常见到他，我抱着很大的希望能说服他；因为我喜欢这孩子，我知道他也喜欢我。

晚饭后，高尔基来了。他显得极为亲热。他想把他收藏的一套中国象牙雕刻品和一只手柄雕花的手杖送给我，我没有接受他的礼物。像以往一样，在这离别的时刻，大家都很激动，反而要聊一些不痛不痒的话题。当我们就要离开高尔基的寓所时，我站在汽车前，始终看着高尔基的面容；他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他的眼神是多么悲伤，多么亲切。他绝对是个善良的人，可又是一位弱者；他在改变自己的秉性，他强忍住不去批评政界朋友们的错误。他的内心深处在经历着激烈的斗争，只不过无人知晓罢了。

高尔基家所有的人全都来为我们送行：有奥林匹娅达、舒拉等人。



高尔基欢送罗曼·罗兰夫妇(1935年7月21日,白俄罗斯车站)。

在火车站上,我见到两排列队整齐的仪仗队士兵。出于习惯,我又开始寻思：“可他们这是在等谁呢？”我迟疑了一会儿,才决意从他们面前通过,仪仗队后面是无数欢送的人群,他们手持鲜花,高声呼喊,向我致意。照相机镁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有人把我们带到客厅式的车厢中,车厢很快就被认识的^①和不认识的人挤满了,他们给我们带来各种礼物,有鲜花,还有鱼子酱。纺织厂的一位老女工送给玛莎一块漂亮的布料。透过车窗,我高声喊道:“再见!”成百个欢笑的嗓音重复着这个词。在人群当中,高尔基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人们为他闪开一条通道,一直通到车厢跟前。火车开动时,我的手依然紧握着他的手。

列文医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一位领导波希东诺夫将一直陪我们到苏联边界;克留契科夫将一直陪我们到华沙,把我们送上开往维也纳的火车。



7月22日 星期一

列车抵达明斯克,一大清早,一个由四五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登上车厢向我致意,他们是白俄罗斯作家协会的作家。到了苏联边界,摄影师、摄像师又是一通猛照,我站在车窗处,向大家道别。

在边界处,我看见了那座木制拱门,上面书写的标语已改过

^① 为我们送行的来访者中有布哈林,他先到高尔基家,后来又来到车站,登上车厢向我们道别。几天后他要到中亚去。他是一个极为冒失的人。人们能举出无数个有关他冒失举动的例子来:他曾在冰川上骑马飞奔,攀到陡峭的悬崖上去采摘稀有植物等。然而,据说他很怕死。我们亲热地道别。他对我那滚烫的双手感到不安,我要他多多保重。—原注

三次了。最早写的是：“苏维埃政权（或共产主义）是没有国界的。”后来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现在则只写着：“向西方的工人们致敬！”这真是共产主义“辩证法”的最佳实例。但诚实的卡申路过这里时还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以为他看到总是第二条标语，其实它早就不存在了。

我们与列文医生和波希东诺夫道别。只是克留契科夫还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到达波兰境内的第一个车站时，我对猛然换了环境而深感惊讶（比上次路过时的感受还要强烈）。车站小巧、洁白，花团锦簇，井然有序。行人穿的服装也更高雅。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又回到资产阶级的世界中。而边界的另一侧，决定服装基调的是工人，他衣着虽然干净，但远不是盛装，他们的服装很简朴，也很随意。

在路上，克留契科夫给我们讲述了发生在1930—1931年间的农民战争，其激烈程度不亚于1919—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假如境外的敌人善于利用那一时刻，那么局势会变得很严重。尤其是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及乌克兰地区局势更为严重。在乌克兰，农民摧毁了大批的小麦储备，甚至毁掉全年的收成；接着，当局就看着他们活活饿死。在高加索，农民们甚至去宰杀自己的牲畜。抵抗是那么凶猛、那么狂热。某个富裕的农民宁可看着自己的亲人饿死，也要把他的财产隐藏起来。人们在地里挖了许多大坑，将谷物理进去。这下招来许多老鼠，它们把这一地区的谷物都吃光了。现在农民被制服了，他们理解而且接受了集体农庄。但他们的本性很难改变，遭到制裁就收敛一些，可很快又旧态复发。有些富农家庭被赶出高加索，流放到北部的边远地区，但几年后，他们又成为新的富农，还得和他们解决新的争端。

贝洛斯托克沼泽地是如此广袤。那一大片土地似乎漂在水面上。

晚上9点30分左右,我们抵达华沙。在华沙的第一车站(普拉加车站),苏联驻波兰使馆的领事波德沃尔斯基、尼古拉耶夫以及“国际旅行社”的职员在迎接我们。他们建议我们在这里下车(我们照他们的建议做了),因为在华沙的大车站,波兰作家代表团和报界的人士在等我们,我们让他们空等了一场。

我们乘坐两辆汽车,跨越维斯瓦河上的两座大桥,在一条林阴路上行驶了5—6公里,来到“欧罗巴”饭店(饭店位于克拉柯夫外大街13号)。



7月23日 星期二

全天在华沙度过(和赴苏联时一样)。

上午,克留契科夫给我们讲述了高尔基继子的故事。他是下诺夫哥罗德城里的一个犹太人,名叫季诺维伊。高尔基收养了他,以帮助他事业有成,那还是在沙皇的统治时期;他是这孩子的教父,当然有权这么做(但沙皇极力反对。可这孩子还是用了彼什科夫这个姓氏,后来他一直用这个姓)。凭着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过人的胆识,继子独自一人跑到法国,在一次大战中参加了法军。在凡尔登战役中,他失去了一条胳膊,险些丢了性命。战争接近尾声时,他投身于法国反间谍组织。在国内战争期间,他成

了让奈将军的得力助手,与他亲哥哥斯维尔德洛夫所指挥的部队面对面地作战(他哥哥曾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战争结束后,他又去摩洛哥作战。他被授予荣誉勋章,现在是法国的将军,依然用彼什科夫这个姓。高尔基早已同他断绝了一切联系。他大概有四七八岁。高尔基的亲生子去年去世了,时年三十六七岁。

克留契科夫还谈到了革命家卡莫的故事,他的一生比著名的劳伦斯上校的还要坎坷。他是个文盲,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渴望冒险,在一次冒险经历中,不幸被俘,于是便在狱中装疯,一装就是好几年,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为此,他几乎真的疯了。他对克留契科夫说:“我腿疼,彼得·彼得洛维奇,您觉得怎么样?要是我往自己的脑袋上开一枪,会减轻我的痛苦吗?”他还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一个很公正的人,他要是对我说:‘从5楼上跳下去!’我肯定会跳下去;因为我知道,他既然这么对我说,那绝对是必要的。”还有一次,他请列宁允许他去暗杀普恩加莱^①。

波德沃尔斯基来拜访我们。他就目前波兰的局势给我们讲了许多精确而又有趣的细节。共产主义正沿着波苏边界扩散开来,最近,边界上的一个村庄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它很快便被

^① 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e, 1860—1934)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1913—1920)。1887年成为众议员。1893年起任教育部长、财政部长等职。1903年进入参议院。1912年1月—1913年1月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当选为总统,积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20年总统任期届满后重返参议院。1922—1924年组成“国民联盟”政府,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26年7月再任总理兼财政部长,1929年因病辞职。

摧毁,焚烧了)现在共产主义已经扩散到许多地区,就要逼近波兰的中部了。农民都已破产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加在一起还不够交纳国家征收的赋税。即使那些生产手工艺品的村庄(像苏联的帕列赫村)也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波德沃尔斯基曾访问过这些村庄,说:“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在顿巴斯煤矿当矿工,我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但他们那儿的贫困真是无法形容,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么贫困……”一盒火柴要相当于一只鸡那么贵,全村只有一家人留着火种(一根灯捻浸在煤油里),其他人都到这家来取火种。政府每年要关闭上百所学校。当局竟然公开宣称:“没有教育,人们可以活下去。但没有军队人们就无法生存了。”还有一宗丑闻:华沙最主要的科学基金会已破落到一文不名的地步,不得不向苏联求援,指望苏联能慷慨解囊。这个基金会的头目是一个叫波托茨基的人,在沙俄时代,他是个大地主,后来来到波兰;他在苏联的全部财产都被剥夺了,也拿不到他的股金了,因为股金全被苏维埃没收了。这位苏联的敌人不得不头缠红丝带,来找波德沃尔斯基求情,恳求苏维埃政府将他的股金还给他。苏维埃政府羞辱了他一番,把股金还给了他。但波兰报界对此事却只字不提。波德沃尔斯基说波兰作家的个性不够强,他们私下交谈时什么都敢说,可一写到纸上却是另一副言辞。因此,他们在这儿并不受人尊重。在这儿,人们敬重的是将军和政府官员,作家和学者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应当指出,当波兰作家代表团昨天晚上在车站迎候我时,我写给斯大林的道别信在华沙尚无人知晓。苏联的报纸只是在深夜时分才送到这边来。波兰作家马上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整个华沙报界对我路过华沙一事只字不提。)

波德沃尔斯基要陪玛莎到商店里买东西,他和我们及克留契科夫共进早餐。他讲起他在日本逗留期间的见闻。百万富翁诺马出版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许多著作及《五年计划》等书。这些书卖出去几十万册。当局逮捕了购书者(一天之内,10名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被逮捕,罪名是他们在谈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但当局决不会去碰诺马,因为他是现制度的支柱之一。波德沃尔斯基问他为何要出版这类书时,他不加掩饰地答道:“因为这可是个赚钱的生意。您再给我弄些其他苏联书籍,让我出版吧!”至于说结果,诺马才不管呢。他挣一笔算一笔!作为外交使团成员,波德沃尔斯基有接近天皇的机会,可日本人却不敢抬眼看天皇。天皇接见他那一天,日本朋友都抓住他的手,怀着崇敬的心情注视着这手:“这只手可是触摸过天皇的手呀。”

我们用早餐时,巴比塞走进餐厅,身边跟着那位小巧的女秘书和一位年轻的波兰女子^①。他要去莫斯科。他从巴黎出发途经维也纳抵达这里:因为经过德国的路线很危险(最近这几天发生了若干起反犹太人的爆炸事件)。他的脸色特别好,我过去从未见他这么精神过:他已经把烟戒掉了。7月14日在巴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活动,他参加了那次活动,对此十分得意。波德沃尔斯基悄声对我说,有一次他开车带他出去,结果兜风的时候,巴比塞竟然挥舞着拳头,高呼起口号来;这让他十分难堪,也有损他那外交官的声誉,他再也不干这种事了。

^① 这位波兰女子是玛丽娅·沙桑,职业钢琴演奏家,她后来给我写了信,激动地回忆起我们碰面这天的情景。她说巴比塞对我们那天偶遇感到格外高兴,不厌其烦地讲述那天的情形。—原注

晚上,克留契科夫带我们开车去观光,在外面逛了一个半小时。又一次看到老的街区、犹太人聚集区、维斯瓦河另一岸的普拉加工人居住区。波德沃尔斯基说在波兰犹太人投票支持现政府,因为他们担心换一个新政府会更坏。但波兰半数的共产党员都是犹太人。他还谈起波兰的领导人,谈起贝克,这人很聪明,但总带着一派军人作风:他什么书也不读(甚至以此为荣),侦探小说和警匪小说除外。毕苏茨基一开口就是满嘴粗话,令人难以置信,他给下属作出了表率。他讲话时要是不带着粗鲁的俏皮话及粗野的下流话,就讲不出一句整话来。所有的军官都在效仿他;无论是午宴还是狂欢活动,他们把俄国旧军队的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摔酒杯和餐具,还同波西米亚女子纵酒欢乐。

与克留契科夫共进晚餐。他最终决意开口讲他自己的生话,露出一丝亲密的样子(他看起来似乎很冷酷,不开朗,但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十分善良,特别是他工作积极,办事准确,待人忠诚)。他是工程师(没有职称)的儿子,父亲在乌拉尔发现了白金矿藏;他本人也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后来,他感到厌倦了,便到大学里学习了法律。他刚刚结束考试,革命便爆发了。尤登尼奇似乎控制住局势那几天,他正好在列宁格勒。隐修院及其它博物馆的主管人来做他的工作,待尤登尼奇获取政权后,便把这些职位都瓜分掉,他把这帮人给撵走了,对他们说:“我要是把你们的诡计披露给布尔什维克党呢?”他和共产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可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被派往国外出差。有一段时间,他领导《书籍》出版社,这是苏联设在柏林的出版社。但他还是不想加入共产党,尽管他比党内的许多成员都更共产主义化。他说那样他会感到很受拘束,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也许他想保持与高尔基

的密切关系,假如党要他汇报工作,他和高尔基的关系可就不是他所能控制的了。“况且,”他说;“今天当一名共产党员也不再是什么荣耀的事。但如果明天战争爆发了(共产党员应奋战在第一线),我们定会赶赴前线。”第一次婚姻,他得了个儿子,但在20岁时去世了。第二次婚姻,他又得了个小男孩,现已四五岁了。

自1918年起,他就认识了高尔基。那时高尔基抱病在身,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没有任何自卫的能力。克留契科夫献身于高尔基,可以说他为高尔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所有写给高尔基的信函都要先经过他的手,再转交给高尔基。我想,克留契科夫会一丝不苟地阅读并筛选这些信函;但高尔基完全放权让他筛选,将那些似乎无用或令人恼火的信件扣下来也是有害的。与此同时,他还要筛选来访者。这样,大家对他的猜疑和仇恨就越聚越多。他对此心知肚明。他说在白军的报纸上,高尔基被描绘成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吃着燕麦糊,在他自己家里成了一个叫克留契科夫的囚徒,周围有一帮秘书都听这家伙的调遣,看谁不顺眼便把他打发到索洛夫卡集中营里去。

在搬进那座漂亮的乡间别墅之前,高尔基住在一座既狭窄又不方便的房子里,那房子位于树林深处。来访的政要们(斯大林等人)对他的住房状况极为气愤,要他搬到那座大别墅里。高尔基极不情愿地住了进去。来到那所别墅跟前,他说:“这儿应该办个学校或医院才好。”后来,来自苏联各地的代表团常在这儿聚会,这所房子也就不显得那么大了。克留契科夫担当起秘书的工作,起先这工作是由拉兑什尼柯夫承担的,他曾是高尔基的出版商,现任高尔基的第二秘书。克留契科夫与高尔基谈话时不作任何记录,因为他注意到高尔基不喜欢这样。“但是,”他补充道(也

许他带着一丝狡黠在对我说)：“我可以检查别人的记录。”

他谈起托尔斯泰的追随者时,语气里带着丝丝恶意,尤其是谈到切尔特科夫时更是如此,即使谈起天真爽直的比留科夫^①时,他也毫不客气(这让我对他这番话的信任度大打折扣)。

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比现任领导人还要冷酷。



7月24日 星期三

7点半时,列车启程离开华沙。克留契科夫、波德沃尔斯基和尼古拉耶夫一直把我们送到车厢里。车站站台上挤满了黑压压一群群犹太人,他们蓄着络腮胡子,身穿长礼服,你推我搡,挤来挤去;有跌跌撞撞要摔倒的,也有像兔子似的撒开腿奔跑的,他们漂在列车的踏板上,拼命往车厢里挤,列车员把他们推下去,他们就又挤上来,把整个车厢的过道都挤满了。他们挤上车就是为了向一位神圣的“长老”道别。到边界之前的每一站都是此番场景,还是那么多人挤来挤去。波德沃尔斯基告诉我们,离华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长老”宫,那真像一座地地道道的王宫,上百名仆人在里面服务。下次我们一定去拜访这些“长老”。

^① 比留科夫(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Бирюков, 1860—1931):俄国出版家,社会活动家。著有《列夫·托尔斯泰传》(1—4卷)。

与苏联的朋友们告别了。现在,他们那儿的消息将在几周内渐渐地消逝了。我将再也得不到有关苏联甚至有关无数人生活的消息了,仿佛在两个世界之间陡然矗立起一道高墙。

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广袤的金黄色的平原,到处都是麦田,一眼望不到边。

在就要结束欧洲之旅之际,我们又经历了维也纳的悼念气氛。当我们于晚上9点左右抵达维也纳时,家家户户(包括我们所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的客房)都闪烁着星星灯火,透过玻璃窗映射出来。明天是陶尔斐斯总理^①遇刺一周年纪念日。



7月25日 星期四

全天在维也纳休息。大街小巷上到处都是去参加悼念活动的队伍,大部分人都是小资产者,但也有为数众多的工人(是被迫来的,或许不是),簇拥在各企业的旗帜下。他们露出极为厌烦的神情,没有一点自豪感,紧锁着眉头。女人们则嬉笑着。几支空军中队从格拉宾上空飞掠而过,房屋的外墙上悬挂着大幅黑旗及各类规格的黑色旗帜。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

^① 陶尔斐斯:1932年任奥地利共和国总理,1934年7月25日被希特勒的追随者暗杀。



7月26日 星期五

早晨8点钟动身去苏黎世。苏联驻奥地利大使(他那样子倒像一位年轻的专区区长)及几名使馆工作人员前来车站为我们送行。“国际旅行社”依照莫斯科或华沙驻巴黎分社的指示已为我们办好了车票及行李托运事宜。穿越蒂罗尔时,天下起了雷雨。在布克车站,那几个愚蠢的海关工作人员在我们从莫斯科带回的物品里随便抽出几张照片和不值几个小钱的瓷瓶,要我们交纳关税。晚上10点半抵达苏黎世。在经过漫长的旅行之后,躺在“御衣”饭店那舒服的大床上真是一种享受。



7月27日 星期六

全天在苏黎世。休息。一大清早,海梅尔里医生便来看我,对苏联同行的处方作了调整。这么长时间内第一次与我妹妹通了电话。我们的行李已从莫斯科运抵苏黎世,几经辗转,行李未被打开过,我们到海关办理报关手续。



7月28日 星期日

下午1点30分动身去维尼涅夫。晚上6点30分左右回到自己的家中,天气热极了,已经一个月没有下雨了。我未感觉太累。身体出奇的好,让我自己都感到吃惊。

给高尔基和“尼娅”拍了报平安的电报。

从我们带回的文件中,挑出一摞写给我的信件,信寄自苏联各地,是《真理报》后来转交给我们的。这些信将在几周内让我们继续感受这次充满热情的旅程。

(8月25日星期日,完成日记的最后校阅)



莫斯科归来^①

在莫斯科一个月的旅程使我尚无权对苏联作出充分的评价。我只是坦诚地记下了自己的感受,正如我在前文所做的那样。这些感受依然历历在目,但我已留出必要的时间差及距离感,以便能在整体范围内一览无余地看到这些感受,现在就让我作一番综述吧!

首先,我应当指出:与其他外国旅行者相比,我在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优待。我得以接触到苏联的主要领导人,接触到苏维埃新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待我像朋友一样,推心置腹般地与我交谈。况且,我身边还有最优秀的译员,她无时无刻不在为我提供帮助,她就是我的妻子,正是仰仗着她,法俄两种语言的障碍几乎荡然无存,她聪慧灵敏,有多年在俄国生活过的经历,我很快便同当地的民众熟悉起来,而且也了解了许多事情。诚然,她的激情带有一定的偏见,但她坚决地倾向于革命。她对不公正现象极为敏感,曾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反对某些错误,反对制度给人带来的痛苦,同时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爱,又极力想去纠正

① 本文的部分章节发表于1935年十月期的《公社》杂志上。—原注

这类错误,看到她的这些举动,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还有,我并非未听到(虽只是只言片语,但我能解其意)有些人所吐露的隐情,他们从未得到制度的友善对待:他们的出身、社会地位、内在的气质都与这个制度格格不入,甚至暗地里与其相抵触。我观察苏联的视角还是相当客观的。

这次访苏归来最主要的感受就是体验到那富有青春活力、热情洋溢的强大力量;苏联人民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对自己的信念坚信不移,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信心,对自己的领导者更是无比信任;这种力量渗透到苏联千百万大众的心中,激起他们无穷的干劲。无论是幸福、庞大的人民的集会,如6月30日的庆典活动,还是我在高尔基家接待的工人或民间代表团时,他们不约而同向我所表达的各种情感,尤其是从全国各地寄给我的信件:分别来自工厂、集体农庄和红军部队,都印证了我的感受。将这种不约而同所表达的情感说成是官方下达的指令是荒谬的:每一封信表达的都是肺腑之言,而且极有个性,这是毋庸置疑的,读来令人感动不已。也许人们可以说,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分享着集体的狂热情绪,这种狂热情绪集信仰、欢乐、坚信真理、坚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从事的事业必定胜利之信念于一身。这就是历史上的那种“伟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里,人民掌管着自己的命运,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只需接受(认可)最终的胜利即可。未来决定着一切,但现实就摆在眼前,胜利的所有因素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这手还是要服从于头脑的:共产党和人民委员会就是这个头脑。这头脑坚强有力,而且结结实实地落在双肩上。和我谈过话的那些领导人不仅有顽强、灵活的才智,而且还有钢铁一般的意

志,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抱着坚定不移的信念^①。我似乎觉得,在他们那性情及行动的深层,有着对某种学说不可动摇的信仰,这种信仰囊括了人类的所有的问题,就像《圣经》可能会做(已经做了)的那样,但他们将认识集中在社会活动的轴心之上,不管他们因自豪感及权力所产生的个人情感占多大(合法的)比例(我在后文还会谈到这个话题)。正如大部分其他信仰一样,这个信仰有可能将许多人拖进来,假如它的真谛不是“辩证”的话,那么它总要去适应自然界不断发展的规律。这个信仰倒更像一种伟大的科学假设,在其腾飞发展的阶段,它所建立的系统符合经验的所有论据,并为试验开辟新的道路。这种“假设”在其上升阶段,有某种坚定的可靠性,相当灵活(就像新问世的信仰一样,非常有活力,对指路明星深信不疑,进而一直往前走),而且具有相当大的柔性,能够根据行动的需要来更改、调整相应的策略。这是与相对论相吻合的绝对真理,其伟大的规律依然在支配着当今人的思想(这个绝对真理就是马克思先于爱因斯坦四分之三世纪设想出的)。上述评论似乎脱离了我在这里谈论的话题,但在与莫斯科接触之后,我在试图将所获得的深刻感受记录下来的同时,又想竭力去认识我所遇见(或塑造)的人物之特性,认识他们思想脉络的特性。所有主要领导者的思想基础就是那牢固的信仰,及为该信仰而奋斗的坚定的意志,确信不管有没有他们,信仰一定会获得最终的胜利。即使在“个性”最突出、最醉心于胜利的人(将个人事业与信仰相同化融合在一起的人)当中,也能发现一种热切

^① 我这里尤其是指第一代领导人,即列宁的同代人及朋友。第一代领导人目前仍在执政。—原注

的无私奉献精神,与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的相比,这种精神有着本质的区别,比他们的不知要高贵多少倍。后者已堕落得极为自私,只梦想着古罗马式的辉煌。墨索里尼只为他自己的丰碑着想,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奋斗。今世只想着权力,以便能在死后竖一尊雕像。他不顾人民的死活,将其拖入灾难之中;他没有考虑继任者,仿佛他本人事业的未来对他根本就无所谓似的;他那可怕的自尊也许正在领受着一丝苦涩的安慰。他那阴险的威严以及他所追求的荣誉都是从强烈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之中派生出来的。

斯大林及其伟大的布尔什维克战友们则浑身洋溢着乐观主义,这是一种没有幻想、无所畏惧的乐观主义,因为全人类的未来会更加美好,更加灿烂辉煌,他们在为实现这一未来而奋斗;马克思的理论使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更足,而且给他们指明了人类发展的必然规律,他们以此来协调自己的步伐,用他们自己的行动来印证马克思的理论。物质的动力是不可改变的,而他们的宇宙观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或更确切地说,是朝此方向发展,它必然要逐步迈向公正及泛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物质动力与理想相结合的做法可谓是一种创举。他们自称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打定主意要去实现这一理想,而且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实现这个理想。但如果他们没有那理想的激情,尽管这激情隐藏在铠甲之下,他们将无法实现这个理想,那理想的激情有时是情绪化的,并带有乌托邦的色彩,是卢梭式的,我惊奇地发现很多人身上都有这种理想主义激情,确切地说,它往往出现在意想不到的人(雅戈达及其粗俗的同伙们)身上。

这正是推动行动的巨大力量。要把这力量传给其他人,传给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是马克思之命运所挑选的英雄人物,去完成命运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肯定可以做到这一步:要对各阶层人士进行教育,通过报纸、演讲、庆典及游行活动,每日、每时每刻、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不断激励大家参加集体劳动;在劳动者及其工作小组之间组织并展开劳动竞赛;建立劳动激励机制以激发劳动者的自豪感及干劲(授勋、悬挂劳动模范肖像、颁发英雄证书、在报上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他们要让全体人民信奉这一信仰,给他们培养出荣誉感和自觉自愿的牺牲精神。

但所取得的成果(在几百万人身上确实取得了成果)并非未付出代价,有些损害是很严重的。高尔基本人当着我的面也对滥用激励人民自豪感的手法感到惋惜,在工人们当中,自豪感已演变成虚荣,其实只需提倡责任感就足够了。况且,不仅工人或某工程的自豪感被抬得过高了,而且连苏联士兵的集体荣誉感也热过了头,甚至不惜去歪曲真相。所有来自国外的反应都被他们执拗地扣下来或乔装打扮过,其实这些反应有助于他们对苏联境外的世界状况作出准确的认识。我注意到他们所有的人都趋于过分地贬低其他国家人民那种生机勃勃的力量。即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他国家政府是他们的敌人,那么低估对方的活力也是不合理的。几百万善良的苏联劳动者坚定地相信,他们已得到的福利是他们亲手创造的;世界上其他地区是享受不到这些福利的(学校、卫生条件等)。苏联的年轻人没有机会拿他们后天获得的才智及思想意识与西方同龄人的来一番较量。假如有一天,这样的事奇迹般地发生了,那他们可要当心由此而引发的震动!

目前已是硕果累累了。苏维埃的领导班子已为自己创建了

一支庞大的劳动大军,他们体格强壮,遵守纪律,这是一支凭着对其任务、行动纲领和领导者的信任而形成的劳动大军。正如其中许多人对我描述的那样,是“对青春和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劳动大军”。因此,人们不必担心第一代伟大的革命者去世之后,这支部



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们(30年代中期)

队将会缺少将领。明天的领导者已崭露头角,我已发现几位领袖相的人物。这依然是比法西斯主义优越的地方,法西斯分子并未培养出继任者:他们将所有的一切一次性地全部烧毁了。苏维埃的建设计划规模庞大,为几代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战场;在苏联广阔的疆域内,自然资源几乎取之不尽,它孕育着美好的前景,激励着人们焕发出极大的热情;所有这一切对年轻的领导者都是一种鼓舞,要他们发挥出更大的热情;他们活跃在工地上,与工人打成一片,在实践这所严酷的学校内接受培训。这所学校培养出一

流的组织者,他们不仅掌握各种技术,而且对工人群众的思想现状了如指掌。他们正在学习指挥艺术^①,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不必担心防线会垮掉。

但这并非是事情的全部。这条防线还只是民众中的一批民众,是一支大部队,不论它的人数有多少,品质有多高;还需要一支像克伦威尔^②所指挥的“铁腰板部队”,以便在17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同时支撑着萎靡不振的民众,后者始终是民族中卑微的群体;在这17年中,他们经受了残酷的、持久的、令人疲惫不堪的苦难,而这苦难是社会战争(至今尚未结束)、其他国家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后者对他们抱着刻骨的仇恨,并对他们实行封锁。这就需要有一个被全民选中的政党来对千百万党外的民众实行无情的专政,这些民众或许比敌人还要危险,因为人们始终无法确定其数量及能量(我曾向布哈林询问过这些人的状况,他给我的答复虽然不失乐观,但却是含糊其辞)。专政依然在继续,尽管它正试图掩饰自己(它采取一切必要的手

^① 当局通常让他们在政治、经济技术领域的不同领导职位上作两三年的轮训,我对这种措施深为钦佩。—原注

^②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独立派领袖、英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缔造者。在1642—1648年两次内战中,先后统率“铁骑军”和新模范军战胜王党军队。1648年,清洗了国会中长老派的势力。1649年,在城市平民和自耕农的压力下,处死国王查理一世,5月宣布成立共和国。同时,残酷镇压平等派和掘地派的民主运动,于1649—1652年亲自率军远征爱尔兰,镇压民族起义、掠夺爱尔兰土地,期间于1650—1651年平定苏格兰王党的叛乱。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统治,12月自任“护国主”。为了向外扩张和争夺殖民地及海上霸权,曾对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取得胜利。恩格斯曾说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兼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于一身”。

段好让我看不到它) ;它也保证要缓和下来 ,去颁布更自由的新宪法。我无法责备这个专政(我倒是责备它在我面前总是遮遮掩掩的) ,因为危险依然存在。苦难的岁月尚未结束 :即使苦难一年少似一年 ,但在强迫实行节衣缩食的政策之下 ,瘦弱的奶牛照样十分瘦弱 ,莫斯科的物质生活(工资、食品、住房)依然十分困难 ;那么在列宁格勒或联盟的其他地方就更困难了。我想补充说明 ,人们距那场可怕的农民战争太近了 ,尚无法希望目前建立起的和平环境深得人心。拉狄克希望(以为有必要 ,而且颇有道理)再过几年 ,让农民明确相信当他们用鲜血保卫遭受威胁的联盟时 ,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 ,我毫不怀疑在城市里 ,遭受排挤的阶层以及破落的资产者 ,虽然在强迫之下变得悄然无息起来 ,但却掩饰不住其强烈的仇恨 ,我自己所作的一番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不论是被打倒的反对派(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 ,还是沙皇俄国的残渣余孽 ,或失望的资本家 ,都从未放弃要向已获胜的苏联报仇雪恨的念头。他们的仇恨变得更加疯狂 :希特勒分子、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及波兰不断地派杀手去暗杀共产党首脑。因此 ,“铁腰板部队”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也不能脱下铠甲。

不断举行军事阅兵 ,民众狂热地举着领导人的肖像参加庆典活动 ,歌颂领导人的颂词点缀着所有演讲的开场白及总的基调 ;无休止的监视 ,由此产生的猜疑为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烦恼 ,而监视者常常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施暴 ;待嫌疑人像罪犯一样 ,所有这些举动的缘由皆在于此。此外 ,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行为 ,如让孩子们承担本应由他们的父辈或阶层承担的猜疑 ,所有的职位都拒绝接纳他们 ,甚至就连为未来培养人才的学校也拒绝

接纳他们,因此而人为地制造出一个贱民阶层。应当公开承认这一切,应当对这些举措感到痛心,并设法去改变或取消这种政策。然而不管怎么说,人们还是理解的。这是“战争状态”,这是“戒严状态”。尽管布哈林对我采用这个词汇颇为不满,但我依然坚持要用这个词,因为这是事实——其实这也是在为我们的苏联共产党朋友们辩护,这是他们不愿承认的事实。这种流弊乃是局势所使然。

然而共产党的伟大军队在其将领的统率下,肩负着保卫国家的重任,他们不该形成有别于其他阶级的阶层;最严重的是,不该形成特权阶层,这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这并非局势所使然。这些精英应当成为民族的中坚;作为中坚,他们的责任就是要融于民族之中,与整个民族融为一体,去创建卓越的功勋。军队不应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或捞取金钱。从总体上看,当局会注意采取措施防止出现这种局面,或至少在涉及金钱方面,尽力避免发生此类事件。为党员制定的最高待遇不应高于非党员的优秀工作者。但千万可别上这种制度的当,因为要避开制度的束缚那真是易如反掌。党员虽然没有挣到更多的钱,但能享受到其它的福利待遇(住房、食品、交通工具等)这些福利就意味着舒适的生活条件,意味着特权,更不要说他们为自己及亲属获得好处所能施加的影响了。他们怎么会不利用自己的影响呢?有些人性格刚强,具有古罗马人的气质,如列宁、捷尔仁斯基(我相信斯大林能以他们为榜样,虽然实际上他并未照他们的样子去做);有些人是服从于法律的仆人,他们拒绝接受超过公民平均值的物质好处(或许这正是伟人与失落者之间的区别),同这两类人相比,又有多少人对此有所顾忌呢?由于缺少享乐,又有多少人在公众面前

感到局促不安呢？这太“人道”了！况且，太富有俄罗斯色彩了！俄国人非常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要是他身上一文不名，他也就高兴了。但他手上哪怕只有一点钱，也得把它花费掉。波德沃尔斯基在华沙对我坦言道，他只要有钱^①，就禁不住要把它挥霍掉。像高尔基这么善良、这么慷慨的人居然也会在饭桌上浪费食物（其实他自己享用的真是太少了），而所浪费掉的食物能够养活多少家庭呀！不经意之中（其实他也享受不到，他倒乐于在伏尔加河上当搬运工！）他过着一种领主般的生活。我尚未领教过那些布尔什维克大人物的生活方式。应当相信，他们觉得他的生活方式很不错，因为他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得归功于这些大人物。诚然，他也应该过上这样的生活。这是他花了百倍的努力挣来的，同那些钱挣得容易、肆意挥霍的文人（如阿列克赛·托尔斯泰）相比，他能享受到那种生活条件是当之无愧的。我未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政界首脑、或冒昧地说在受首脑青睐的知识界中举出实例来，因为我没有机会到他们这一层去观察。但看到那些达官贵人（即使他们应当享受那些好处）的生活就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他们过着一种特权阶层的生活。与此同时，人民却依然为得到面包和环境（我是指住房）而艰苦地奋斗着，以确保革命的最终胜利。革命的首要目标是要为劳动者创立平等、形成大同的阶层。我相信，我写下的这些思考已刻在许多失落者的心中好久了。当我们的轿车在郊外从修建道路的农民和工人身边经过时，

^① 他说，当年他当矿工时就是这样。现在他当上了公使，旧习仍然未改。他承认苏联使馆的招待会总是比其他国家使馆的要奢侈；但他控制不住自己，他花钱似乎总也没够。——原注

我在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这种情绪。

最近(1935年8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马努伊尔斯基^①在其报告中指出,共产党人正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是过分地孤立于整个民族;二是未对自己实行严格的道德纪律约束。斯大林本人一贯善于在适当的时机采取必要的行动,他及时调整了方向,这正是人们所期待的。他在全党面前替那些“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争取他们应得的功绩和权利,以此来巩固党和人民之间业已变得生疏的关系,若再不采取措施,那么这种关系将会变得十分危险。马努伊尔斯基强调了这一点,并补充道:“共产党人作为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给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②他要求共产党员履行其思想及道德义务,这样才能证明他们所享有的权利是合理的。

“为了在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中树立威信,共产党员应该表现出对社会主义事业无比忠诚,表现出他们受过良好的理论及政治教育,表现出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要多于党外及同情党的人士……无产阶级民主的扩展无疑是对党脱离群众的现象、对官僚主义及等级观念的沉重打击^③。不论在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日常生活里,或在所有与其相关的事务中,假如共产党人不能以身作则、去克

① 马努伊尔斯基(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 1883—1959):苏联人, 1928 - 1943 年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② 尽管大部分民众最近才喜欢读书、思考,他们对此已颇为满足了,因此给那些享有特权的作家很高的荣誉,也认可作家所享有的特权,但这些作家却对自己的特权依然不满足。—原注

③ 这里人们不难看出,共产党的领导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出党所面临的危险,我也曾指出过这种危险——“脱离群众,等级观念”等。—原注

服或正设法克服资本主义的残余,那么他就无法为清除存在于人们意识之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去带领群众进行斗争。这是共产党员当前的首要任务。这就是我们党为何要在道德及政治信念方面对党员提出这么严格的要求。这不是在推崇禁欲主义,而是一场树立社会主义新人的斗争,要求他摆脱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带来的陋习……”

这番话的基调不禁让人想起罗伯斯庇尔^①当年的警言,我觉得这些话肯定是斯大林或党的领导层授意写的(马努伊尔斯基不过是个“报告宣读者”),它恰恰表明当前所面临的危险,而且要同这危险作斗争。但光靠这番辞藻就能摆脱危险吗?我表示怀疑:在一个享有特权的党的核心,这是一种必然的倾向,它一旦获得统治地位,而且敌人的威胁一旦削弱之后就更是如此。但即使领导人所要求的高尚的道德规范建立起来了,难道共产党就不会立于整个民族之上了吗?据我推测,它将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已经给很高一层的人物谋取了特权。不经意之中,正悄然形成某种共产党贵族,它是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诚的技术人员、各类

^① 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Marie Isidore de Robespierre, 1758—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早年任律师。崇拜卢梭,深受其思想的影响。大革命初期为制宪议会代表和雅各宾俱乐部会员。1792年8月10日起义后,被选入巴黎公社和国民公会,领导雅各宾派反对吉伦特派的统治,主张处死国王路易十六。1793年5月31日起义和6月2日起义后,成为雅各宾专政的首脑。执政期间,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平定反革命叛乱,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将法国大革命推向高潮。但反对无偿平分土地,先后镇压忿激派、艾贝尔派。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时被捕,次日被处死。

突击手、工人大军中的精英、集体农庄的社员及士兵们所组成^①。即使真的出现了这种局面,我也不会高声疾呼革命业已失败。我从未想过,革命可以一下子实现人类的平等、迈入无阶级的社会。每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当然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将会停止进步)都是迈向伟大理想进程中一个获胜的阶段。苏维埃革命将是人类社会迈向这一目的的最强有力的一步。它能获得这个荣誉已经十分了不起了。在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革命大军的领导班子都得到更新和扩大。1789年是第三等级,今天则是第四等级:那就是工人民众中的中枢。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这就足够了。况且,不管今后的时期有多长,总得有一个中枢来控制人类这个庞大的躯体。

我对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并不感到过分的担心,至少在一到两代人,严格地说在三代人期间不会发生这种意外,只要十月革命的战士,伟大的布尔什维克那史诗般的荣誉感还依然保留在人们心中,这种荣誉感所唤起的责任就能得到履行。

我对苏维埃民族主义的发展更不会感到担心。尽管在苏联民众中,苏维埃的自豪感始终处于过热的状态,但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抱着浓厚的国际主义情感^②,我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我所收到的天真的信件已不止一次地表明其为之感到自豪的动机:所

① 在这里我不想再用浓墨去描述形成奇特的新“贵族”的局面,譬如我记在日记里的“高贵的舒尔金一家”。这不过是颁奖性的称谓而已。但这种荣誉,哪怕只是口头上的,也是一种不良的前兆。—原注

② 斯大林的理智比托洛茨基的要稳重得多,而且更合乎民众的情理;他善于在共产国际中表达对自己国家公正、合情合理的爱意。—原注

有的苏联公民不仅在为祖国的利益和荣誉而工作,而且在为地球上所有人的幸福着想,并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我前面已引述过一段马努伊尔斯基的报告,他在那份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个义务:

“对群众进行新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与我们的宣传密不可分的,我们要向人民宣传国际主义团结的义务,要培养他们这方面的觉悟,我们党及苏维埃各共和国的劳动者始终将对世界无产者应尽的义务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尤其是目前世界正处在第二轮战争与革命的前夜,此时此刻,列宁提出的‘谁将获胜’的问题再次提到国际舞台上来。”

这项义务所焕发的激昂的觉悟,会引发当今世界上遭受压迫的兄弟们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的战争,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所发生的战争一样,但战争却被督政府及拿破仑分子们利用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行动中,所有的举动都是危险的,而不积极行动才是最大的危险。显然,不仅现在,而且将来都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每日的辛苦及烦恼已经够多的了!当前,我可以证实,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普通老百姓,谁也不愿意发生战争,恰恰相反,他们那不可动摇的意愿就是阻止战争。和平对于苏联实现其伟大的事业太有必要了,苏联真正的任务就是要给全世界、并在这世界之上建立丰碑型的社会主义伟业。人们指望着能从榜样中看到胜利,而非依靠武器来获取胜利。而树立这么个榜样,苏联还得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将其胜利展现在世人面前呀!苏联现在就像一座庞大的工地,它需要全体苏联人民在20或40年内作出艰苦的努力。这仿佛是另一个需要开拓的美洲大陆,但它的幅员更辽阔,资源更丰富。开拓这个大陆得让苏联领导人及其

民众在至少半个世纪内去思考、去奋斗。当前,世界已变得疯狂了,它没有方向,没有目的,随时准备冒险蛮干,面对这样一个世界,苏联却像一座巨大的蜂房,无数只蜜蜂在采蜜,其繁忙景象令人欣慰不已。

我相信苏联绝对不会发动进攻。除非他是糊涂虫,或是瞎折腾的人,像贫嘴拉狄克那样,否则他不会冒失地侈谈什么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至于说防御,那他们可一直在“严阵以待”呀!谁要首先发动进攻可得小心点!侵略只会让整个民族达到空前的团结。我在高尔基家见到的那个弱小的女跳伞手,她谈到自己可作为肉体炸弹投在敌人头上,那语气充满了欢愉的激情!根本不需要向志愿者发布号召令,他们会纷纷涌过来。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红军并不是一个军营,而是人民之家,在这里人民能认识到他的个性,并为此而感到高兴、感到自豪,同时满怀着感激之情,因为革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得到如此激情的防御。

混淆防御战争与侵略战争的界限(政治家在有意无意地这样做)依然是我们通常所能见到的危险。1914年的战例已向我们表明,人民无法划清两者之间的界限。今天发动进攻的人将来总会说他是在防御(当墨索里尼率兵扑向埃塞俄比亚时^①,不就这么说过吗?)。人们不难想像,在某种情况下,一位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可以将一场预防性战争转变成防御战争。假如有证据证明希特勒想在明天一举摧毁苏联,谁又能保证苏联在预先得到警告的情

^① 当墨索里尼率兵扑向埃塞俄比亚时:指1935年10月3日凌晨,意大利军队未经宣战从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出动,分北、东、南三路侵入埃塞俄比亚的事件。

况下,不在今天向他发动战争呢?

我完全能想像得出法国舆论的担心,他们对法苏两国之间最近签署的条约深感不安,对法国应对苏联承担的义务也感到格外担心。但出于畏惧而把自己封闭在“壮丽的孤独境地”之中也同样十分危险,除非愚昧地听信希特勒的允诺,像我们的某些朋友所做的那样(他们是盲目的和平主义者,如米歇尔和让娜·亚历山大及他们所创办的《自由言论》杂志)。

在欧洲当前的局势下,我认为签定法苏互助条约是十分必要的。在我与斯大林谈话之后,当斯大林认可法国民族主义时,有人称他放弃(如果不说背弃)了共产主义原则,因此在法国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同情者当中引发了极大的混乱,我承认并不理解这种混乱局面。我认为斯大林的政策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忠实于列宁的传统的。这项政策根据现时的必要性分阶段来实施。当前的任务就是反对法西斯主义,因为这是最紧迫的。明天将要去反对资本主义及所谓的自由化的民主。这项政策对此毫不隐瞒。如果德国进攻法国的话,苏联随时准备援助法兰西共和国;苏联也希望在它自己遭到攻击时也能得到法国的援助。规则是光明正大的,想输还是想赢就取决于法国了。我认为法国越是不热心,就会输得越惨,但如果苏联获胜的话,资本主义民主就会惨遭失败。我倒真的期盼着出现这种局面^①。

在揭露了“沙文主义”并将其列为“法西斯思想意识最危险的形式”之后,代表大会向广大群众阐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过

^① 共产国际针对民族主义所采取的现立场,是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8月20日通过的最终决议所制定的。其中能明显感到斯大林的影响。—原注

是一副面具,以便于在保卫整个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推行有利于本阶级的自私的政策,它将导致“一种压迫和剥削本民族的政策,正如掠夺与奴役其他民族的政策一样”。“工人阶级始终在反抗各种形式的奴隶制及各种民族压迫;工人阶级是争取民族自由与民族独立的惟一的、也是真正的杰出人物”,代表大会以工人阶级的这种态度来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相对抗……代表大会还提醒人们,在涉及民族独立,涉及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的问题上不得采取轻蔑的态度,这种态度会纵容法西斯沙文主义运动泛滥成灾(在萨尔^①,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人聚集区发生的事令人触目惊心^②)……作为对手,共产党人在原则上决不向任何形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妥协,也不会成为民族虚无主义的支持者,更不会支持对本民族的命运采取轻蔑的态度。

共产党采取这种态度大概也是最近灾难性经历所使然,法西

① 萨尔是法德边境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一个小区,以萨尔煤矿闻名。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德国占领。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应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所有权和开采权让予法国,萨尔区的行政管理由国联负责,为期15年,期满后举行公民投票来决定该区的归属。希特勒上台后,为了使萨尔再回到德国手中,暗中资助当地“德意志阵线”从1934年起积极开展活动。结果,在投票决议时,参加投票的53.9万人中有47.7万人赞成并入德国,4.6万人主张仍由国联监督管理,赞成并入法国的只有2万人。于是国联决议:自1935年3月1日起,萨尔区交由德国。萨尔投票的结果使德国法西斯受到鼓舞,从此不断向其他国家提出领土要求并且走上扩军备战的道路。

② 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初约有350万日耳曼人居住在西北边境的苏台德区。希特勒上台后为了吞并苏台德并进而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极力煽动苏台德日耳曼人党(纳粹党)策划苏台德“自治”。在法西斯德国的鼓动下,日耳曼人党在苏台德地区不断制造血腥事件。终于在1938年9月,德国通过《慕尼黑协定》占领该地区。

斯主义利用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反对共产党。这种态度倒适合于领导者的脾气秉性,比如像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与托洛茨基相比,他同自己那极有特色的民族接触得更密切。因此,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模式,而且最终还是找到了这种模式:能够既满足各民族团体的合法需要,又满足国际大团体至高无上的权利。这样,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那丰富多彩的精神及艺术活力不但得到了巩固,而且得以发扬光大。从前任何一个政权都未能使其得到这么大的发展。

读者们会原谅我这篇随笔凝重、粗糙的风格,原谅那些使用插入语的语句。自从巴比塞去世后,我的写作常常被打断,尤其是最后15—20页。人们简直无法想像我生活中的忙碌情形,大量的义务和请求纷至沓来:书信,电报,来访,请求回电或回函等。甚至有时一天连五六行字都写不了,一句话刚写到半截便被迫停下来。我又怎么能保证思路的连贯性,确保要表达的每句话都准确无误呢?

人物肖像^①

在这里,我想清楚地描述我对某些人物性格的感受,为那几位头面人物勾勒出一幅精神上的肖像,我曾有机会去接近并观察这几位大人物,如斯大林、高尔基、雅戈达。诚然,我以为已完全了解了他们的脾气秉性,我们当然无法知道每个人是否了解自己,但我会竭力把我认为已解读的东西叙述出来。

* * *

在我眼中,斯大林时时表现出的
一副镇定自若的气势:既有力量,又
不失机敏,既能控制自我,又能控制局势。有时在激情的冲动之下,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把握不住局势,这极有可能,因为他自己也承认如此;在最近的局势下(基洛夫被暗杀),他被情感冲昏



斯大林

① 本文标题与前文一样均为编者所加。

了头脑,置合情合理的政治利益蒙受损害于不顾。但他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就十分了不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在既满足自己的激情,又效力于国家的同时,即使他有些昏了头,但也未逾越他应该采取对策的界限,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一个例子表明他多么善于控制自己的性情。他非常爱他的妻子,所有的人都这么说,情深意笃的爱决定着他们的结合是坚实的、幸福的。去年,他妻子突然神秘地去世了,在莫斯科有人悄悄地向我们披露了实情。莉吉娅(她是共产党员)告诉玛莎,说斯大林的妻子对一批乌克兰的谋反分子被判处死刑深感震惊,大概她很信任这些人;而且,据说人们强迫她去参加对这些人的审判,因此她服毒自杀了。对于这场悲剧,高尔基没有向我透露任何细节,只是淡淡地说,这对斯大林来说犹如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这样一场灾难,但斯大林的脸上却未露出一丝痕迹(但与他过去几年所拍摄的肖像相比,他显得衰老了):他的举止依然十分快乐,他还可以同伏罗希洛夫一起谈笑风生,像个大小孩儿似的。涉及他本人的话题时,他将其珍藏在自己的心底里;当话题既涉及他本人,又涉及国家时,他便讲出来,但并不提自己的名字,仿佛在说另一个人。这样,当他在我们面前暗示有人试图暗杀一位国家领导人,而刺客就是他所雇用的图书管理员;要是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从未想过这是在说他自己。他的微笑富有传奇色彩,微笑的模样在张张照片上都没有变化,然而却不显得那么僵硬。人们很难理解他的笑意:那微笑与其说是一种表达方式,毋宁说是某种表露平衡的状态,他的思想似乎处于休眠的状态,但却让人看不出来;在他那身铠甲上恐怕连个接缝都找不到。他的那脸微笑可视不同处境作出调整,那要看是友好会谈,还是在讥讽他人,或是针锋相对的

斗争。人们有时在他的笑意中看到狡黠,而我却没有发现这一点。他的聪明才智始终处于活跃的状态,即使他看着自己手中的笔记,也丝毫未放松对你的观察;他不喜欢转弯抹角,他会沿着自己的思路走下去,既坚定又审慎,既坦诚又有些凝重,但总是准确的,他讲话时决不会兜圈子;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决不是他的习惯;直言不讳,免去繁缛的客套就是他的外交手段;他虽然严厉,但却通情达理,在必要的情况下,也会变得十分谦恭,但这番谦恭不会持续得很久;他喜欢直截了当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不时佐以粗犷的语气和挖苦人的话语,惟有这时他才进入自然的正常状态。我觉得他的性格是集通情达理、果敢、谨慎、有意志、镇定自若于一身而形成的。至于他的勇气,那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样的人身上,勇气肯定会少不了,勇气与他结伴而行。他对我所说的一切似乎没有任何虚情假意,我对此毫不怀疑。他并不害怕把他所想的全说出来(至少对那个他知道抱着某种意图的人),决不设法掩盖或隐瞒自己的想法(比如像雅戈达所做的那样),这是需要勇气的。他更不会害怕去说(这才是最难的)“我可能搞错了”。他并不试图人为地去作出安排,让事情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总是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具体事件,在其发生之前,发生过程中,及事后都去观察和研究。虽然坚持不懈的观察依然难免犯错误或产生疑问,但最为难得的是,他的观察决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延迟或削弱他采取决策及行动的魄力。他附带地对我说,在任何时候,即使当局势处于危急时刻,他都不会中断自己的行动。“因此,”他补充道;“当年莫斯科陷入敌人的包围时,敌军只需几个小时即可攻克该城(已抵达斯摩棱斯克),这时,我们依然在为建设未来的新世界而工作。必然要实现的东西总有一天会实现

(我们对此了解得很清楚)。那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因此必须为实现这个目标而持续不断地奋斗。”他有幸经历了整个革命的全过程,从本世纪初从事恐怖(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行动,直到革命建立起国家的最高秩序。更为幸运的是,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他都参与了创立国家秩序的伟业;人道主义及思想的普遍价值又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利,焕然一新的人类社会,精力充沛、充满活力的新阶层、新阶级也使那权利得以提高和更新。他有足够的智慧(总是在恰当的时刻作出周密的判断),在伟大的转折时机,亲自采取必要的决策;他呼吁尊重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相对于机器及机械领域的优势;将党的观念、等级观念扩大为群众观念,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将苏联建设成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他为人民、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纪元可谓是历史上的典范。这样一个丰富的时代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为他赢得新世界“奥古斯都”的美誉,他象征着胜利的新秩序。

“奥古斯都”一直在遭受着打击和诋毁,有些人对他恨之入骨,这些打击和诋毁不仅来自党外的敌人,而且还来自党内“安东尼—托洛茨基”的战友,或来自“恺撒—列宁”的捍卫者(我当然不是在拿性格作比较,远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由兴致所使然,在拿局势作比较。)这是两个时代的冲突。他们根本就不明白,时代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帝国”时代已经到来。这是一个获胜的理性时代,他正在各军团的簇拥下努力从事建设。

难道是6月30日那场古罗马式的盛典让我想起这出乎意料的对比吗?那次庆典在我的思想上诱发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而

我却不知该如何解决。斯大林在其言谈举止中始终是一个纯朴、粗犷的人，根本不愿接受别人对他的恭维。在苏联，他整个被笼罩在浓重的阿谀奉承的氛围里，他又怎么能容忍这种氛围呢？当我最后一次和高尔基谈话时，我不知当时他是否就是在说斯大林：一些作家向某些政治家大献殷勤，不择手段地利用他们，其手法令人恶心，他对此不禁表露出鄙夷和愤慨。我认为他大概就是在说斯大林。只需打开任何一份苏联报纸，读一读在共产国际会议上的任何一篇讲话稿（任何一个政治的、非政治的集会；任何一种文化、医学、体育、艺术会议等），人们总能在那篇篇讲话稿中发现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辞：“我们伟大的、至高无上的同志，我们英勇的领袖，我们战无不胜的英雄……”这是每首颂歌中必唱的一段。无论在街头，还是在群众游行的队列中，斯大林的画像大得像一座房子，十几幅巨幅画像排成纵列，放在人群的肩头上，从斯大林面前列队而过……实际上，他总不会同那些扛着偶像的人群一起欢呼吧。有人对我说（我似乎也看到了）他那样子有点窘迫。从这种局面出现到现在，大概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大脑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假如这真的让他感到不愉快，他完全可以发表一次讲话，以嘲笑这种个人崇拜风气的口吻来排斥它；几百万追随者就会在瞬间和他的想法一样。让民众对他的形象产生着迷心理，以此来维持民众对他的忠诚，难道这就是人们所声称的必要手段吗？对一名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而言，这种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它只适合于在国民中维持灾难性的个人崇拜，我真的感到茫然。但（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从事奇特的心理分析提供了素材。人们不禁想起了恺撒，安东尼曾两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将皇冠献给他，但每次恺撒都作出拒绝的手势，而每次

罗马的平民们都天真地高声欢呼,根本不顾恺撒是否处在痲痹病的“煎熬之中”。只不过,恺撒当时可不该昏死过去。因为全体民众都像安东尼一样愿把那顶皇冠献给他。恺撒以为必须要拒绝这顶皇冠。他完全可以毫不后悔地去拒绝,因为不管怎么说,皇冠所代表的权力都掌握在他手里。我真的佩服那些声称自己一无所有的人,他们说任何东西都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没有别墅,而他们正是国家的主人。

我把这个费解之谜提出来。假如未来不能以实际行动给予解答,我真的不知历史是否能提供答案:得意地生活在颂扬之中的主子,嘴上却说:“我可不喜欢别人的奉承。”谁又能知道他心中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们不妨用马萨林^①当年的说法去想像,他对巴黎人说:“咳,只要他们交钱,他们爱唱(嘲笑)什么就唱(嘲笑)什么!”而现实的格鲁吉亚人却在想:“只要他们照我的意愿做,他们爱怎么恭维就怎么恭维!”(实际上,最终人们便对那些恭维习以为常了,也就高枕无忧了!)

注:我刚看完巴比塞写的一本有关斯大林的书。书的前几章细腻地刻画出斯大林的人物肖像,描绘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所。人们注意到,他在少年时代,个子又矮,又瘦弱,1900年(他21岁),当叶努基泽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肩膀很窄”。1903年前后,他甚至染上了肺结核病,在流放期间,正是西伯利亚寒冷的

^① 马萨林(Jules Mazarin, 1602—1661)红衣主教、法国首相。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1635—1636年任驻法国宫廷的教廷公使,并加入法国籍。1641年被任命为红衣主教。1643年起出任法国首相,因国王路易十四年幼,他成为法国的实际统治者。他对内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与英国缔结军事同盟,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

冬天将他的病治愈了。

* * *

高尔基的形象与斯大林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俩在社会生活及活动中关系极为密切,这也似一个难解之谜,但对于揭破这个谜底,我大概不会犹豫不决。高尔基曾义无反顾全身心地投入到苏维埃革命之中,在经历过种种挣扎、失望及反抗之后(他写于12年前的书信仿佛让我仍能听到那声声回响),他完全拥护斯大林列宁主义的理想和事业,他将自己的激情和乐观主义精神都奉献给这个事业,与投身于伟大的建设计划中的建设者们热情融合在一起。但我不知道这种融合在一起的激情是否掩盖了人们心底里的哀歌。我深信,他在心中埋藏着深深的痛苦,他的爱子最近英年早逝并非是惟一的原因。痛苦悲愤之情是他所有作品的背景。他真正的本性是悲观的,自幼年时代起,他便饱受了种种苦难,目睹了人类的丑恶,迫使他变得悲观起来。为了摆脱这种悲观的情绪,他仰仗着活力和健壮的体格而选择了流浪之路,他始终想逃离这个世界,摆脱他自己,尽管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流浪,但却没有任何结果。大概这样反而使他在精神上变得极为敏感,只要稍微遇到一点打击,他便会泪流满面;他处于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之中,这时,革命发现了他。起初,他无法容忍这种革命。革命那不可避免的残酷性使他深感震惊。在那个年代里见过他的人(如纳森等人)都觉得他的生命被摧毁了,他在啜泣中处于垂死的状态。列宁非常喜欢他,亲自将他置于远离战场、远离毁灭的地方。他跑到意大利呆了几年。意大利那不勒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可他在那儿无所事事,感觉一事无成;在他眼里,那不勒斯无异于一剂麻醉药,一个吸食鸦片的场所。到底是何种影

响将他渐渐地(不是一下子,他曾连续几次返回祖国)拉回到苏联呢?他的“秘书”克留契科夫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呢?这个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到底是哪一派的呢?他究竟代表着什么呢?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人们不可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他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在列宁去世后(几年以后,因为还需要时间),高尔基便渐渐地被俄国征服了,与遥远的墨索里尼统治下的地中海沿岸相比,新俄国更加灿烂辉煌,他不但得到启发,而且被新俄国给迷住了。当他回到祖国时,俄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再是饱受国内战争蹂躏的俄国了。它仿佛是法老的国度:人民一边歌唱着,一边建设着自己的金字塔(但在远古时代,人民在建造金字塔时或许也是边唱边建吧?恐怕人们永远也无法知道了)。极度敏感的高尔基激动得难以自制。他湮没在热心民众的欢呼声中,湮没在整个国家对他充满爱意的洪滔之中;政界的朋友簇拥着他,这些人都是斯大林政府里的政要;斯大林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对他充满了敬意,还深切地关怀着他。他在有生之年成了故乡的主保圣人,而且政府用他的名字来命名那座大城市;不经意中,他被提升到苏联文化部,任特别委员一职,庞杂的生活旋涡让他变得飘飘然起来,他过去一直向往这样的生活,这个典型的个人主义者便沉湎于这样的生活之中。人们似乎觉得,他为投身到整个国民大军之中,进而愿意放弃为之奋斗一生的痛苦的独立性,他对此感到欣慰不已。他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不再讨价还价,他成了工地上的监工,监督着工地,他要煽动工人的热情,或粗暴地对待他们。

其实,他并骗不了我:他那厌倦的笑意告诉我,那个老“无政府主义者”尚未死去;他依然怀念着过去那流浪的生活。况且这

也是事出有因：在他所投身的事业中，他本想看到更伟大、更美好、更人道的东西，他本不想看到，但确实看到这个事业中仍然有错误，仍然十分艰难，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这是所有革命的弊病）。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万分，他想摆脱这种视野，抬起理性的双眼，向那些将此情景强加在他头上的人高声讨饶。但他却枉费心机，因为他根本无法在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处抹去那忧郁的场景。他内心深处总是在经受着痛苦与悲观情绪的煎熬，尽管他刻意不让任何情感流露出来。因此，他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把时间都用来在两个阵营里周旋，或浮在自己的海面上。他说起话来兴致颇高，但却只聊些逸闻趣事。他还在写小说，但他不喜欢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他尽量不孤身一人独处，只是在和朋友及年轻人在一起时才感到幸福。他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时才会露出喜悦的神情，其实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尽管他那副样子像只老熊，有时也会突然大发脾气。他善良、热情、愿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即使他去附和复仇及仇恨的想法或行动，即使他本人也会参与这种行动，那也是出于软弱，因为他无法控制自己那混乱的怜悯之心。基于他那小团体对他的爱，基于他的秘书克留契科夫对他无限的忠诚，他把自己完全关在家里，任其秘书将他封闭起来。应当承认，虽然克留契科夫确实为他作了许多工作（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他对我们表现得极为殷勤），但这种封锁是极为可悲的。克留契科夫俨然成为高尔基与外界沟通的惟一使者，包括信件往来或来访（确切地说是拜访高尔基的请求），他将所有的外界的请求都拦截下来，惟有他能作出评判，哪些东西、哪些人可以到高尔基家来（另外，高尔基不懂任何一门外语，只能依赖于翻译）。在苏联逗留期间，我的某些信函及口信

很快就通过克留契科夫转达给斯大林、雅戈达,其速度之快令人惊愕不已;克留契科夫不合时宜地试图要我在送给雅戈达的照片上写下友好和奉承的题词(少不了被人拿去翻印);自从我拒绝题词并且离开莫斯科以后,他便赌气对我的信件,特别是对我写给斯大林的某些含具体、紧迫请求的信件一概不予回复,这一切令我不禁生疑,我认为他肯定同党中央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当然不会轻信白军报纸描述他时所说的那些蠢话(那是他亲口讲给我听的)。作为高尔基的朋友,他将自己的心血全部献给了高尔基,但他一直按自己的目的,按党中央的意图在支配着高尔基,我觉得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眼里,党中央的意图肯定是最好的。但他不让高尔基来判断这些意图到底对他本人是好是坏,这真令人感到恼火。根据克留契科夫对某些事务的评判,我认为他才疏智浅,总在贬低他人,而且带有宗派色彩,由他将高尔基看护起来那就更加令人感到恼火(尤其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我从未听他说过颂扬他人作品的话语。在接待作家时,他表现得一点都不好客,而高尔基,可能还有我却得承担这不好客的罪责)。他似乎总是在赌气,也许那是因为他一直扮演着费力不讨好的角色。克留契科夫大概花费了不少心血,试图将高尔基与其他同仁或读者隔绝开来。也就是像高尔基这样软弱的人才会屈从于这类保护性的控制,也许这会让他免去许多烦恼,但却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呢?老熊的鼻孔上被乖乖地穿上了铁环。

可怜的老熊,他赢得了那么多的荣誉与尊敬,实际上,他对这一切看得极淡,他宁愿摒弃这一切,再去过昔日那自由自在的流浪汉的生活。他心情无比沉重,满怀悲哀、怀旧和遗憾之情,他那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则变得更加麻木,陶醉在群众的热情与信任

之中,群众簇拥着他,拖动着他,其实倒应该由他去推动群众!我爱他,同情他。他非常孤独,人们几乎从来未见他独自一人离群索居!我似乎觉得,假如我们能独自相处(倘若没有语言障碍的话),他可能会紧紧地拥抱着我,长久默默地痛哭着。

(如果我写得不对,请他原谅。)

我在这里姑且不去谈论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他承担着繁重而又兴奋的工作,像一个总监似的(虽然没有实权,但他却有很强的能力),掌管着文学、科学、艺术、教育、出版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他既是这些领域的主持人,又是监察官。从未有任何作家被赋予过这么大的权力,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在所有大型庆典活动上,他都被安排在政府首脑们的身边。他是苏联数一数二的头面人物。这种地位和他肩负的职责左右着他的生活。社会活动家的角色在其日常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

* * *

我现在试图勾勒出第三个人物精神面貌上的轮廓,他远不如前两个人物那么显赫,但他身上的谜更为奇特,更难识破,他就是雅戈达,内务部人民委员,格勃乌前首领。既然我曾有机会同他碰过几次面,而且他明显地表露出奇异的愿望,想赢得我对他的好感,那我也就当仁不让地利用他这番好意。

我在前面的日记里已经描述了他的相貌。从外表上看,他十分机敏、温和、高雅。他在举止上的高雅与温和在高尔基及人民委员的小圈子里显得极为突出,因为这个小圈子的言谈举止及风

度都略显粗鲁和土气。在他那副长脸和尖尖的鼻子、在他的眼神和手势当中,有某种圣职及虚情假意的神态。这副神态同他所承担的职责相得益彰。看来他对此也感到极为高兴和自豪:在他的司法管辖内将罪犯们改造好,仿佛在洗礼盆中为他们洗心革面,然后再把改造成清白、纯洁的人奉还给社会。然而,这副神情却显得与他的警察身份极不协调,国家警察机构制造的恐怖也是有着充分理由的。反对派(特别是消极的反对派)私下谈起他时,都表现出难以抑制的仇恨和侮辱性的鄙夷之心(我碰到过这样的实例,而且我认为这些人决不会用那种辱骂性的讽刺及激烈的方式说那些话,即使他们只是在得意地“重复”着别人的话语)。雅戈达肯定对这些话有所耳闻,他对此也感到痛苦,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甚至对某些安全举措感到痛苦,因为他要为此承担责任,这也是有可能的。有些级别比他高的人物,如捷尔仁斯基,其良心也会感到痛苦,尤其是他们不得不(或起码以为应该)变得冷酷无情时更是如此,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从未想像过,他们是否曾试图否认那些举措,而且拿使徒彼得说他导师的话来搪塞,彼得曾这样说他的导师:“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们以罗马人的方式泰然自若地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从古代共和国这一层意义上说,雅戈达并不是罗马人,然而从圣彼得的自卫队这一层上看,他倒确称是个罗马人。他对你讲话时口气极为温和,目光极为率直,当你表示出疑问时,他马上露出十分惊讶的样子,他能把你所知不可能的事说成可能,把可能的事说成不可能(我记下了几个实例,参见109页及137页)。人们对此感到惊愕不已,不禁扪心自问:“难道我不辨是非了吗?”他那温和的态度、彬彬有礼的举止不过是一种表象,你根本别期望这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也别指

望靠说服能从他那儿获得你想要的东西。他什么都答应,但什么也不做。彼什科娃女士曾对我说:“即使和他商谈也得不到什么结果”。(我想,当他面对斯大林时,该是另外一副模样。斯大林从来不害怕与他人争论,在争论中寻求道理,即使这道理后来证明是他本人错了。)雅戈达对我极为尊重。他几乎要我确信塞尔什的手稿肯定会交到我手里,塞尔什本人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然而什么也未兑现。我甚至不知道无辜的勃洛克(《时代》出版社社长)是否已从流放地被召回原地,尽管雅戈达对我作出过正式的允诺^①。然而自从我离开苏联之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了(我这段文字写于9月23日)。此外,在所有的重大问题上,莫斯科对西方朋友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这真让人感到沮丧。实际上,针对种种担心和疑问,尤其是来自西方同情者的担心和疑问,人们能感觉到远方指挥者那漠然的态度,他们对自己所认定的事实坚信不疑。雅戈达集真诚与谎言,温和与固执,谦恭与无情于一身,你又怎么能既不偏颇、又不轻率,但却公正地评价这个人呢?(他身上的那些特性都得到了证实。)缺少了两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他的那些特性都不能在身上共存:挖空心思并刻意去玩弄权术;依赖幻觉的努力。我倾向于第二种推测:雅戈达的能力还不够大(甚至是在来世善与恶的范畴内),不敢正视自己;他对别人撒谎,

^① 记在1936年5月的日记里。我应当赔礼道歉。勃洛克已被派往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城市,他在那里生活得很愉快,工作也很积极。维克多·塞尔什已于1936年4月离开苏联前往比利时。是法国拖延了对他的释放,因为法国拒绝接受他回国。因此正像其他许多事情一样,我的疑虑是不准确的。雅戈达做事是光明磊落的。1935年9月,高尔基已让人告诉我对塞尔什的释放已经决定了。——原注

在欺骗别人的同时也在蒙骗他自己。他将自己的举止和话语裹在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棉絮里,他需要这两种理念的支持才能生存下去(一个斯大林式的人物完全可以摆脱这种理念:一种实践的理性就足够了)。人们总不能说,当他撒谎时,他为自己保留了一种特殊的待遇:他是对谎言抱有幻想的第一人,正如他对自己做过的恶事及善举均抱有幻想一样。诚然,在对刑事犯进行思想改造,对政治犯及犯罪嫌疑人采取不人道的措施时,他会犯下这样或那样的过错。难道这不正是各个时代里的某些圣职者(取其确切含义)之特性吗?当他们将你投到火堆中活活烧死时,那是他们真的爱你呀。雅戈达向我表示的爱意可真让我无法安心呀。

(假如我给这样一个人带来损害,那么我再次请大家原谅我;他肩负着繁重而又费力不讨好的职业!)一个勇于承担这种职责的人,一个对此任务尽职尽责,同时又兼有温和、机敏、仁慈秉性的人,又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呢?他当然要去利用自己身上的这些优势。没有任何事情能向我们证明诚实在潜意识中得不到补偿!这可不由我们来作评判。

* * *

在我见过的所有人当中,我还想为两个人物留出一席之地。

一位是布哈林,我们俩自从第一天见面起便相互产生了好感,我对他



布哈林

在篇文章中向我表达的充满爱意的热情极为感动。他才智敏锐、心胸开阔,富有洞察力;他身上总有一股青春之火,发出率直的火焰,不去爱他真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在所有最重要的政治家中,他是最出色的知识分子。我觉得他在思想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低贱意识,他不贪图虚荣,具有绝对的牺牲精神。但有时给人以无条理及不细致的仓促感。

另一位是卡冈诺维奇,我和他近距离接触得不多,不好贸然下评语(况且,谁又能去接近他呢?他是几位人民委员中最难接近的一位。要想弄清他心底的秘密,他头脑中的想法,那大概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但他的相貌以及有关他的传闻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他显得精力充沛,体格强壮,意志坚强。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他大概担负着最重要的工作:对铁路和交通运输系统进行全面的改造。他激励着全体劳动者。然而,他外表却显得很冷淡,几乎从来不露笑脸(在高尔基家的晚宴上,其他人高声喧闹,他却不苟言笑,形成鲜明的反差)。倘若他不是个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不是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友,我也许会想:“可要提防这位未来的对手!”但不管怎样,我认为他一定会成为未来的首领。

我不再试图去描述其他人。他们没有过多地引起我的注意。大家也许注意到自从我住进高尔基家后,阿罗塞夫的名字就从我的日记中消失了,因此而感到惊讶,他还是我来苏联的首个联系人呢。他一心要把我攥在他手里,但很不幸,他的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对此作出反应的不仅是我们:在对此事的评判上,几位人民委员也许比我们还严厉。显然,他们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让他离开我们。我认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7月初以后,他被派往国外:当局要他马上赶赴巴黎去谈判,为莫斯科马克思博物馆购买马克

思、恩格斯的文献资料,这批文献是德国侨民从希特勒要焚毁的文档中抢救出来的,而且成功地将其带出德国。我只是后来在高尔基家接待作家代表团时才与他匆匆见上一面。但他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时都给我写了信;他依然那么笨头笨脑的,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怨恨和苦恼。他告诉我,在苏联我大概能感觉到,两种不同的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一种是革命初期的布尔什维克,即第一代革命者;另一种是当今这一代布尔什维克。他要我告诉他到底喜欢哪一代,当然,他免不了预先向我暗示应当是第一代,那是一批伟大的人物,他也属于这一代。接着,他便利用我的答复去反对其他人。我没有给他回信;即使我真的回信了,我也不会给他们分类排序。因为在我眼里,第二代最优秀的革命者是第一代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如果后一代人在思想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它主要表现在人道主义方面得到了扩展,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应去适应不断变化的局势。

上述笔记我写得过于仓促,而且总是被其它事情打断,但我是用最大的诚意和真挚之心写就的。重读这篇笔记,我真担心有人会觉得写得太苛刻了,恐怕它会伤害待我像兄弟一样的人。我希望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希望读到这些文字的人会觉得我对他们尊重并且怀着深厚的爱意;与此同时,我把分析他们的个性看作是我的义务(我的分析可能是错的)。我不希望这些批评或意见没有如实地反映出我真实的想法。我最终所作的总结,无论对苏联,还是对斯大林的政策都是有好处的。不管是苏联,还是斯大林的政策,目前两者都有失败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况且谁都会出错(“人孰无过”)但功劳远远大于失误。世界最美好、最可靠的希望必将同苏联的胜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对此毫不怀疑。

我不止一次地苦苦思索着 ,从历史角度来看 ,写给他人的信件和留给自己的笔记其价值是相对的 ,而笔记有当时匆匆记下的 ,还有再经斟酌回忆续补的。不论哪种形式 ,都免不了会有缺陷和失误。但历史地利用各种形式的笔记还是颇有益处的 ,它们可以相互修正 ,相互补充。

我的《莫斯科日记》恰好是这样一个例子。

它是分两次写成的 :

第一次是我在莫斯科期间每天随笔记下来的(1935 年 6 月底—7 月底)。笔记写得很仓促 ,是用铅笔写的 ,记得也很不完整 :首先由于仓促、疲劳 ,再加上对某些事情感到极为困惑 ;其次 ,也是出于谨慎 ,因为我不知道这些随笔是否会被窥视者偷看 ,我不想 在笔记中透露什么秘密。

第二次是我在返回瑞士一个月之后(1935 年 8 月)完成的。我把笔记重新抄写了一遍 ,以平静的心态边抄边补充。我是用赤诚之心来完成这项工作的。我仿佛依然停留在那一个月的欢乐之中 ,种种场景历历在目 ,我并不试图去解释某些不解之谜 ,更不会去究其成因 ;也不试图将某些含混不清、疑惑重重的感受写下来 ,虽然他们待我热情友好 ,但我还是隐隐约约有一丝那种感受。

况且 ,我手中的灯笼极不明亮 ,有些事情我真的看不透。得把这些事件(是何种事件呀 !)一一映射出来 ,才能让我从悲惨的一方看清那些面孔和他们的意图 ,它们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而我却没有打开这些秘密的钥匙。

1935 年 6—7 月间 ,在血腥悲剧的前夜 ,在暗杀事件频频发生的前后 ,反对派正策划推翻国家领导人的阴谋 ,而后者也在阴暗处窥视着敌手。大家想一想 ,我和我夫人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来

到苏联的。偶然的机会有时就将我们置于阴谋的中心,主要的阴谋分子就隐藏在高尔基家中!(布哈林、雅戈达、若干名军官及知识分子自那时起被证实参与了阴谋活动,后均被枪决)阴谋分子所瞄准的那些人也常常到高尔基家来(斯大林及其战友)。在高尔基家别墅周围的桦树林里,相互窥视的敌手——斯大林、雅戈达及其他人——都有自己的别墅。我们在桦树林里,甚至在高尔基家的花园里散步时都能碰到设伏的警察,他们在那可不是充充样子;不知不觉中,似乎有一位警员总是在护卫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便跟到哪儿(或许他在监护着我,因为有人说暗杀总有可能发生,对这种荒谬的说法我付之一笑),他们应该了解一下,我在莫斯科也去过几次商店,但我未遇到任何可疑的人。

我们俩头脑简单,根本没有料到双方的明争暗斗会这么激烈。正是由于思想过于单纯,于是便不假思索,对反对派的重要思想首领说了一番惊人的话语。我刚到高尔基家时,布哈林要拉我到花园里单独谈一谈,照他的说法,是要解释一下政治局势(我现在反复思索,去揣摩他的想法,并依照他的打算设定我的方向),他刚说了几句话,我便打断他,问道:“同志,我想知道,目前苏联的反对派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势力到底有多大?”(然而,我一直只想着旧时的俄国,它既愚昧又野蛮;没想到高尔基的战友,这些新制度的忠诚卫士竟然不是斯大林的战友。但布哈林从另一角度来理解我的问题是有他的道理的,我看他露出很惊讶的样子)当我登上要驶离莫斯科的火车时,布哈林也前来向我道别,我一边和他拥抱,一边悄声对他说:“您可得谨慎点!”(他就要到帕米尔地区去旅行,而且他一贯都很鲁莽,显得极不谨慎,我当时只想到这一层)但听了我这番嘱咐,他也许心里一惊,琢磨着:“难

道他知道了？”

我们抵达莫斯科时，两股势力围绕着我展开了暗中的较量，他们都想控制我，将我拢在某一阵营之中，在斯大林的安排下，我和他进行了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谈，但此后，我却发现有些人对我变得极为谨慎、冷淡，几乎带着一丝敌意，我对此难以理解……特别是拉狄克的态度极不友好，冷嘲热讽、敌视我们（在此之前，他在报界一直对我十分热情友好），在高尔基家的晚宴上，他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真是出乎我所料：“同志，听说您想知道反对现制度的是些什么人？”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真让我茅塞顿开。我和布哈林的私下交谈很快便在密谋者的小圈子里传开了。他们到底会怎么想？我是否受斯大林的委托在打探消息呢？……

1936年拉狄克在诉讼陈述中说，就是在1935年的7月份，他与布哈林、彼亚塔科夫、索科尔尼科夫等人商定要采取恐怖手段，加紧进行恐怖活动，来反对斯大林及中央委员会。其实中央委员会对他们早有戒备。在尚未搜集到所有证据的情况下，它已经对阴谋有所察觉。最高首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面露微笑，摆出纯朴的样子以掩盖整个国家机器的忧虑，这部国家机器认为自己就是猎手，它正在寻迹追踪猎物（但它依然忧虑重重……）。

这就是斯大林为何阻止我发表与他会谈纪要的理由（然而，在这件事情上，他从未给我写过一个字），对我而言，现在一切都很清楚了，他对我谈起了基洛夫遇刺事件，那不过是种种阴谋和暗杀活动中的一个环节，两三年以来，苏联的犯罪分子们一直在从事这种暗杀活动。

在最近所披露的悲惨事件的启发下，我今天（1938年10月）又重读了我的《莫斯科日记》笔记，在字里行间中，发现有许多事

实与感受在当时都被忽略了,而没有记下来;有些是故意遗漏掉的,因为有些事记下来会投下解释不清的阴影,我对自己的疑虑也表示怀疑,况且当时我感受到某种不可名状的苦恼。

以下便是我写的补记。我把补记作为附件放在写于1935年的《莫斯科日记》正本的后面,标明的页码为本正的页码^①。

第10页(1935年6月22日)

刚一踏上苏联的国土,阿罗塞夫和克留契科夫争斗得十分激烈,令我们深感震惊。我们将其归咎于贪图虚荣的个人恩怨,在我们眼里,这种恩怨显得太幼稚了。但我们现在不禁琢磨着,那是否就是两个阵营之间的恩怨,双方都想把我们拢在各自的麾下。从那时起,我们便看出克留契科夫和高尔基家(我并不是说高尔基本人,他肯定对在他家中策划的事情一无所知)意味着什么。阿罗塞夫不过是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手中的工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这个工具已被个人的虚荣心弄得变了形(他的虚荣心既强烈又明显,而且他本人还笨头笨脑的:当局也许已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确切地说,这件工具到底属于那类性质呢?恐怕是秘密警察那类的工具。当我们抵达莫斯科时,特列吉亚科夫和蒂纳莫夫在站台上迎候我们,在得知我们要住进阿罗塞夫家时,他们俩那强烈的反应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把我拽到一旁,提醒我们:“你们可千万别住到阿罗塞夫家里去!我们这话可是当真的

……”

^① 每一段落前的页码为本版书页码。

(注:特列吉亚科夫此后被证实参与了阴谋活动,后被处决。)

况且,在陪我们旅行的这一路上,阿罗塞夫既饶舌,说话又不慎重,让我们觉得他与秘密警察的关系相当密切。他友好地(因为他觉得与我们的友谊的确很真挚,这也正是他吹嘘的资本)提醒我们,所有寄到苏联的信件都被打开过。

我们还注意到:克留契科夫给我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极为深刻。玛莎曾在1931年见过他,那时他十分快活,浑身充满了活力。可这次却发现他极为忧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寡言少语。我们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一直都显得很紧张。后来对他的诉讼揭穿了隐藏在他身后的骇人听闻的秘密,他参与了此前一年密谋暗杀高尔基儿子的行动。他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冷酷的面具,将真实面目掩盖起来。他的酒量惊人,即便俄国人能喝酒,他那酒量也是够吓人的。不止一个人对我说起他的酒量,而且对他喝了那么多酒之后居然不露痕迹而深感惊讶。他那是在借酒浇愁。可他却极为沉着,而且头脑十分清醒。

第16页(6月24日)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偶发事件(阿罗塞夫家极不方便)让我们在那天晚上逃离了他家,其实我们并未想到带有政治色彩的其它不便之处。但阿罗塞夫愚蠢的做法很快便让我们想到了这一层。

当他第二天知道我们离开的原因时,马上便露出恼怒的样子,恶狠狠地咒骂家中的女管家,这说明他完全知道他家中的不便之处(家有臭虫),他那副样子真是滑稽;他从华沙给家里拍了电报,要他们马上把臭虫都消灭掉。现在知道家里人并未完全将臭虫清除干净,他极为气愤,不禁高声喊道:“瞧我怎么跟她算

账！”

但他不会甘心失败,马上便开始寻找合适的时机。在大剧院看戏的那天晚上(6月25日),他被“大人物”叫走了,回来时,身边跟着斯大林的侍卫队长,一位身材魁梧、个子高大的小伙子,蓄着鬃发,脸庞很宽,满脸挂着微笑(玛莎说看见这人,不禁在脑中想像着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某个情人),阿罗塞夫想趁着黑夜马上带我们搬到斯大林的别墅里去住,这是斯大林提议要我们住到那里的,别墅就在距莫斯科几公里远的地方,我断然拒绝。在返回“萨沃依”饭店的路上,玛莎甚至感到担心,生怕他们悄悄地将我们带出莫斯科。

阿罗塞夫总是纠缠着玛莎,要她说服我接受斯大林的盛情邀请,搬到他的别墅里去住,玛莎多次以我绝对不会接受为由给予回绝,可她又实在躲不开阿罗塞夫三番五次的纠缠,要她至少去看看那座别墅,当时我对这一切都不知道。6月27日,星期四晚上,晚饭后,我已经上床就寝了,我以为玛莎到剧院看戏去了。她忐忑不安地要去看那座别墅,让莉吉娅·巴甫洛夫娜陪她一起去。她觉得那座别墅很漂亮,和高尔基的别墅风格一样,只是规模略小些,有一位军官住在那里。(我要去了,肯定被看出来了!)在车里,阿罗塞夫向我们历数这座别墅的种种好处,不厌其烦地要我们搬到那儿去:“哪怕只住一两天也行,别让斯大林同志生气。”他反复提醒我不要住到高尔基家里,但我坚持要住到高尔基家里,玛莎完全同意我的安排。阿罗塞夫也就只好接受失败了;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斯大林决不会原谅他(尤其不能原谅他将他本人也扯了进来,而且这事还没办成)。6月28日我和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矢口否认自己有别墅,否认曾想让我搬到那里去住,将

他的盛情邀请轻描淡写地说成是人民委员会的提议，人民委员会有几座别墅专门用来接待尊贵的客人，我明白他这是在否认阿罗塞夫的安排，尽管这种安排未能得以实现。但他真的对此一无所知，还是就是他在幕后指使阿罗塞夫作出安排的呢？我对此颇为疑惑不解。

我再回过来接着描述6月27日的事情，那天上午，在“萨沃依”饭店，普列特涅夫医生来访，他是莫斯科的著名人物，玛莎过去曾见过他，但这次却发现他仿佛变了一副模样：身体消瘦了，人变得神经兮兮的，总显得焦虑不安（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后来我们得知，他们都涉嫌参与了谋反活动）。我知道他对现制度没有任何好感，几年前，由于说话不当而险遭不测，要不是高尔基的干预，考虑到他是科学家、著名的医生，他免不了要被逮捕入狱。况且，我还知道他十分尊重我本人和我的作品，我也看出来他和某些人一样，期待着我到莫斯科来，好向我倾诉他们的想法。我到莫斯科已经四天了，一直在试着为自己导向，我应该极为谨慎，千万不能落入任何阵营之中，而且我还得保持局外观察者的独立性呢。普列特涅夫想试探我，非常含蓄地想和我套近乎，将他的批评意见说得极为隐晦，期待着我能鼓励他说下去，但我不想接着他的话题说，便故意沉默不语。这时，他感到有些不安，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但他拿当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相对比，我觉得真是既奇怪又荒唐（两个如此不同的民族，两种如此不同的文明竟是多么相像呀！）。自从我明白那时他已被迫成为波尔加（雅戈达）手中的工具，他那番话语让我恍然大悟！

他对我的担心，他要我马上离开苏联的愿望，要我拒绝去伏尔加河旅游的忠告，不正是受恐惧心理的驱使才道出的吗？他对

自己所了解的事情感到害怕,对他的主子、暗杀活动的组织者感到恐惧。

第30页(6月28日)

在与斯大林会谈时,他暗示在克里姆林宫发生过投毒未遂事件,表明他不会怪罪他的老朋友叶努基泽,后者负责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斯大林只不过责备他放松了警惕。他不知道(1936年的诉讼案披露出)叶努基泽是谋反的主要首领之一,或许是最主要的首领,他竭尽全力将自己的人都安插在克里姆林宫里,就是准备要去暗杀斯大林,然后为了欺骗人民,为其准备隆重的葬礼。当斯大林获悉他的背叛行为时,这对他在精神上是多么大的打击呀!

第52页(6月30日)

在红场上举行的青年人盛大的庆典活动上,斯大林看见了我,便招呼我和我夫人登上列宁墓,阿罗塞夫想随我们一起上去,这也是很正常的。但负责引导我们的军官却将他拦住了,这种伤害真是惨烈。这说明他在“大人物”那儿并不受宠,也得不到尊重。

第57页

我们在列宁墓纪念馆内准备休息半小时,吃点东西,这时,在那儿碰到了指挥官艾登曼,后来在高尔基家又见到了他。第二

年,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件^①中,他和其他六位将军一起被枪决了。他对我们极为冷淡,让我们深感震惊。(后来我们发现许多人对我们都很冷淡,而他们此后被证实参与了反斯大林的阴谋。)

第59页

在高尔基家餐桌的另一端,坐着拉兑什尼科夫,他过去曾是高尔基的出版商,现在大概为他做秘书,还有拉克茨基,一位神经兮兮的诗人,一个臆想自己总是生病的人。坐在大饭桌中间的是高尔基的两个孙女和爱沙尼亚籍女管家、保姆奥琳匹娅达,过去她曾是安德列耶娃夫人的侍女(高尔基曾同安德列耶娃夫人一起生活了好几年),后来她成了高尔基的护士。女孩子的家庭教师们一周总要来两三次,她们那样子看上去极不愉快,好像在和谁赌气似的。还有一位女画家,也是高尔基的朋友,曾为他转达过列宁的指令(!)她每隔半个月便到高尔基家来吃饭,我对她不甚了解,只知道她为在大剧院上演的歌剧《巴赫赫萨拉伊的喷泉》画过布景。她总摆出一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的样子,招人讨厌,见到我们显得极不愉快。

克留契科夫抱着一瓶法国干邑,将酒倒在大酒杯里,一声不响地闷头喝酒。他那阴郁的样子,他的沉默寡言令我们感到十分惊奇(高尔基对此怎么会不觉得吃惊呢?)然而,烈酒并未搅乱他那清醒的意识。他日常所担负的所有工作(他每天都要到莫斯科

^①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案件 苏联大清洗运动中的一宗冤假错案。1937年5月,苏联政府宣布红军元帅、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和基辅军区司令雅基尔、白俄罗斯军区司令乌鲍列维奇等高级将领组织反苏军事中心、充当德国间谍,旋即对他们实施逮捕并处死。

去 转送或接受各种指令及信件)都会完成得十分出色。每件事只需告诉他一次,此后他再也不会忘记。但他那固执的大脑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玛莎曾试图去了解他,拿一些问题来逗他开心:“您最喜欢什么?”“是看戏吗?”“我从来不去剧院。”“那么喜欢读书吗?”“我什么也不读。”等等。他那娇小的妻子悄声对玛莎说:“他只喜欢一件事,那就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他正在慢慢地杀死他!他去年就已经暗杀了他的儿子!……)他妻子,甚至还有其他人,如奥林匹娅达,都说他虽然外表冷酷,但他很善良,也很慷慨,他把钱施舍给不相识的贫困者(但此后有人看见他拿高尔基的钱,雅戈达便以此来控制他)。他总让人不放心,甚至连爱他的人对他的状况也感到担忧。他妻子什么都不敢问他,向他提问时,便把问题写在纸上。我们对此并不担心,而且非常信任他。他出色地履行着代理人和警卫的职责,照料着高尔基及客人平静的生活。我们让他决定哪些人可以请,哪些人不用请;哪些重要人物可以去拜访,哪些人可以不拜访。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没有安排我们去拜访现制度最忠诚的支持者,如叶莲娜·斯塔索娃^①(我对此深感遗憾!)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还有其他人等。更不要说他接待来访的作家时那种不客气的态度了,他把他们拢在一起接来,又匆匆把他们打发走了,甚至连一杯水都没给他们准备。(是在这个慷慨而又

^① 叶莲娜·斯塔索娃(Е. Д. Стасова, 1873—1966)苏联党和国际共运的资深女活动家。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20年担任党中央书记。1921—1926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27—1937年任苏联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国际监督委员会委员。

挥霍的家里呀!)为什么他要想方设法让作家们不满呢?为什么他要阻止我同他们友好地交流呢?

第63页(7月2日)

我继子谢尔盖后来也住进高尔基家,他不止一次向我们抱怨,发现在花园及周围的树林里布满了设伏的警察,起初,我们和他一样以为是派来监视我们的。今天,我再回过头来看,倒觉得那是派来保护我们、保护高尔基的。

第67页(7月2日)

我所谈到的阿维尔巴赫,在1936年诉讼案调查过程中失踪了,大概被枪决了(他对我们极为冷漠,也不友好)。

第68页(7月3日)

高尔基曾给我讲过石油大亨祖巴洛夫的故事,讲起他那戒备森严的领地,我们乘车在高尔基家附近兜风时,路过那高高的围墙,但没有人告诉我这就是祖巴洛夫的领地,尽管我已注意到那高大的围墙,而且谁也没说现在这是斯大林的别墅,大家都严守着秘密。但一个比我还谨慎的人泄露了秘密:高墙周围聚集着那么多警察,附近筑路工人那阴郁的面孔,使人对此有所警觉,一位老妇人在树林里竟然冲我们挥起了拳头。

第73页(7月4日)

在这篇补记的初篇,我谈到了与布哈林的会面,谈到了我向他提出的令人尴尬的问题。

但我还注意到,高尔基的医生和侍卫在他吃饭时对他监护得不够,这让我感到很奇怪。高尔基患有严重的肺病,可大家却让他呆在有过堂风的地方,在阴冷多雨的天气里把窗户打开,让风正对着他的脊背吹,我们对此颇感惊讶。玛莎每时每刻都在照顾

我常常起身将门窗都关好。现在我看到了雅戈达给医生们下达的指令,要让高尔基去着凉,我不禁生起疑心。

第77页(7月4日)

在和斯大林及其他三位人民委员共进晚宴时,伊格纳吉耶夫伯爵也在座,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是正常死亡,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申明的)。

我的继子谢尔盖也参加了晚宴。我们对当局这么信任我而惊讶不已,让一个年轻人,一个贵族和白军军官的儿子与斯大林共进晚餐,可见他们对我的信任程度;而谢尔盖对现制度并不十分友好,他极有可能(尤其是他这么年轻,谁知道呢?)搞暗杀……他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与我坐在同一侧),面对着伏罗希洛夫(接着,莫洛托夫、斯大林和高尔基都移到上席来,我坐在高尔基的对面,卡冈诺维奇坐在我的左边)。

我的继子有幸参加这次晚宴,才听到斯大林对伊格纳吉耶夫说:“评价一个人时,应当去考虑他的价值,而非他的出身。”这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而且他远未想到竟会出自斯大林之口,这给他很大的启发。从那时起,我们觉得他变了,变得无条件地信赖现制度。

第91页(7月7日)

普多科菲耶夫后来给我们寄来他的诗集。诗集中有些内容令人生厌,沙皇的女儿们被野蛮残酷地杀死了,可他却在诗中表达出狂喜之情。玛莎对此极为反感,而费定却表示理解诗人所表达的情感。

第99页(7月9日)

在与作家们会面时,我同米尔斯基交谈了一番,高尔基对他

赞不绝口,他第二年也被枪决了,罪名是他参加了英国共产党,是个间谍。

我在这篇补记中已经提到艾登曼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起被枪决了。

第102页(7月10日)

雅戈达和高尔基都来看有关比鲁比疆的记录片。他们俩坐在我们前面的扶手椅上,玛莎将他们说的话翻译给我听。影片的结尾处展示了苏联年轻的犹太人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在一起聚会的场景:他们喝冷饮,跳狐步舞。我们听见雅戈达(他真是清教徒)轻声对高尔基说:“耻辱!……这真让我感到羞耻……”善良的高尔基回应道:“那您想让他们做什么?让他们现在去祈祷上帝?”

第107页(同一天晚上)

在与雅戈达的会谈中,应当补充说明,在他所提到的关押着20万囚犯的集中营里,还住着担负开凿莫斯科河至伏尔加河运河工程的劳动者。

第114页(7月12日)

布尔什沃的劳改犯到高尔基家来访,有几个细节需要补充,他们走后,我夫人的某些物品被盗走了。第一个细节是,所有卧室的房门都是锁好的,但后来却都被打开了。当天晚上,玛莎尚未发觉丢了东西,只是到了第二天或第三天,她才发现在卧室里的一个钻石和红宝石项坠,一条配着十字架和圣牌的金项链,一个镶着摩纳哥100法郎硬币的首饰别针被人偷走了。她私下询问了几个人,此后,她相信肯定是被布尔什沃公社的人偷走了。我的继子谢尔盖说,大家都知道他们常常找借口从布尔什沃溜到

莫斯科来,就是为了偷东西。玛莎将这事告诉了奥林匹娅达,后者又告诉了克留契科夫。三个小时之后,来了一名刑警队长,他那副样子令人讨厌,又显得十分滑稽,他矢口否认布尔什沃的人会到这儿来偷东西。但两天以后,警方将被盗走的物品送还回来,声称是在图尔格辛旧货市场上找到的,他们不肯承认是从布尔什沃那儿找回来的。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那条金项链在未被盗走之前就断了,但送还到玛莎手里时已被修好了,因为警方以为是盗窃犯给弄断的。在布尔什沃肯定进行过一次严格的搜查,同时向众人发出警告迫使偷盗者只有乖乖地交回物品。这些人大概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我们一想起来,便感到有些内疚。玛莎请他们不要严厉惩罚那些人,但根本没有用。况且,她也不可能为那些罪犯求情,因为雅戈达的警察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就是要私下悄悄地了结这个案子。

第 117 页

谈到俄国作家时,雅戈达是这样对我说的:“还有其他外国作家要求见我,但都被我拒绝了,您是……第一位外国作家。”

第 126 页(7 月 15 日)

我想在这儿强调说明,拉狄克对我的冷漠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这是我初次和他见面,他在暗中却对我抱着敌视的态度,话一出口便是冷嘲热讽的腔调。

我还应说明,那一天及前几天,我和尼娜·涅姆琴柯一起接待了广播委员会的来访,他们曾要我录一段话,我同意了,而且读了一段简短的致辞,他们请一位著名的播音员来播送我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的片段,将我的致辞放在广播剧的前面。作为酬金,他们想送我一件漂亮的毛皮大衣,但被我婉言谢绝了。在

苏联逗留期间内,我不接受任何酬金、任何礼物,不论这礼物多么合情合理,这样人们就永远也不会责备我,而我呢,也可以保持绝对的独立。况且,我还是高尔基的客人呢。

第129页或接下去的几页(7月16日或此后的日子)

我现在想起来,在赴莫斯科的两年之前,我曾收到一封匿名信,这封信显然是能接近高尔基的人写的(未让高尔基知道)。这封信表明有人偷看了我写给高尔基的私人信件,而且也看到了高尔基写的某些信件,因为匿名信暗示我们俩就波罗的海运河工程所交换的看法,信中的口气十分严厉,而且带着强烈的讽刺意味,匿名信称斯大林为法老胡夫,把这项运河工程同建金字塔时驱使奴隶劳动相提并论。综合种种迹象,这封信像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当我们坐在高尔基家饭桌前时,我们在想:“这个女人就在这里,她到底是谁呢?”我们完全可以公正地怀疑这个人或那个人。有一个事实是确信无疑的,高尔基吃饭时,就面对着自己的敌人(倒不是他本人的敌人,而是他思想上的敌手)。要不是一年后得知阴谋活动就在他家里策划,我们决想不到那封匿名信也有一层罪恶的含义。

第136页(7月18日)

在为格鲁吉亚代表团举行的正式宴会上,重工业委员会副主任艾里亚瓦担当酒宴的“司仪”一职,他安排了一系列的祝酒辞,惟独没有请那些格鲁吉亚人为他们的同乡斯大林祝酒,倒是高尔基替他们向斯大林祝酒。他们借口谦逊的美德不允许他们首先提出为他祝酒。但今天我确信那疏忽是故意的。因为艾里亚瓦在第二年也被逮捕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有些格鲁吉亚客人并未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他们这些人当中大概有个反对派小团

伙。

第 141 页(7 月 20 日)

在这里我要谈谈写给斯大林的道别信。我把这封信交给了克留契科夫,他马上就送走了(先交给谁了呢?是否交给了他的主子及邻居雅戈达呢?)。我对此毫未留意,尽管我当时感到很奇怪(但我当时理解成其它意思了),克留契科夫回来后,满脸洋溢着喜气,给那封信予高度的评价。这是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甩掉冷冰冰的面孔。不仅他在赞扬这封信,雅戈达后来也称赞了这封信,这并未引起我的怀疑。我当时以为我所用的词汇和语气都恰到好处,而这语气让斯大林感到满意(但我并未收到他任何热情的告别辞,我对此颇感惊讶)。但今天再次读着这封信,我开始明白了,克留契科夫和雅戈达为何对此兴奋不已,那是因为整个信件没有一句颂扬斯大林的赞美之辞,比如像巴比塞所做的那样;这封信甚至没有视其为苏联的最高元首,只是把他当作一名“中间人”,通过他的手,我去紧握苏联人民的手,而实际上,我这封信就是写给全体苏联人民的。我并未刻意去耍手腕,只是在信中表达了某种豪情,它不需要颂扬恭维那个人,那个人(我在克里姆林宫见到的只是一个纯朴、但有些粗鲁的人)应当感谢这种豪情。我没料到双方的明争暗斗会这么激烈,写给双方任何一方的每个字,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或什么表示都没有,怎么这么快就被领会、斟酌并加以利用呢?直到我离开苏联,我都未公开颂扬斯大林,也未赞同他的权威,反对派对此该心满意足了!虽然后来我对斯大林的沉默感到震惊,但我并不认为他私下里感到失望,并且受到了伤害,或许在后来发生的残酷的混战之中,他一直不了解我究竟对他抱着何种情感。实际上,此后我写给他的所有信件

都是在维护苏联的事业,或请求他宽恕那些被逮捕的阴谋分子;请求赦免拉狄克的死刑,为布哈林求情,为阿罗塞夫求情(他的情况有所不同),我还为拯救列文医生给他拍了电报。我一直在躲避着来自各方的三番五次的请求,他们要我和他们一起去谴责在审判中被判有罪的人;要我就这些案件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要我与颂扬斯大林的杂志合作。然而,所有信件发出后,如石沉大海,一点回音都没有。事实上,斯大林应该看得很清楚,我从未说过有损于苏联事业、有损于他的事业的话。但也没说过颂扬他的话。然而在我了解和掌握事实真相的前提下,我还是支持他的。但我不喜欢他那肆意践踏失败者的做法,其中几个人,如布哈林等,我对他们一直都十分尊重,也对他们抱有好感;我也不同意他对阴谋活动给予无情的镇压,即使这种镇压手段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抛开人性的因素不谈,这种手段对于苏联现制度,对于革命事业是毁灭性的。世界舆论也是这样看的,或许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毁灭:那些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政治家、将军、外交家、工程师、技术员等)被无情地消灭了,谁能估量出苏联在人才资本中的损失有多大呢?将其中的大部分人留下来为苏联服务不是更明智吗?许多参与阴谋的人都是忠诚的战士,他们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投身于革命,是革命的另一股潮流,是另一政治倾向罢了,他们的最大罪过就是没有成功。其中很少有人知道暗杀行动及

与外国合作的计划。叶若夫^①依靠无情的手段为斯大林赢得了胜利,但这不止一次地让我想起1794年的恐怖活动为共和国造成的灾难,当时我正在写《罗伯斯庇尔传》。在那场恐怖活动中幸免于难的人,甚至像富歇和塔列兰^②那样的恶人,最终还不是为拿破仑及法兰西所利用吗?这完全是为了拯救法国,为了使法国走向强盛。但我的话题扯得太远了,已经偏离了我写于1935年的日记以及我写给斯大林的道别信这个主题。

第143页(7月21日)

从高尔基的乡间别墅到他城里家的路上,彼什科娃女士和我乘坐同一辆车,她不断地向我抱怨雅戈达,其措辞之强烈,语气之尖刻令人震惊。我在日记里已经将她的抱怨写得缓和多了。“他在撒谎!他在撒谎!”她不断地重复道,其恼怒之意溢于言表,仇恨之中还夹带着鄙夷。

克留契科夫想让我在一张照片上题好字送给雅戈达,他不敢直接找我说,便三番五次地找我夫人求情,她觉得这事有些为难:因为我绝对不会同意,她也支持我的想法,她一直在找理由想敷衍。

① 叶若夫(Н. И. Ежов, 1895—1940):全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1935—1939年为联共(布)中央书记,1936—1938年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1936年9月—1938年11月直接领导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将大清洗运动推向高潮,史称“叶若夫旋风”。

② 塔列兰(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 Perigord, 1754—1838)法国外交大臣(1797—1807, 1814—1815)。1797年起历任督政府、执政府外交部长和第一帝国、复辟王朝初期的外交大臣。1804年任拿破仑皇帝侍从长。拿破仑垮台后,任临时政府首脑,支持波旁王朝复辟。曾出席维也纳会议,利用反法同盟内部的矛盾,改善法国的地位。1815年7月任枢密院主席,不久辞职。

衍过去,所以一直拖到临行的最后一刻,这事我也未记在日记里。

第 205 页

在这篇补记的开篇,我已经写下了与布哈林告别时说的那番话,那话既有可能产生歧义,又使人感到窘迫。

第 149 页(7月22日)

在波兰边界,我们见克留契科夫在波兰海关负责人的耳边悄声嘀咕着什么,然后,这人未作任何检查马上就把我们的行李放过去了,我们对此极为惊讶(从苏联进入波兰境内这还是非常少见的)。他到底对那人说了什么密令,这么管用?

第 151 页

在华沙,苏联大使馆的首席参赞波德沃尔斯基对我们极为友好,可他竟然在1937年被枪决了!那时他在波罗的海的某个国家(爱沙尼亚?)担任公使。苏联政府本可以(也应该)利用这些忠诚的、优秀的力量,但苏联政府却把他们毁掉了,真是让人感到痛心,波德沃尔斯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浑身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和激情,曾艰苦顽强地工作过,才被提升到领导岗位上,当他就要为苏联作出更大的贡献时,却被政府无情地摧毁了。这么长久的工作经验毁于一旦!……可人们却对此并不感到惋惜!不,毁灭性的行动是不公正的。它宛如一把双刃剑,使用这把剑的国家和政府是在肢解自己。

第 151 页及下页

最后几天克留契科夫一直陪着我们,和我们聊天时,他摆脱了冷酷、呆板、敌视的态度,显得很轻松。他对我们好像换了一个

人似的,更自信、更热情了,几乎有些腼腆。我相信他的疑虑(假如有的话)都已消散了,他只怀着对我们的好感。或许他正准备向我们倾诉那些令他苦恼的事情,假如这是可能的话。我相信他现在正以伤感的心情看着我们远离这里,他大概也希望(至少动过这个念头)像我们一样躲开这副可怕的刑具,他在苏联正忍受着这副刑具的折磨,希望抛开压在他头上的罪恶的职责。但他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还身在莫斯科呢!……

第 155—157 页

在试图为斯大林和高尔基勾勒的画像中,我一直以为克留契科夫与克里姆林宫及斯大林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我完全搞错了,把他当作斯大林安插在高尔基身边的特务。其实恰恰相反,他是另外一个阵营的特务,特别是雅戈达的特务,雅戈达攥着他的把柄。他似乎与斯大林的秘书关系很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斯大林的秘书现在怎么样了?)

第 117—120 页

在对雅戈达的描述中,某些细微的笔触还是很准确的。尽管他喜欢拿甜言蜜语哄人,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丝虚伪。但对这样一位“肩负着繁重而又费力不讨好的职责,迫使他戴上面具,拿起斧头”的人表示怀疑,这让我良心上有些过意不去。我倒肯接受相对正直的可能性。今天,这个问题已没有实际意义了,他的面具已被摘掉了。况且,他所有的罪恶都融于其本性之中,其中之一是文艺复兴时意大利人(或犹太人)的本性,言谈举止温和、敏锐,富有爱意,极有人情味;另一个本性在揭去神秘的面纱后赤裸裸

地暴露出来：“放纵的暴君。”正如对他起诉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兼有富歇和波吉亚^①之本性的融合体。我现在琢磨着，布尔什沃这个被他用来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否也被他用来招募刺客和受他指挥的近卫军呢；他将这些人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当作盲从的工具，让他们服从于他的意志。

关于《与斯大林会谈纪要的官方文本》，我曾不止一次让人去询问斯大林，是否允许我发表这篇纪要，他此前已经审阅过而且也认可了这篇纪要。可我从未得到他的书面同意或反对的意见。最后，只是阿罗塞夫转达了他的口信，所谓的许可也是极为含混不清的（但没有书面许可），我可以个人名义发表这篇纪要，但斯大林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感到茫然。今天，我又重读了一遍这篇纪要，谈话中有关法苏协定、欧洲发生战争时苏联的立场一旦形成文字并以官方形式发表的话，显然对苏联很不利，斯大林决不会同意发表这篇纪要，因为即使是在今天，这篇纪要依然是对苏联政策不利的危险武器，会为法国的敌人提供证据，他们会利用这证据来反对苏联。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表明，他希望建立名副其实的法苏联盟以消灭法西斯国家，然后再去发动法国工人阶级调转枪口去反对资本主义民主。今天，让我感到吃惊的，倒不是斯大林阻止我去发表这篇纪要，而是他和我会谈时，是那么直率，没有采用任何外交辞令般的委婉说法。他信任我，而且在我离开苏

^① 波吉亚（Cesare Borgia，1475？—1507）：意大利军事与政治冒险家。通常被视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狡猾、狂妄领主的典范。

联之前,让人把他审阅过的纪要文本交给我,态度还是那么鲜明,再次体现出对我的信任。

修改于 1938 年 12 月

罗曼·罗兰



[附]斯大林同志和罗曼·罗兰谈话记录^①

(最终文本)

今年6月28日16时整,斯大林同志接见了罗曼·罗兰,参加接见的有他的妻子和阿罗塞夫同志

双方友好地问候。斯大林同志请出席者就坐。罗曼·罗兰感谢斯大林同志,说斯大林给他提供了这一谈话的机会,并特别感谢主人的盛情接待。

斯大林:我对和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谈话感到高兴。

罗曼·罗兰:我很遗憾,我的健康状况未能使我早一些访问这个伟大的新世界,这世界现在是所有人的骄傲,我们已经把我们的希望和它联系在一起。现在,如果您允许,我想以我的双重身份和您谈谈,既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维护者,也作为来自西方的见证人,法国的观察家和青年及同情者所信赖的人。

您应该知道,在千万西方人的眼中苏联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对它的认识是极为模糊的,但他们却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希望,自己的理想的体现,尽管这希望和理想是各式各样的,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在如今深重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的形势下,他们期望苏联进行领导,提出口号,澄清他们的疑虑。

当然,要满足他们是困难的。苏联有自己自身的巨大的任

^① 原文最早发表在《读书》1999年第4期上。

务,自己的建设和国防的工作,因此它应该全力以赴:它能提出最好的口号,它在作出榜样。它在指明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并证实它的正确性。

但是,苏联毕竟不能推卸当今世界的状况所赋予它的伟大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是“最高的”责任——关心其他国家的,完全信赖它的这些群众。重复贝多芬的名言“人啊,自己救救自己吧!”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帮助,要给他们忠告。

但是,为了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应当考虑每个国家的禀性和意识形态——现在,我只说法国。不了解这种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引起,并且实际上正在引起严重的误会。

决不能期待法国的公众,即使是同情者,具有在苏联已成为第二本性的思维辩证法。法国人的禀性习惯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悟性的和直线的,与演绎思维不同的某种程度上的实验思维。为了克服这种逻辑,就需要很好地了解它。这就是习惯于高谈阔论的人民和社会舆论。总是需要为他们指出行动的理由。

在我看来,苏联的政策不甚关心向自己的外国朋友指出自己某些行动的理由。而事实上,苏联有足够多的这样的理由,公正的和令人信服的理由。但它似乎很少关心这一点;而要我说,这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可能引起,并正在引起对某些事实的不符合实际的,或者有意歪曲的解释,这正在千万同情者中引起不安。因为我在最近一个时期在法国许多的正直的人那里观察到了这种不安,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应该给您提个醒。

您会对我们说,我们——知识分子和维护者的作用就在于去作解释。当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时,我们就无法胜任这样的任务:没有给我们提供使事情变得合理和作出解释所必需的

材料。

我觉得,在西方应该有个类似于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有更大的政治性质的知识分子交往的机构。但是,因为没有类似的机构,误会正在增加,而苏联的任何官方机构又不从事这样的解释工作。大概,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误会是可以烟消云散。但它们不会烟消云散,它们在日积月累。需要从一开始就采取行动,在其一出现时就化解它们。

举几个例子吧。

苏联政府作出决议,或者是以法院的决议和判决的形式,或者是以改变普通的惩罚措施的法律的形式,这都是它的最高权力。但在一些情况下,这所涉及的问题或人总是体现或者具有普遍的兴趣和意义;并且由于某种原因,外国的社会舆论也就总会骚动一片。避免误会本是不难做到的。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您坚决镇压杀害基洛夫的阴谋的同谋者,您做得是对的。但是,在惩治阴谋者时,您要向欧洲的公众和世界公布被告者的谋杀罪行。您将维克多·塞尔什流放奥伦堡3年,这自然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但为什么允许让这件事在两年的时间里被欧洲的社会舆论炒得无以复加。这是个用法文写作的作家,我本人并不认识他,但我是他的朋友中某些人的朋友。他们关于他被流放到奥伦堡,以及如何对待他的事向我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相信,您既然采取了行动,就定会有严肃的理由。但是,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在坚信他无罪的法国公众面前公布这些理由?一般说来,在一个发生过德雷福斯和卡拉斯案件的国家里,允许被告成为全社会运动的中心是很危险的。

还有一个例子,这完全是另一类性质的事:不久前公布了关

于惩治 12 岁以上少年罪犯的法律。该法律的条文尚不十分清楚,然而根据已知的情况,该法律正在引起严重的担心。给人的印象是,死刑正威胁着这些孩子。我非常理解这样做的动机:必须使那些不负责任和那些想利用这种不负责任的人们感到恐惧。但是,公众并不理解。他们会觉得,这种威胁正在变为现实,或者法官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来实现这种威胁。这可能成为极其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的源泉。对此必须立即加以预防。

同志们,请你们原谅我,也许我讲得太长了,也许,我提起了我本不该提起的问题。

斯大林:没有,没有,请讲吧。我很高兴听您说,我现在完全听您支配。

罗曼·罗兰:最后,我要谈一下因战争问题而引起的极大的、实际存在的误会和对战争的态度。这个问题在法国早就在议论了。数年前,我和巴比塞以及我的共产党人朋友们就讨论过没有前提的反战运动的危险性。我觉得,必须研究可能出现的战争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在每种情况下都可接受的各种论点。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苏联需要和平,它渴望和平,但它的立场和不可分离的和平主义是不相吻合的。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有利于法西斯主义的放弃,而这种放弃却可能引起战争。在这方面,我对 1932 年阿姆斯特丹反战和反法西斯主义大会的有些决议感到不完全满意,因为它的决议在反战策略问题上令人有些担心。

现在,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而且苏联的许多朋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迷失了方向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意识被苏联与帝国主义的法国民主政府的军事结盟搅糊涂了——这在有理智的人们中间引起了不安。在这里有许多需要作出解释的有关

革命辩证法的严肃问题。

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斯大林:如果我需要回答的话,那就请允许我回答所有的问题。

首先,关于战争。我们和法国相互援助的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签订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在欧洲,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里出现了两种国家体制:法西斯国家体制,在这些国家中,一切有生命的都被机械式的手段所镇压,在那里工人阶级及其思想被机械式的手段所扼杀,在那里工人阶级被窒息,而另一种是由旧时保存至今的国家体制——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体制。这些国家也是准备要扼杀工人运动的,不过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手段——他们还有议会,某种程度的自由报刊,合法的政党,等等。这里是有差别的。不错,这里也是有限制的,不过毕竟还是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总还是可以呼吸的。在国际范围内,这两种国家制度间的斗争正在进行。而这种斗争,在我们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的政府应该保守中立和不进行干预吗?不,不应该,因为保守中立就意味着会使法西斯分子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而法西斯分子的胜利就是对和平事业的威胁,就是对苏联的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世界工人阶级的威胁。

而如果苏联政府应该干预这种斗争的话,那它应该在哪一边干预呢?自然,在尚未得以破坏和平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一边。因此,苏联所感兴趣的是,法国需要很好地武装起来反对法西斯国家可能的进攻,反对侵略。所以,我们进行干预,就好像在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在侵略和反侵略之间斗争的天平上,加

上了一个砝码,这天平就会有利地向反法西斯主义和反侵略方面倾斜。这就是我们和法国签定协议的理由。

我这是从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视角来说的。然而,法国的共产党在战争问题上也要采取这样的立场吗?我看,没有必要。它在那里不执政,在法国执政的是资本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法国共产党也是一个不小的反对组织。有没有保证能使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利用军队去反对法国的工人阶级呢?当然没有。苏联和法国有反对侵略、反对来自外部的进攻的相互援助的条约。但是,苏联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法国不得利用自己的军队去反对法国工人阶级的条约。正如您所看见的,共产党在苏联的状况和共产党在法国的状况不相同。因此,显而易见的事,共产党在法国的立场也就不可能和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的苏联的立场相一致。所以,我完全理解法国的同志们说,法国共产党自己所采取的立场依然应当是苏联和法国签定协议之前的立场。但由此不应得出,在不管共产党人如何的努力、战争还是爆发了的情况下,共产党人似乎就该去抵制战争和在工厂进行罢工,等等。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尽管我们反对过战争和让沙皇政府失败,但从没有拒绝过使用武器。我们从来不是工厂罢工或者抵制战争的拥护者,相反,当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时,我们去从军,去学习射击,去掌握武器,然后用我们的武器去反对我们的阶级敌人。

至于说到苏联能否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签订反对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协议,这个问题还在列宁时期,根据他的倡议,就很好地解决了。托洛茨基曾是这样解决问题的拥护者,但他现在显然是把这一点忘掉了……

您刚才说,我们应该带领我们的西欧的朋友。我要说,我们

害怕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我们不承担带领他们的任务,是因为给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在完全是另一种形势下的人们指明方向是困难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自己的具体条件,而要从莫斯科来领导这些人们,从我们方面来说恐怕就是大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们就仅仅限于最一般的建议。否则,我们就会承担起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我们切身体验过,当外国人在领导,而且还是从远处,这意味着什么。战前,确切点说,在(19世纪)9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核心,而我们俄国人是他们的学生。它当时就试图领导我们。如果我们使它们有可能来引导我们的话,我们大概就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党,不会有1905年革命,也就是说,不会有1917年革命了。应当使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共产党领导人。无此,要进行领导是不可能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西欧的朋友们不太清楚苏联政府行动的理由,而我们的敌人又常常使他们束手无策,那这不仅说明我们的朋友还不善于像我们的敌人那样好好地武装自己。这也说明我们在通报消息和武装我们的朋友方面做得不够。我们将努力弥补这个缺陷。

您说,敌人对苏联人作了许多的诽谤和中伤,而我们很少反驳他们。这是对的。对苏联的杜撰和诽谤,没有什么敌人想不出来的。反驳他们有时甚至都是令人尴尬的,因为它们太离奇古怪和荒诞不经。比方说,有人写道,我和军队一起反对伏罗希洛夫,杀死了他,而在6个月后,他们忘记自己说过什么了,又在同一份报纸上写道,伏罗希洛夫和军队在一起反对我,杀死了我,显然,这是在伏罗希洛夫自己的死亡之后的事了,后来在这一切之

后又说,我和伏罗希洛夫谈和了,等等,等等。这怎么去反驳呢?

罗曼·罗兰:但是,毕竟是没有反驳和解释才产生出诽谤的。

斯大林:也许是。可能您是对的。当然,本来是可以对这些荒谬的流言作出更积极的反应的。

现在请允许我回答您对惩治 12 岁以上孩子的法律的意见。这一法令所具有的是纯教育的意义。我们想用它来吓唬的与其说是有流氓行为的孩子们,不如说是孩子们中间流氓行为的教唆者。应当指出,在我们的中学里发现了一些 10 - 15 个人的流氓男女的团伙,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殴打或者奸淫最好的男学生和女学生、男女先进的学生。已经出了一些事:这样的犯罪团伙把女孩子骗到成人那里,在那里将她们灌醉,然后使她们沦为妓女。还有这样的事,一些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学生、先进分子,被流氓团伙沉到井里去,弄伤他们,想方设法地恐吓他们。同时还发现,这些少年流氓团伙是由成年人中的匪帮分子组织和操纵的。很明显,苏联政府对此等丑行不能置若罔闻。法令的公布是为了恐吓和打乱成年人匪徒的阵脚,从流氓分子那里拯救出我们的孩子。

我提请您注意,除这一法令外,我们还公布了禁止买卖和拥有芬兰刀和匕首的决议。

罗曼·罗兰:那么为什么您没有公布这些事实?如果这样的话,人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公布这一法令。

斯大林:这不是如此简单的事。在苏联还有不少越出常轨的落魄失势的人,宪兵、警察、沙皇官吏、他们的孩子、他们的亲属。这些人还不习惯于劳动,他们对一切不满,是犯罪的现成土壤。我们担心,有关上述性质的流氓行为和罪行的披露可能对类似的越出常轨的人们起到影响——传染并可能推动他们去犯罪。

罗曼·罗兰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斯大林 :我们能不能这样来作出解释呢 ,说我们公布这一法令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是警告犯罪 ,是恐吓犯罪分子?当然 ,不能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会在犯罪分子的眼中失去任何力量。

罗曼·罗兰 :不 ,当然 ,不能。

斯大林 :应当让您知道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例使用该法令的最严厉的条款来对待少年犯的 ,并且我们希望不会有。

您问 ,为什么我们不对犯罪的恐怖分子进行公开的诉讼程序。比如说 ,杀害基洛夫事件。也许 ,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是被我们身上勃发的对犯罪的恐怖分子的仇恨情绪所控制了。基洛夫是个优秀的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我们所枪毙的一百个人从司法观点来看都和杀害基洛夫的凶手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他们都是我们的敌人从波兰、德国和芬兰派进来的 ,他们所有的人都有武装 ,给予他们的任务是从事反对苏联领导人 ,包括基洛夫同志在内的恐怖活动。这一百个人都是白卫分子 ,并且没有想在军事法庭上否认自己的恐怖活动意图。他们中的许多人说 :“不错 ,我们想过并且正在想消灭苏联领导人 ,你们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 ,枪毙我们吧 ,如果你们不想干 ,我们就会消灭你们。”我们觉得 ,在有辩护人参加的公开法庭上来审理他们的犯罪案件 ,对这些先生们来说是过于的荣耀了。我们已经得悉 ,犯罪的恐怖分子在凶残地杀害了基洛夫之后 ,还打算对其他的领导人实行凶残的计划。为了预防这种罪行 ,我们承担了枪毙这些先生们的不愉快的责任。政权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在类似情况下的政权就该是强力的、猛烈的和无所畏惧的。反之 ,它就不是政权并且不可能被政权所承认。法国

的公社看来并没有理解这一点,它们过分的软弱和动摇不定,卡尔·马克思正是为此而指责它们的。所以,它们失败了,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并没有饶恕它们。这对我们是一种教训。

在因基洛夫同志被杀害而采取极刑惩罚措施后,我们本也不想在以后对罪犯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遗憾的是,在这件事上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此外,还需要指出,我们不仅在西欧有朋友,在苏联也有朋友,就在西方朋友建议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宽容对待敌人时,我们在苏联的朋友却要求强硬,比方说,要求枪毙基洛夫同志被杀事件的鼓舞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我希望您能注意到下述情况。西方的工人一天要工作 8、10 和 12 个小时。他们有家庭,有妻子,有孩子,要为他们操心。他们没有时间阅读书籍,并从书里为自己吸取领导的准则。当然他们也不十分相信书本,因为他们知道资产阶级的文人们常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欺骗他们。所以他们只相信事实,只相信他们亲自看见和用手指可以触摸到的事实。而正是这些工人们看到,在欧洲的东部出现了新的工农的国家,在那里再也没有资本家和地主了,在那里一片劳动景象,在那里劳动者享有前所未有的荣誉。工人们由此得出结论,这意味着可以不倚赖剥削者而生活,意味着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这一事实,苏联存在的事实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的革命化事业中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所有国家的资产者都知道这一点,并对苏联怀有本能的仇恨。正因为如此,西方的资产者想让我们——苏联的领导人要尽可能快地完蛋。这也就是他们组织恐怖分子,派遣他们经由德国、波兰和芬兰进入苏联,不惜金钱、不惜其他手段的理由所在。再举个例子,不久前,在我们的克里姆林宫里发现了一些恐怖分子。我们

有一个政府图书馆,那里有一些女图书管理员,她们进出克里姆林宫中我们的负责同志的住房,为的是使对图书的管理秩序井然。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些女图书管理员中的某个人被我们的敌人收买来从事恐怖活动。应当指出,这些女图书管理员中的较大一部分人是曾经进行过统治、而现在被粉碎了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残余。结果怎样呢?我们发现,这些女人带着毒药走来走去,打算毒害我们的某些负责同志。当然,我们把她们抓了起来,但我们不打算枪毙她们,我们把她们隔离了起来。这就是我要告诉您的另一个事实,这事实说明我们的敌人的极端凶残和苏联人保持警惕的必要性。

正如您所看见的,资产阶级正在相当残酷地和苏维埃作斗争,而随后却在自己的报刊上径自喊叫苏联人的残忍。一只手在将恐怖分子、杀手、流氓、毒杀者派到我们这里来,而另一只手在写关于布尔什维克不人道的文章。

至于说到维克多·塞尔什,我不了解他,现在不可能给您作出答复。

罗曼·罗兰:我本人也不了解他,但我亲自听说过他是因赞成托洛茨基主义而受到缉捕的。

斯大林:是的,我记起来了。这不仅仅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还是个骗子。这是个不诚实的人,他对苏维埃政权搞破坏活动。他试图欺骗苏联政府,但他没有能做到。托洛茨基分子在巴黎的保卫文化大会上提出了有关他的问题。诗人吉洪诺夫和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对他们作出了回答。维克多·塞尔什现在自由地生活在奥伦堡,大概还在那里工作。当然,他没有遭到任何的折磨、残酷拷打和诸如此类的事。所有这一切都是胡说八道。我们不

需要他,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他到欧洲去。

罗曼·罗兰(微笑)我听人说,奥伦堡——好像是个荒漠。

斯大林:不是荒漠,而是个好城市。我实际上真在图鲁汉斯克边疆区的荒漠中度过了4年的流放岁月,那里零下50-60度。也没有什么,活过来了。

罗曼·罗兰:我想再谈一下对我们,西欧的知识分子和对我个人都极为重要的问题:关于新人道主义。您,斯大林同志,宣告了它的诞生,您在自己不久前的一篇卓越的讲话中说:“在世界所有现存的珍贵资源中,人是最有价值的和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新人和由他所产生的新文化。没有什么像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新道路的建议,这种人类精神的综合更能将全世界吸引到革命的目的方面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产,知识分子的政党,发明和创造精神的总结,大概在西方是最不为人所知的领域。然而,这却注定了要对有高度文化的民族,例如我们的民族,产生最大的影响。我有幸指出,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年轻的知识分子正开始实实在在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教授们和史学家们此前不久还在尽力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或者力图损害它的信誉。但是,现在甚至在最高学府的范围内也正在出现新的潮流。出现了一本特别有意义的言论和报告集,题名叫《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其编者是索邦的瓦隆教授,该书的主要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今科学思想中的作用。如果这一运动得以发展的话(我希望如此),并且如果我们善于这样来推广并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大众化的话,这将在我们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中引起极为深刻的反响。

斯大林: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将人从剥削

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使个性自由。而用剥削来禁锢人的资本主义却使这种自由丧失了个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某些人,最富有的人才能是某种程度上的自由人。大部分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享有个性自由的。

罗曼·罗兰:不错,不错。

斯大林:只要我们去掉了剥削的羁绊,我们就能进而解放个性。关于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说得很好。

罗曼·罗兰:大概,它还没有被译成法文。

斯大林:不可能。在恩格斯的这本书里有很好的表述。书里说,共产党人在砸碎了剥削的锁链后,应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我们的任务是解放个性,发展它的能力,在其中发展对劳动的爱和尊重。现在,在我们这里正在形成全新的环境,正在出现全新型的人,尊重和热爱劳动型的人。在我们这里,人们痛恨懒汉和游手好闲者,在工厂里总是用粗草席子把他们卷起来,再这样把他们扔出去。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创造性的工作,突击运动——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最强音。男女突击手——这就是人们热爱和尊重的人,这就是现在在其周围凝聚了我们的新生活、我们的新文化的人。

罗曼·罗兰:对,很好。

我很不好意思,我到这里来耽误您这么久,占用了许多的时间。

斯大林:瞧您说的,哪里的话!

罗曼·罗兰:我感谢您给了我和您谈话的机会。

斯大林:您的感谢有点使我不安。人们通常只向并不期望从

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的人感谢。难道您认为我没有能够好好地来接待您。

罗曼·罗兰（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老实告诉您，对我来说，这是异乎寻常的。我从来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这里受到过如此好的接待。

斯大林：您打算明天——6月29日到高尔基那里去？

罗曼·罗兰：说好了明天高尔基到莫斯科来。我和他到他的别墅去，也许在晚一些的时候，我会接受您的建议也到您的别墅去。

斯大林（微笑）我没有任何别墅。我们，苏联领导人总的说来没有自己的别墅。这只不过是许多备用别墅中的一座，是国家财产。这不是我向您提供别墅，这是苏联政府提供，这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我向您提供。

在那里您会感到很安静，那里没有无轨电车，没有铁路。您能在那里好好地休息一下。这座别墅随时供您使用。只要您愿意这样，您就可以利用这别墅，不必担心谁不方便。

您将参加6月30日的体育游行吗？

罗曼·罗兰：是的，是的，非常想。我请求给我提供这次机会。

也许，我能指望当我在高尔基的别墅或者在您盛情给我提供的别墅里，我能再次见到您，并能和您谈一谈。

斯大林：别客气，随便什么时候。我完全受您支配，并且很高兴到别墅去见您。您一定会有机会参加体育游行的。

（谈话由阿·阿罗塞夫担任翻译）

（原件为打印件，存俄罗斯总统档案馆，ф. 45, О II. 1, Д. 795, лл. 38—54，本附件由俄文译出，与本书的“6月28日”的日记在文字表述上稍有出入。）



译后记

——坚定的信念，痛苦的历程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大批西方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先后到苏联访问。1935年6—7月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之邀访问了苏联，并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回国后写下了这部《莫斯科日记》。那么罗曼·罗兰的访苏之旅是否有追逐潮流之嫌呢？不，绝对没有。

早在1895年，他就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以社会主义的信念同当时的旧思想作斗争。这期间直至十月革命前，正是他执笔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期，在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五卷《广场集市》和第八卷《在家中》里，人们可从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变化上体验到罗兰的社会主义思想。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共产党人激进的做法，但他却是最早讴歌这场革命的法国作家。1918年10月莫斯科社会科学院任命他为该院院士。他坚持认为惟有苏联能够拯救西方；他对苏联的态度是：他信任苏联人民，他要保卫苏联，保卫十月革命，认为这场革命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开拓性的革命”。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对苏联的批评，他批评苏联的“某些政治手法”、“狭隘的学说”、“专制意识”、“口是心非和暴力行为”。他呼吁苏维埃革命改正其错误：要“高举光明和自由的旗帜”。

30年代初，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而苏联则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列宁于1921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后,苏联已摆脱了经济困难的困扰,这让罗兰再次看到“劳动人民”的优势。自那时起,他就希望能到苏联去访问。1930年1月高尔基给他写信,希望能同他见面。时隔一年之后,又给他写信邀请他访问苏联。那时罗兰已接近70岁了,而且身体又不好,赴苏的行程一拖再拖,直至1935年才得以成行,但他无法走访苏联全境,只能逗留在莫斯科,也算是走马观花吧。

那么罗兰是在何种局势下到苏联访问的呢?在国际方面,1933年希特勒掌管了德国的军政大权,将法西斯主义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法苏两国开始和解,并建立战略同盟关系以打压德国的扩张势头。1935年5月2日,法苏两国在巴黎签署了《和平友好互助条约》。苏联国内的局势也较为稳定:1934年联共(布尔什维克)举行了第十七次代表大会,20年代末遭到处分的党的高层领导,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也都恢复了原职,回到了领导岗位上,因批评集体化步伐过快的布哈林,在被打成右派、销声匿迹4年之后又重返政治舞台。党似乎正朝着和解、民主的方向发展,而且它还在组织起草新的宪法。

但天有不测风云,顷刻间一切都被搅得天翻地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身亡,叶努基泽马上下令将100多名疑犯处死。同年12月16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再次被捕。1935年1月15日在莫斯科对高层领导进行了首次诉讼,判处季诺维也夫10年徒刑,判处加米涅夫5年徒刑。叶若夫当上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及监察委员会的首脑。叶努基泽很快就被赶出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而后也遭逮捕。

在《莫斯科日记》及补记中,罗兰用了许多笔墨来描写几个小

集团为争取将他留在自己身边所展开的激烈斗争,从中不难看出苏联党内的帮派斗争还是十分错综复杂的。罗兰以其深邃的目光观察着他所看到的一切,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而感到困惑不已;对高层领导及御用文人搞特殊化深感痛心;他看到了筑路工人对干部特殊化而表露出的愤怒的目光,甚至没有漏过老妇人冲他们挥舞拳头的细节。

在他返回瑞士不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指出:“共产党人正面临着双重危险:一是过分地孤立于整个民族;二是未对自己实行严格的道德纪律约束。”这与罗兰所注意到的危险可谓是不谋而合。罗兰在那一页的注脚上写道:“人们不难看出,共产党的领导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出党所面临的危险,我也曾指出过这种危险:脱离群众,等级观念”等。”

作为高尔基的客人,罗兰在高尔基家住了三周,但他并未同高尔基推心置腹地交谈过,这是他此次访苏最大的遗憾,其中的原因耐人寻味。高尔基只热衷于给他讲各种逸闻趣事,而闭口不谈政事,这多少让罗兰感到失望,同时感到震惊。罗兰对高尔基此时此刻心理上的刻画真是入木三分:高尔基“本想看到更伟大、更美好、更人道的东西,他本不想看到,但确实看到这个事业中仍然有错误,仍然十分艰难,有时甚至是不人道的(这是所有革命的弊病)。他为此而感到痛苦万分,他想摆脱这种视野,抬起理性的双眼,向那些将此情景强加在他头上的人高声讨饶。但他却枉费心机,因为他根本无法在自己思想意识的深处抹去那忧郁的场景。他内心深处总是在经受着痛苦与悲观情绪的煎熬,尽管他刻意不让任何情感流露出来。因此,他不向任何人吐露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他把时间都用来在两个阵营里周旋,或浮在自己

的海面上”。

应当说罗兰观察苏联的视角还是相当客观的：他有机会接触到苏联最高领导人，但他并未盲目地听从他们的一家之言；他接待了各界人士的来访，对他们的颂词并未一味笑纳，甚至连他应得的报酬也给予婉言谢绝，就为日后能公正地说话。他的妻子玛莎既是坚定的革命者，又对许多不公正现象极为敏感；曾不止一次地挺身而出反对某些错误，反对制度给人带来的痛苦，同时出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热爱，又极力想去纠正这类错误。玛莎有在苏联生活过的经历，亲身体验过苏联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且会把老百姓的下情讲给罗兰听。

1936年6月高尔基去世的消息让他感到极为悲痛，此时他尚无法意识到高尔基的死对他本人、对苏联意味着什么。同年7月份，苏联颁布了新宪法，他向苏联发去了热情洋溢的贺电。然而时隔不久，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集团”提起诉讼，坐在被告席上的都是老一代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战士，共有16人被判处有罪。8月25日所有被告均被判处死刑，第二天就被枪决了。许多学者和民主人士对此举深感震惊，纷纷写信给罗兰要他采取行动，但罗兰出于维护苏联的利益，没有公开答复那些来信。

1936年底，纪德发表了访苏后所写的《访苏归来》一书。罗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批评了此书，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浮浅。罗兰承认“在苏联现时社会发展阶段，还有许多不足之处，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而“重要的是要看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至于他本人，他要保持沉默，不与纪德展开论战，其实也是间接地承认纪德对苏联的批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1937年1月23日，莫斯科又开始了第二场诉讼。同一天，维

克多·塞尔什在给罗兰的信中写道：“列宁的第二批战友就要在不实之词、警方肆意捏造的旋涡中消失了。”他补充道：“日科夫和布哈林大概也会卷进去。整个十月革命那一代人大概都会卷进去。”他督促罗兰采取行动，要斯大林及加里宁明白，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应该赦免列宁昔日的战友。不知是由于塞尔什的督促还是别的原因，罗兰分别给斯大林和加里宁写了信：“建议他们为了苏联的利益，不要对被告判处死刑。”罗兰虽然在公开场合下依然维护苏联官方的说法，但私下里却将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在日记里。

然而，斯大林并未给他回信。罗兰注意到高尔基的小圈子渐渐地倒成了众矢之的。一个朋友从苏联返回时告诉他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契科夫被捕的消息。政府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攻击他在高尔基家见过的人，画家柯里宁、作家阿维尔巴赫等。6月份，他获悉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诉讼案中，16名将军其中包括艾登曼均被判处死刑，而后者则是高尔基家的常客。同年8月，当他获知自己最要好的朋友奥斯卡·加尔托赫被逮捕时，他心中的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了：

“这绝对是失控的专制制度，人类正义最神圣的法则、最基本的自由已无任何保障。我的内心在发出痛苦的呼号，我要反抗。我在抑制自己要说的、要写的欲望。我也像被击倒了一样……”

不管怎样，罗兰依然怀着极大的信心，但他已不再信任斯大林了，他所信赖的依然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怖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演愈烈。1938年，噩梦再次降临在他头上：罗兰获悉格兰女士，就是在莫斯科陪他参观文化公园的那位女士也被处决了，这又是一名高尔基圈内的人！同年3月2日，第三次诉讼又开始了，针对的是“右派和托洛茨基集

团”。塞尔什的预测不幸被言中：布哈林、日科夫、雅戈达、拉科夫斯基，还有列文医生、普列特涅夫医生等都被判有罪。几乎所有这些人他都认识。这一次罗兰决不再认同官方对他们的指控了。

1937—1938年，罗兰明显与斯大林的俄国拉开了距离，但他并未放弃革命的理念，因为他始终相信革命。罗兰对苏联肃反扩大化一直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总是以革命事业全局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他在“《莫斯科日记》补记”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他（斯大林）那肆意践踏失败者的做法……我也不同意他对阴谋活动给予无情的镇压，即使这种镇压手段是完全合法的：因为抛开人性的因素不谈，这种手段对于苏联现制度，对于革命事业是毁灭性的，世界舆论也是这样看的，或许事实上已经造成了毁灭。那些精力充沛、经验丰富的人（政治家、将军、外交家、工程师、技术员等）被无情地消灭了，谁能估量出苏联在人才资本中的损失有多大呢？将其中的大部分人留下来为苏联服务不是更明智吗？”

1938年10月，罗兰将他写于1935年的日记仔细复读了一遍，就他那年所写的随笔坦诚地思索着：“以最近所发生的悲剧性事件为启示”，写下了补记，不仅补充了原日记未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而且加上了必要的解释，描述出事实与原记录中极细微的差别。

苏联曾有过一段光辉的历史，但其主要领导人也犯下严重的错误。大国沙文主义和肃反扩大化也许正是它走向衰亡的最大伏笔，因为正如罗兰所说，人才资本的损失是难以挽回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摧残人才，进而对国家、对民族所造成的损失不也是难以估量的吗？